

資料上提出的要求是實際的

好

好

# 文壇資料選集

原則

原則是

對文壇資料上提出的要

求

存真要實是的是指無論過去現在

和將來都是我們搞好社會資料工

作遠近的基本原則實是的文壇資

料才經濟起于煉算代的考驗



# 临河市文史资料选辑

##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临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一年十月

# 目 录

- 解放初期临河县统战工作史料掇拾  
.....全发启供稿 文史委整理 ( 1 )
- 临河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  
.....赵万祯口述 文史委整理 ( 17 )
- 我参加临河土地改革的回忆.....刘玉成 ( 32 )
- 临河市第一中学校史概略  
.....临河一中供稿 文史委整理 ( 50 )
- 社会主义新中国财政的优越性  
——临河建国前后财政状况见闻  
.....李 清 ( 66 )
- 解放前临河工商业概况.....高士信 ( 79 )
- 河套语言纵横谈.....张联江 ( 88 )
- 对旧社会“新生活运动”之片断回忆  
.....刘培荣(127)
- “十年黑暗，一线光明”  
——杨家河土地纠纷案始末  
(附明公乔培新史略)  
.....武健康口述  
武英士 苏希贤采访整理(139)
- 开挖杨家河的杨氏家族传略.....刘培荣(157)

- “德和泉”往事钩沉  
 ……………李国祯提供 文史委整理(162)
- 临河大户李仁甫赈灾献粮史料拾遗  
 ……………文史委采撷(176)
- 为纪念临河设治六十四周年而述  
 ……………郝维垣(178)
- 绥西粮库见闻琐记……………王廷英(183)
- 冯玉祥将军和他的西北军歌……………王和平(193)
- 绥西饭店业风情……………王廷英(199)
- 解放前临五杭地区戏园杂记……………王廷英(212)

## 考证·拾遗

- 王同春先生史料的几点考证与拾遗  
 ……………王钰 张子文 王亚丽(223)

## 篇目分类索引

- 《临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五辑  
 篇目分类索引……………(233)

# 解放初期临河县统战工

## 作史料掇拾

全发启供稿 文史委整理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它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年内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中国又处于内战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从军事上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最终又迎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军政人员举行和平起义，塞外城乡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我也

与内蒙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四九年，我在石家庄专署工作。十二月的一天，专署派人到我下乡的元氏县通知我回专署有要事相商。当天下午我赶回专署，专员韩其民同志向我转告了党委的决定：让我北上（是时，调动干部到南方工作，称南下；调动干部到北方工作叫北上），即调我到绥远省工作。当时，我所在石家庄专署设在辛集（即现束鹿县），距离我的家址30里路，接命令后，我连夜赶回老家看望了六十多岁的老母，次日又奔区所在地告别了月子地的妻子。第三天返回专署，第四天踏上了新的征程。此次北上包括仓县专区、天津专区和石家庄专区在内的共200余人，与我同时调动的石家庄专署的有郝平南、尹继生、张亚斌、庞奔同志。一九五〇年元月六日，我们抵达北京，住宿在华北局招待所，当时的华北局党委书记刘澜涛同志给全体北上干部做了形势报告。介绍了国内国际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绥远省实现“两化”的指示：即军队要解放军化，地区要解放区化。重点交待了党的统战政策。鼓励大家要勇于去绥远工作。刘澜涛同志的报告仅我记忆是：党派你们到绥远省的任务是接收改造那里的旧政府、旧军队。把旧的人员改造为新人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光荣的。要完成这项任。

务，首先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思想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要认识到改造和被改造是一场斗争，有斗争就难免有牺牲，要有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在新的工作地区，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旧军政人员可能会给你们这样或那样的刁难，但是，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以理服人。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刘澜涛同志告诉我们，此次西行，寸铁不带，就是用党的政策唤醒群众。有了群众这个基础，就能打开局面，在那里站住脚跟，就是胜利。五天后，全体北上干部由京乘火车奔赴绥远省会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元月十二日夜间一时许抵达归绥市，分别住在当时的联谊社（即今呼市公安局）、“卍”字会慈善院（即今呼市档案馆）和归绥女子师范（今呼市第三中学）。之后，在省委礼堂听取了当时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高克林同志的报告。他向北上干部交待了具体任务，就是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建立各级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组织，同时做好减租反霸、剿匪肃特以及调整土地、加强民族团结、搞好统战工作。其时，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同志、付主席杨植霖同志也在“联谊社”

会议室做了报告。主要精神是：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恢复发展生产。保证一九五〇年的播种面积不少于一九四九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查了解当地情况，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加强春耕生产的领导，提倡恢复发展生产，奖励劳动积极分子；三是注意搞好工作团干部与起义干部的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四是严厉打击破坏生产的行为；五是完成一九四九年的秋征粮食任务。一九五〇年二月廿三日，绥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成立绥中区、绥西区工作团及所属各县工作分团的命令。绥西工作团170余人，其中，一部分留绥中工作团，一部分留省委直属机关，余76人赴临（临河）、米（米仓）、永（永安堡，即狼山县府所在地）分团。该分团干部多以河北调来干部为主。一九五〇年二月廿三日晚由团长沈新发率领，从归绥乘火车出发至包头后，分乘十辆卡车继续西行。一路之上尽收眼底的是一片荒凉，十里八里见不到一村一店一户人家。同志们联想到将要工作的更西部地区，产生了低落情绪。团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引导大家从唱革命歌曲入手，扭转沉闷的气氛。二十六日中午12时到达临河县。次日，召开了有当地军政领导和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原临河县



长刘惠之、临河工作团团长李桂芳同志均在大会上讲了话。说明了进驻临河县的目的和意义。接着，刘县长又召集原政府全体人员会议，向工作团介绍了全县的基本情况和原政府所属各科室建制及人员情况。之后，由工作团干部组成的城市、农村工作队分别深入工商界、城镇居民和机关学校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摸清情况、掌握动态、了解基层反映。留在政府的工作团成员全发启、高心平、庞新民与起义干部车彩凤（原省政府秘书）一起主持工作。当时，这部分起义干部表面上尽管很积极，但内心不安、思想恐惧，因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把共产党说成是青面红发，巨齿獠牙，共产共妻，凶恶可怕。工作团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们消除顾虑，解除恐惧心理。当他们看到工作团干部与其同吃一锅饭，终日吃糜米饭，山药旦时，困惑不解，问我们：这样的饭你们能吃得下去吗？过去的县长都有家室，都是吃小灶的。我们说：你们能吃，我们就能吃。我们以能吃饱为原则。他们处处观看我们的举止言行，终于发现我们穿得粗布衣裤，脚蹬实纳帮子家做鞋，住所也只是一铺一盖而已时，开始慢慢接近我们，敢于同我们一个桌上用餐，发展到主动打招呼、问长问短，直至敢于谈自己过去的想法和现在的看法，还谈了

旧政府的某些不合理制度。这样，我们了解到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对党的方针、政策存在疑问，思想上有一定顾虑。针对这个问题，工作团认为很有必要向全体起义人员做一次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交待解释与回答疑问的报告会。在这个报告会上，团长李桂芳同志做了如下的讲话：李团长首先肯定了起义干部大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行动，是进步的表现。鼓励起义干部今后开诚布公、畅所欲言，以期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后，李团长重点讲了几个问题：

一是旧职人员所共同关心的什么是起义人员、留用人员的界限问题。当时，所谓的起义干部是指县团级以上军政领导人员率部弃暗投明，投入革命阵营。举行“九一九”和平起义时，该部分人员均经签名盖章、登记造册。留用人员指和平起义后的官兵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起义后的公务人员留人民政府继续工作。至于那种“留用不用，一脚踢开”的传言，纯系对党的政策之误解。李团长指出，革命事业是光荣的伟大的，必须造就大批的干部适应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希望全体留用人员安心工作，积极工作，准备迎接更新更重要的任务。

二是关于既往不咎问题。既往不咎政策是指对全体起义干部和留用人员讲的，即不论过去犯

有什么样的错误或者罪恶，起义后，均采取不算旧账向前看的政策。但是如果有的人恶习不改，继续犯错误，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那就要严惩，就要新老账一起算。

三是关于团结改造问题。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改造。有些人愿意听团结二字，害怕提改造二字，以为改造者，乃犯人也！孰不知改造是对每个人而言的，工作团的干部需要改造，起义人员更需要改造，我们从旧社会过来，难免带有旧的思想习惯，落后的迷信的思想，难道不需要改造吗？旧职人员还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的影响，更需要改造。李团长指出：党的改造方针是形式多样的。总之是要通过学习上级的方针政策、学习文化理论，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弃旧迎新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

四是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起义留用人员经过考查了解，根据自身的实际工作能力，均已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如财政、粮食、水利、卫生、生产、工商、文教和文化等部门，大部分均以原科室人员为主，而且这样安排，都是经工作团与起义干部苗瑞凤县长共同研究决定的。

会议结束后，工作团遂从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入手，首先在政府内部组织

了学委会，凡在家工作的工作团干部和起义干部组织在一起开展学习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和部分政治理论书籍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辅以报刊杂志。学委会制定了每日半天学习半天工作的制度，由留用干部冯玉树负责领导学习。学习方法多采用留用干部提出疑问，由工作团干部给予解答。其次是把112名留用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配以工作团干部一同下乡开展发动群众、推动春耕生产和宣讲党的方针政策、组织村民生产委员会以及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工作组下乡前夕，工作团宣布了纪律：一是要深入群众，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要访贫问苦；三是不许打骂群众；四是不许调戏妇女；五是一律背行李下乡。当时组成的四个工作组分别是：第一组组长：李洪臣（工作团干部）；第二组组长赵德海（工作团干部）；第三组组长何天友（工作团干部）；第四组组长刘德奎（工作团干部）。工作组进村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农村群众怀着既害怕又惊奇的复杂心理，纷纷前来观看。过去只听说共产党来了，今天真的共产党来了。人民群众亲眼目睹工作组中工作团同志说话和气，行为正派，根本不象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那样可恶可怕。特别使他们惊奇的是，工作组中的部分旧政府职员，

过去下乡逼粮要款征兵凶得很，今天这部分人也变了。保甲长的态度也变了，主动帮助工作组开展工作。工作组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各种会议宣传省委、政府关于搞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农民群众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就连非重点村的村民也跑来观看工作组的行动，回村后，成了工作组的义务宣传员，遂派代表来请工作组去他们那里做客。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宣传的影响一扫而光。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在全县开展起来。农村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以保为单位建立了以贫雇农为多数、有中农参加的村民生产委员会，各自然村建立生产小组。从此，新的生产委员会代替了旧的保甲制，各村开展了调整土地、发放籽种口粮、农具、耕畜和贷款等工作。接着又以保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以贫雇农为多数、有中农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四月中旬，工作团协助政府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临河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当时县长：苗瑞凤（起义干部）、副县长：仝发启（工作团干部），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分别是：政府：

文教收发：庞新民（工作团干部），刻印：李玉林（起义人员），事务员：李尚荣（起义人员），管理员：李怀德（起义人员），会计：周

庄（起义人员）。

民政科：

科长：高心平（工作团干部）。

科员：孙亲勳（起义人员），

刘玉成（起义人员），

王和平（起义人员），

余垣（起义人员）。

财政科：

副科长：刘殿美（起义人员）。

科员：刘权中（起义人员），

高友贤（工作团干部），

郭兴和（起义人员），

王少刚（工作团干部），

王光耀（起义人员）。

文教科：

副科长：郝维垣（起义人员）。

科员：张镇九（起义人员），

孙沛荣（起义人员）。

建设科：

负责人：李增华（起义人员）。

科员：王金龙（起义人员），

李景义（起义人员），

张津龙（起义人员）。

工商科：

负责人：赵磊（工作团干部）。

干事：杨玉成（起义人员），

杨胜林（起义人员）。

#### 水利局：

局长：柴仰山（起义人员）。

股长：史明德（起义人员），

副股长：刘世功（起义人员），

股员：吕尚志（起义人员），

王锡生（起义人员）。

渠巡：贾元宝（起义人员）。

#### 卫生院：

院长：李成森（起义人员）。

药剂员：李武超（起义人员），

卫生员：胡兼谦（起义人员）。

#### 法院：

院长：仝发启（兼）（工作团干部）。

审判员：潭绍其（起义人员），

书记员：孙帅忠（起义人员），

科员：周万起（工作团干部）。

#### 文化馆：

馆长：弓寿昌（起义人员），

干事：周晨（起义人员），

#### 粮食局：

副局长：孙跃山（起义人员），

稽征员：马 晋（起义人员）。

公安局：

局 长：刘敬海（工作团干部）。

股 长：赵殿英（工作团干部），

唐汝增（工作团干部），

岳 英（工作团干部），

陈 美（工作团干部）。

公安队员：102人。

人民政府成立后，极大地稳定了起义人员的情绪。乡保甲村群众知道有了自己的政府，更觉有了依靠，所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区政府随县政府之后而诞生，继而废除保甲制，各项政治运动旋即开展起来，如：减租反霸、剿匪肃特、抗美援朝运动。通过政治运动的相继开展，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旧的保甲制日趋不相适应。1950年八九月间，废除了全县十三个旧乡镇所，新划分为四个区，成立了区政府及所辖的48个行政村的村政府。四个区政府中的区长均系由工作团干部担任，四个区政府中的诸如民政助理、财政助理、农村助理、文教助理和文书收发等36名工作人员中，起义人员为31名，占86%。这部分人员的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同年的春节前夕，县工作团召开有县区党内



外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一年来全县农业生产、政治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统战工作中的团结改造成绩、经验与教训。大家总结的首要一条是农业丰收了，粮食打的多了；农民收入有了增加，生活有了改善，从而农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大改观。第二条是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特别是废保建政，三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值得秉笔的是起义人员的体会生动具体，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威力。

（一）思想认识上的飞跃。过去的政府人员下乡，骑的是马，住的是大户人家，现在背着行李下乡，吃住在贫雇农家中，吃的差，住的小，白天干活劳累，晚上睡不好觉，但看到工作团同志以身作则，与贫雇农“三同”的现实，日久天长，也就适应了。到头来，身体还比从前强壮了。

（二）与农民群众改善了关系。过去的旧职人员下乡，农民明里怕，暗地骂，催粮要款征兵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许多青年人为了逃避征兵，东躲西藏，往往几天吃不上饭，病饿而倒。有更甚者，举菜刀将自己的食指剁断。征粮对农民来说，更是一道难关。临河农民多是佃农，以

租种地为生，秋天下来，除交租息，粮食所剩无几。官府逼粮要粮的手段多种多样，常常是见不到人就搜，捉到躲避的农民就吊打冻。农民编顺口溜：“打的打吊的吊，使尽刑法把粮要，最后给张储蓄票，三年五年无人要。”可是，现在就不同了。人民政府大力协助农民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合情合理下达征粮任务，农民自觉自愿地交纳公粮，有的村一星期就完成全年纳粮任务。农民欢迎工作组，只要见到工作组同志就围过来问长问短，显得格外亲热。哪家做了稍微好一点的饭菜还要主动请工作组同志去吃。

（三）政治运动教育人。工作团进驻临河后，大力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但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对起义人员团结改造的方针，许多起义人员愿意听团结二字，听到改造二字就头痛。经过三大运动，尤其是减租反霸斗争，广大贫雇农对恶霸地主的血泪控诉，都激起了旧政府人员的无比愤慨，真正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再目睹临河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顾刚刚翻身后的不富裕，争着出钱、出粮送牛宰羊，并提出加紧劳动，多打粮，支援朝鲜战争的口号。广大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军，更是亘古未有的行动。起义人员也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总之，党的统战政策在起义人员当中发挥了灵丹妙药般作用。使广大起义人员从内心感到旧意识、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非改不行，从而也坚定了他们加紧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这部分同志坚持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制度。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开展了抗美援朝签名活动，科室与个人均制订了爱国公约。民政科制订了关于做好拥军优属和安置转业军人的工作计划；财政科提出搞好清仓查库、结帐及资金管理的工作；农林科在如何搞好春耕生产、种好地造好林方面下功夫；教育科拿出了加强宣传，提高教育的方案；除此之外，我与原政府县级起义干部苗瑞凤同志密切配合，注重团结，鼓励他凡是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大胆去办。在涉及起义人员的各种问题上，如表扬批评、提拔使用等均是与苗瑞凤同志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在对待少数起义人员违法犯罪活动问题上，更是谨慎从事，需要做处理的，均事前征求苗的意见。如发现旧科员张某和胡某暗通土匪、特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其档案材料首先经苗瑞凤同志过目，他气愤不已，认为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对他们如此宽大，既不咎往日表现，又安排工作，现在反而

进行反革命活动，实是可恶至极，应当严惩。

谈心交心是联络感情、增进了解、消除顾虑的桥梁。我与苗瑞凤同志在共同的工作中，注重谈心，随意交谈各自的经历和遭遇，探讨人生的哲理，交换工作中的体会与想法，有利于促进相互了解，增强信任感。所以一起工作，配合得当，心情舒畅。由此可见党的统战政策在解放初期正确贯彻之一斑。

# 临河县手工业社会

## 主义改造回顾

赵万楨口述 文史委整理

一九四七年，我13岁，因家父故逝，家境贫寒，母亲送我到临河县李洪洞师傅开的铁匠铺做学徒工。

解放前的临河县仅有东西长二华里南北宽不到一华里的一条街，即如今的解放街。东起现在的新华书店，西至旧文化馆之间为各行各业集中的繁华区。那时候，临河县根本没有重工业。所谓的轻工业只不过是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而已。当时，它却是人民生产、生活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按行业可分为：铁匠铺、木匠铺、毛毡靴鞋铺、钉锅匠铺、白铁铺、裁缝铺、鞋铺、剃头铺、铸匠铺、口袋坊和一家修理自行车外带白铁业的店铺。铁匠铺又称铁匠炉、烘炉。当时临河县共有四家，一家是我师傅李洪洞开的，一家是李洪洞师傅的姐夫张三毛开的，第三家是沙县人冀二四

兄弟开的，还有一家属包头人氏徐根牛所有。因为临河县是个农业县，所以铁匠业较其它行业发达，其中，又数李洪洞师傅生意最好。

旧时的铁匠炉大都是以家庭为主，一般均在临街开一门面，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设烘炉是生产的处所，后半部分住家属。再于门面前临街垒一泥台子，上面摆放产品以做销售。到了晚上，用长约6尺、宽约一尺许的铺板并排插在有槽的门坎里，权当关了店门下班了。掌柜子本身就是师傅，一个烘炉铺一般要顾一个耍手艺的，即半拉子师傅，负责举大锤，另招收1—2名小徒弟。凡进铺学徒均要事先与师傅也即掌柜子签订三年为限的合同。合同规定三年之中不许离铺。管吃管穿不挣工钱，逢时过节给几个另花钱。夏天单衣一身；冬季棉服一套。学徒期未滿私自逃跑的，师傅要找你算帐。旧时的掌柜子也喜欢心灵手巧好学上进的徒弟，越表现好越要追究；轻则，追回来揍一顿；重则，如徒弟另立了门户，还要抢回烘炉。当然，个别表现不好的所谓“灰鬼”，跑了就算了。三年学徒期满，要继续留下来白干一年活，称之为“谢师”。四年后，如果徒弟愿意留下来跟师傅合伙干，即留在本铁匠铺，开始按手艺人对待，挣月工资。倘或本人意在另立门户，重起炉灶，师傅则会赠送你一整套。

家俱，包括烘炉在内，帮助你开业生产。

生产的全过程中，人员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师傅掌钎，耍手艺的即半拉子师傅拉风箱、抡大锤。小徒弟则守炉、折废铁打杂。掌钎的师傅手中的小锤是做指挥用的，如小锤举高落下轻打一下，是让举锤的重打一锤；小锤按在砧耳上是停锤信号；呼唤人时，小锤则在砧耳上轻轻碰击等等。

解放前临河县仅有67,663人口（据《绥西概况》一九四五年六月统计），城乡经济极不发达，农业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当时的铁匠铺为适应小农经济生产的需要，主要产品有：镐、犁、锹、锄（锄片、锄勾）耙、镰刀、黄钎、铁钎、四股钎和掏苦菜铲等。随着春种秋收结束，小农具生产进入淡季，铁匠铺开始转向生产一些生活用具，如铁饭勺、铁饭铲、铁水瓢、菜刀、杀牛羊刀以及门挂挂拴狗链以至犯人用的脚镣子等。间或，还兼顾修修补补，钉钉马掌什么的。那个时候，与经常有交往的富裕户还可以以物易物进行交换。如三斗小米（一斗=30斤）可以换到一张西锹。对于一些熟识的关系户，还允许赊帐。当时农村的富户一般均设有油磨作坊，如富户赊购了小农具之类的产品，到时，铁匠炉可派人去乡下换回来米面油等以供家人和工人食

用。旧社会临河的手艺人多数有抽大烟的嗜好。这是造成生意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因为凡抽大烟的师傅总是白天抽，晚上干活，黑白颠倒，徒弟不习惯，往往不愿跟其学徒。而我的师傅李洪洞却无烟酒嗜好。他年青时由包头迁来临河，生性耿直，爱抱打不平，三句话不对头，连警察也敢顶撞。李师傅对雇用人员比较公平，一是按季节给徒弟换衣服；二是逢年过节给放假，初一、十五改善生活；三是对徒弟要求严格、规矩硬；四是传授技术不保守。李师傅生意较其它铁匠炉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产品的过硬质量取胜。凡是该铁匠炉出的产品都在适当部位打上—个“李”字。所以“李”记的产品一般不搞讨价还价，要买则买；不买，走路，干脆得很。到了1949年9月解放前夕，我师傅的铁匠炉已经由—盘扩大到两盘，人员增加到8人，店铺门面也有所扩大。其时，全县城的烘炉由原来的四家增加到八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临河县获得解放。从1951年开始，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引黄河之水灌溉农田的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了挖渠修堰之中，西轱的生产便成了主要任务，因而铁木两业的生意迅速兴旺起来。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与铁



业、木业两行业店铺签订“三角合同”。人民银行把款贷给了铁木业铺，支持其发展小农具生产，由当时已经成立的、由国家扶助的农村基层商业组织——供销社负责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包括小农具产品的统一推销；而后，又负责把农付产品收购上来。七月份，临河县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继而，县工会诞生。从此，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工会为广大工人做主，严格实行劳资合同，要求资方（掌柜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得虐待工人，不准随意解雇工人，加班加点要征得工会的同意方可进行等。仅仅一年的功夫，工人生活大改观，出现了“两多一好”：骑自行车的多了，拿的工钱多了，我当时月工资为40元。穿戴好了，海昌兰制服代替了土布衣，冲服呢大底鞋取代了祖辈所穿的家做鞋。饭菜稍不顺口，就进了饭馆。

1950年秋天，县委组织工人赴天津参观华北农业物资展览。有一天，县委书记李桂芳到我所在的铁匠铺了解情况，并征求李师傅的意见，是否同意我赴津参观，李当即回答：参观是好事，同意的。次日上午，我去县委报了到，全县共两名工人代表。在县委集中后，坐汽车到当时河套行政区所在地——陕坝总工会，尔后又乘汽车去了包头，由包头换火车直达归绥市。总工会集中

了全省的工人参观团。用四五天的时间学习各种常识，包括安全常识、生活常识等。到天津后，住的民户，统一用餐，集体参观，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参观结束后，每位代表均得到一份小纪念品：纪念章一枚，小皮球一个，还有一块上衣布料。参观后回到县里，我开始任铁、木业和缝纫三个行业联合工会的主席。此时的各级工会其地位和作用愈显突出，工人信赖它、依靠它，甚至工人未能按期领到换季衣服也要找工会反映。工人阶级真正当家做主了。第二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又接到通知，和另一位工人代表徐振生，去绥远省总工会干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培训班的目的是为党培养基层干部，学习内容：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并根据各自在基层工会从事的具体工作，分别学习文教、组织、宣传方面的知识。我学的是组织工作，学习结束考试，因为没有文化，自己口述，请别人答卷。三个月后，根据学习成绩的优劣，重新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卓资县帮助建立工会，当时脱产当干部月工资只有18~20斤小米，而我靠手艺吃饭，每月可拿50元的工钱，考虑到养家糊口的具体问题，我又回到了临河，当了国营工人。县工会安排我到杭后第一家国营的机械厂工作，未去，终留临河供销社，着手组建铁业加工

部。起初在今“三八”门市部处，后转为县铁业合作社，搬迁在今影剧院一带，属县供销社领导。其时，王朝义任主任，我任监事会主任。月工资为40元。铁业社实行入股集资，年底分红的办法。烘炉由三盘发展到七盘，工人增加到二三十名，产品由供销社包产包销。到了1953年烘炉增加到12盘、工人60余名，开始生产小炉具等。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基层供销社主任会议，供销社与铁业社签订购销合同，原料来源，产品价格均在合同里得到了保障与解决。从此，农民购买铁业产品不用进城，铁业社的产品销路、原料来源均有了可靠的保障，生产上的优势大大超过了个体铁匠铺。尤其是铁业社工人生活改善，月伙食费仅花七元钱，就可以吃到鱼和肉。吃饱饭就生产，三个月不发工资也不发愁。工人生产情绪高涨，集体生意兴旺。个体经营者则日显低落，这时，个别个体铁匠要求加入铁业合作社，但当时并非容易之事，因为宣传要划清劳资界限。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1953年4月党中央下达了《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同年11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当时，临河县已经组织起来的铁业、木业和鞋帽等六个社，合计有89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27.1%。六个合作社的领导均系徒工和工人出身，是解放后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积极分子。如木业社的刘惠民，鞋帽业社的韩小成，以及缝纫社的刘才等。这些合作社亦是后来县国营工业的骨架。县手工业的特点是：行业多、户数少；小户多、大户少；还有资金少。其生产规模不大、技术落后且分散。当时的这种形式正是中国手工业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从供销入手，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由供销社为其提供原料并推销产品或接受供销社的加工定货。其时，工人还可以交纳股金入社，起码一股（每股50元）。多者不限，年终按股分红。在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大力宣传手工业改造的方针、政策和提高认识、解除顾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作用的基础上，对手工业户数、人数、资金和思想情况进行分析排队。方针是：区别对待，团结改造。我的师傅李洪洞接受政策好，行动快。经过宣传学习，很快就将房产工具等以物顶股金归了合

作社。这一年，仅铁业社工人发展到七八十人，烘炉十二盘。1956年自治区和河套行政区均成立了手工业联合社，临河县亦不例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手工业的领导，体现了人民政府对手工业的重视。县手工业联社理事会第一任主任是崔焕章。监事主任王成雨，负责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我当时系铁业社理事会主任。1957年6月，崔焕章主任与我共同出席了自治区召开的第一届手工业合作联社代表会议。同年秋，县供销合作社帮助手工业联社进行了旨在整顿完善制度的整社运动。这一年县属手工业合作社普遍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如铁业行，规定四人负责一盘烘炉，每盘烘炉有生产定额。产品须经验收后方可入库，月底凭入库单在会计处结帐。这种工资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人跟炉走，工资随炉发放。铁业社技术等级为1~8级。一级工为32元，二级工37.50元，三级工40.05元，四级工48元，五级工55元，六级工62元，七级工69元，八级工最高为70元。我与我的李师傅同为六级工。学徒工的工资比解放前有了成倍增长：第一年为18元，次年20元，第三年23元。冬夏两季的服装由手工业合作社发放，师傅兼烘炉组长。只要舍得苦力拼命干，一般情况，师傅可拿到百拾元；打锤的可得

70~80元。那时候脱产干部在生产忙不过来时也上炉干活。55年以后，人民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开始负责招收工人，铁业社第一批招七名工人，分配在各盘炉上，任务主要是拉火。这个时期的铁业社因为成立的早、技术力量雄厚，为农村服务贡献也大，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点扶持，成为当时县里的骨干企业，在手工业界颇具代表性。上级有关部门开会、找代表、建点、搞调查大多定在铁业社。56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县财贸部部长孔令行就是在铁业社蹲点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县手工业由落后的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过渡的转折点。此时的铁业社新建立厂房、材料厂、库房作配套。铸工、小烘炉车间均配备了车间主任。工人发展到七八十人。行政分工更趋明确，有了专门的政工、财务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新式农具如：双轮双铧犁、马拉园盘耙、七寸和八寸步犁、七行播种机、马拉收割机等在临河的田头地角出现。这样，就给铁业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力量必须不断增加，才能适应农业机具发展的需要。57年冬季，铁业社改名为“临河县地方国营机械厂”。由原二区区委书记赵德海任书记兼厂长。赵万祯任副厂长。全厂有职工140余人，行政管理人员增加

到六七名。车间有铸工、锻造、板金和精加工。设备中增加了现代化车床五台，还承担了县首次引进的苏制大烟筒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可以说，临河县的机械行业就是以铁业社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57年腊月，我们又接受了改造杭后生产的播种机的任务。当时尽管能工巧匠云集机械厂，但工具适应不了实际需要，厂部决定赴外地购买。腊月25我亲自去北京，29连夜背着所购置的工具及部分小配件返回临河。翌年的初一、初二开始干活。春播开始后，依据政府指示，组织工人下乡，现场修理农机具。56年县供销社系统发展党员，我经刘惠民、刘才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7年春，上级派复转军人警旺宁担任了铁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机械厂，面对农业生产和农机具的发展，技术力量仍感不足，于是采取请回来，送出去的办法，先后从呼市调来武、阎二姓两位技术工人，又把厂里的车钳工分期输送到自治区举办的培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回厂再带徒弟。1958年春党中央为发动大跃进运动，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很快，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当时临河县的工业面临了一次大飞跃。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技术革命热火朝天，手工业大显身手。机械厂创造出了

手推收割机、移苗器。新华乡制做了木头飞机、县木器厂制作了木头汽车。组织参观后又仿制：打稻机、打麦机、压麻机、平地机等等，此时工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凡是能减轻劳动力，就敢想、敢干，工人凭手艺向新技术进军，对发展生产影响是大的。58年春季，县成立工业交通政治部。由政府原交通科、工业科和县手工业联社合并组成。由王少刚任部长。在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运动。地处塞外的小县城——临河县亦毫不例外：机械厂院里成了冶炼厂，高炉林立，人欢马叫。当即改命为“钢铁冶炼机械厂”。由牛增录任书记，陈义担任厂长，我担任副厂长。该时期工人的眼光放大了，看远了，能从发展上看问题了。大年初一不放假，不论工人干部一律上高炉干活，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昼夜不合眼，有时实在乏得厉害，靠住高炉就睡着了，真是炼钢炼铁也炼人的思想。一直到59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出现了砸锅卖铁、劳民伤财的现象，大炼钢铁的热度才降了下来。同时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县属手工业都按行业归属了国营企业，如国营木器厂、国营鞋帽服装厂等。属于集体的财产均以平调方式无偿变成国家的，全县基本上没有集体企业了。手工业原有的经营传统、生产方



式和管理手段都被“大锅饭”所替代。一年后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及时扭转。到了1961年，又将原属集体企业的财产资金等归属手工业合作社所有。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临河县的拖拉机日见增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1959年上半年，由临河县糖厂、临河“八一拖拉机站”和临河县机械厂三家合并成立了“临河县八一农业机械制造厂”。担负起全县拖拉机的大中型修理和农业机械的修理及制造任务。其时，乔鹏午任书记兼厂长，牛增录任副书记，我任副厂长。工人增加到150人左右。车间是：精加工、铸造、拖拉机修理、铸造车间。产品有七寸、八寸步犁，镇压器以及民用机械及修理。同时，也从外地组织进货，逐步甩脱了小农具的生产。

此时的工厂纪律严明，厂有厂规，车间有制度，出入厂须佩戴厂徽，每车间门口均有警卫站岗。行政人员由原来的六七名，增加到22名，四股一室是生产股、秘书股、技术股、财务股和办公室。尽管非生产人员有所增加，占全厂职工人数的18%，但这个标准在当时低于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各车间主任都是经过包头糖厂培训的，车间里车钳铆锻、电焊、模型、铣刨一应俱全。生产用电有了保障，除临河铁路局有一台小发电

机和一台柴油机外，糖厂又从乌达调回50千瓦柴油发电机，增设了动力车间，家属区照明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1960年至1961年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工业进入调整阶段，市场销售不景气。厂矿企业遵循该停则停，该下马则下马的原则。这期间，临河县糖厂下马后，“八一农业机械厂”随即改为“轻工业维修制造厂”。继而又将原“八一拖拉机站”人员分离出去，建“拖拉机修配厂”。到了62年春季，轻工业维修厂下马，在原县五金厂的基础上，改建“临河县合作农具厂”，我由巴盟党校学习两个月后，任该厂书记，胡亮任厂长。时属县二轻局领导。担负全县农机具制造与修理任务。从此，这个厂以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入手，先后引进了空气锤，革新成功了弹簧锤，结束了千百年来打铁靠举大锤的历史，是时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均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原来靠手工劳动，平均八小时生产西锹八张，现在提高到20张。原来八小时生产镰刀20张，提高到现在的50张。东西锹再也不用从外地组织进货。镰刀顶了外地货。上述产品还被自治区评为优胜产品。当年革新改造成功的选种器，为麦种的去杂纯种立了大功。产品获华北地区产品优胜奖，并在北京华北展览会上做过展

览。之后，生产的碾米机、玉米脱粒机也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盟农机部门包销了全年的产品，负责销售到自治区西部农区。内蒙二轻局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支持，先后投资近20万元，帮助厂扩建车间。这个时期的农具厂工效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效益提高后，用来搞技术革新，技术投资，扩大再生产，职工福利待遇有了改观，开创了全县首家为职工建造家属房的先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度过困难时期之后的几年，是我县由铁业到机械制造业稳步发展阶段。无论是经营管理，大搞技术革新、新产品不断出现，还是职工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干部工作起来顺手等方面，均是值得后人总结借鉴的。

# 我参加临河土地改革的 点滴回忆

刘玉成

## 一、引言：

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光荣起义和平解放，临河县的劳动人民回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怀抱，人人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城乡处处引吭高歌：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象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哪里人民得解放！

临河县各族劳动人民所渴望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谋求耕者有其田的风愿得以实现。

1950年2月上旬，绥远省人民政府遵照毛主席《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指示，派来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李桂芳等约六十多人，住在临河县司法处（现公安局院）院内办公，并组织工作组，大张旗鼓地深入全县城镇、乡村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访贫问苦，发动春耕生产。揭发国民党反动派抓兵、征粮苛政猛如虎、苛捐杂税多如毛的黑暗统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确是：“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当中吃不消。”“穷人面前路三条，逃荒、上吊、坐监牢。”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但是地主阶级，则愁眉苦脸，惊恐不安。和平解放，展示着剥削阶级的日暮途穷，趋于灭亡。于是困兽犹斗，运用种种手段，或收买拉拢群众，分散财产，聚众赌博，宰猪杀羊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砍伐树木，破坏生产，抗拒秋征公粮；或负隅顽抗，造谣惑众，潜逃外地。就我所知者有：太彰乡大地主王慨新（王经理），是绥远省参议会参议员，逃跑外地，隐匿身份，化装为占卜者；永昌乡地主高成贵逃往伊盟鄂尔多斯大沙漠，群众编曲唱骂：“高成贵你开油房，葫麻放在你柜上，三趟五趟取不上，坑死穷老乡……”

高成贵你计划大，骑上骡子搬了家，过了河西钻了沙……。”

1950年4月中旬，临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有一区南台子村农民李黑小、武银喜等，扭着“德和泉”地主李邦祯来人民政府打官司，原因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浇水规定：“水流到谁家地，谁家就浇水。”李邦祯自认为他的地多，浇的迟了会旱死庄稼，他浇完了再让群众浇水；还有李邦祯饲养的牲畜不好好管理，糟害农民的庄稼无人敢管一案。

这起纠纷案，当时由县长车采风、副县长仝发启受理。并分由仝副县长具体处理。根据上述事实，以无产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观点，斩钉截铁地指出：今天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你们再想骑在人民头上，仗势欺人，那是黄粱美梦，根本办不到。在仝副县长的严厉批驳下李邦祯老老实实地低了头。

仝副县长于事后还征求了李黑小、武银喜对处理有何意见？李、武二人高兴地说：“处理得好！”

县长车采风接着说：“过去打官司要写呈子，过堂问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今天办案两个小时就解决了，办得痛快……”

人民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反响深远，震动力很大，助长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广大干群议论纷纷有口皆碑。是时，土匪横行，抢劫民财，社会秩序紊乱，如散匪宋喜子、阎福厚、张老毛等，四处抢劫、破坏骚扰；巨匪郭栓子、李在，沿狼山湾至宁夏贺兰山一带出没无常，不仅刁抢群众，还与我人民政府、剿匪部队为敌，明目张胆地进行挑战。

临河县城驻军“三二八团”张玉瑶起义部队，虽然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暗行抢劫，破坏社会治安，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入该军的政工人员进行杀害，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临河县政府军事科长张国梁，结匪为寇，进行反革命叛乱活动。

国际上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施行了毁灭性的细菌战，我国为了防患未然，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号召群众捐献现金，青年报名参军。临河县人民政府干部每人捐献一月工资。临河县卫生工作协会会员褚和民、洪兆祥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加了国际医疗大队，用实际行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反击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挑战。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鉴于此，开展了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剿匪肃特等一系列政

治运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胜利地进行土地革命运动，满足群众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二、临河县积极准备土改运动工作：

### 1、土改试点：

1951年9月中旬，中共临河县委员会，在所辖第二区勤俭村（现干召庙永丰村），进行了土改试点工作，工作组长马克俭（组织部长），组织干部数十人，做出了典型示范，用活人活事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取得了成功经验，树立了以点代面，点面结合的样板，为胜利进行全县的土改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避免在运动中犯错误、走弯路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 2、举办土改训练班：

1951年10月中旬，中共临河县委员会，在县城第二小学院内（现计生局东北角）分批培训城乡男女积极分子四期，约四百余人。由县委领导同志讲大课，启发广大学员控诉旧社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吃的是猪狗饭、受的是牛马苦。通过回忆对比，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成为土改运动的骨干分子。

掌握学习讨论的工作人员有：于发路、王占峰、常秀英、杨凤兰等，并教学员唱革命歌曲《谁养活谁》、《九九雪花飘》等。



训练班的伙食管理人员：王存树、王贵荣。伙食按规定标准，每天两餐以糜米焖饭、烩菜为主，白面次之。每期结业举行会餐，还邀请有关首长参加。

3、排演革命歌剧，宣传土改运动：在中共临河县委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文化馆长负责，组织一完小教师吴子玉，曹秉仁、范硕卿、刘秀花、李淑敬、石雨等，成功地演出了宣传阶级斗争、土改政策的歌剧《白毛女》。我记忆犹新的是歌剧的布景，完全用白布制做，由弓寿昌精心构思，挥笔画就，栩栩如生。在临河县人民政府会议室（现市公安局看守所）公演，颇富魅力，场场暴满。

同时，还排演了《王秀鸾》歌剧，在临河县人民政府礼堂（现一完小东侧第五粮店）公演。扮演张大春的是民政科王和平同志，在演到张大春担水回家时，看见家中女人正在耍小牌，气愤地说：“你又好吃、又好喝，托着个小牌不做活，气急我就离开了家呀……”气极之下，把道具“水桶”从肩上摔到舞台上，引起全场观众哄然大笑，同时也使社会上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受到了教育。

三、参加整风运动和土改训练班学习：

甲、整风运动：

1951年秋，陕坝专员公署举办整风学习班，抽调各旗、县、镇和专署直属机关干部参加学习。

专员邢情魁同志在陕坝奋斗中学礼堂做《整风运动报告》，其总的内容和要求是：通过文件学习，交待政治历史，社会关系问题，解除思想顾虑等。

学习方法：上大课、分组讨论，结合自己的思想情况，自我检查交待，群众分析批判加以帮助，达到澄清是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过好土地革命关为目的。

从整风运动学习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看，是多种多样的，分别由公安处长李贵同志、军区政委沈新发同志、专署民政科长胡三民同志，对症下药作报告，解除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

临河县参加整风运动的干部是由民政科长高心平同志，雇用拉拉车（胶车）集体送去报到的，计有：

郝维垣、李成森、张津龙、李增华、赵磊、刘权中、刘玉成等十多人。

学习文件：

- 1、专员邢情魁同志的《整风运动报告》，
- 2、有关首长报告，
- 3、《论忠诚老实》，

4、《人民日报》和杂志等有关文章。

通过严肃认真的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交待了各自的不同问题，达到预期目的，总结成绩，宣告结束。

临河县的学员赵磊，因历史思想情况复杂，问题交待不清，留下继续检查交待，后来转送到绥远省公安厅新生公学。

食宿问题：初期在陕坝天主堂普爱中学，后来搬迁地委训练班（中山堂以南，马路西侧，原吕祖庙院内）。

乙、参加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

整风学习结束后，接着就转入了“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由地委刘健部长，在陕坝中山堂内讲授土改运动的大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毛主席的《论阶级成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有关土地革命运动的文章。

学习方法：上大课和个人精读文件相结合，分组讨论，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为了鼓舞学员的学习情绪，深入领会反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土改训练班”组织有文艺特长的学员曾昭灵等，利用业余时间，成功地排演歌剧《赤叶河》，并在陕坝“中山堂”公演，宣传土改运动，受到广大干群的好

评。

通过领导同志苦口婆心的教育和学员们的努力学习，一般的都掌握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在运动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算地主的剥削账，划阶级定成份，因此要站稳阶级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开展对敌斗争。通过考试测定，学员的成绩基本达到领导的要求，学员们反映说：“来时腹空空；回时腹满载”。在宣布结业后，各返自己的工作岗位，待命上阵。

四、临河县组织土改工作团，开展土改运动：

1951年11月间正式成立临河县土改工作团，团长李桂芳、副团长苗瑞凤，马克俭，刘敬海。团部设在临河县委员会内，下设办公室，主任刘敬海兼任，并设置：材料组：庞新民、贾文光、梁天宝；检查组：倪成玉，庞乃恒；统计组：王存树；刻印组：张秀荣等人。

土改工作团的干部组成：本县抽调约150人，绥远省派来的，河套专署派来的，农村的骨干，学校的教师，中学生等约六百余人。全县共4个区，48个行政村，土改工作分两批完成，第一批开展20个村，每区设五个土改工作组，每

组设组长，副组长，工作人员按行政村的大小、人口多少、政治情况等实际需要而定，不是平均分配。这只土改大军约11月下旬，浩浩荡荡在全县范围内铺开工作，预计在60天内完成首批土改任务。

土改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在全县土改扩干会议上，李桂芳团长指出：每区五个工作组，设一个中心组，指导周围四个组即：“梅花式的方法”，其步骤是：“波浪式”的，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总的说来，就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土改总路线，大造舆论声势，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绥远省委书记苏谦益同志的土改运动报告和有关土改政策；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依靠群众计算地主阶级的剥削量。凡划地主、富农者，必须写出专题材料，由下而上，报土改总团审核批准，张榜公布，三榜定案，既不能将应划的地主漏网，又不能扩大打击面，违犯土改政策。必须坚持稳扎稳打。教育群众要从政治上翻身，反对“油水”观点。

五、参加一区土改运动，奔赴农村工作：

我从临河地区土改训练班结业归来时，适逢临河县土改扩大会议隆重开会之际，我被分配在第一区土改小组，继续听报告，参加讨论，学习

土改政策。于扩干会议结束后，在组长李洪臣同志率领下，来到南台子村（现万丰村）开展土改工作。工作人员是：

崔鸿祥、许维邦、石靖国、杨统洪、丁瑞祥、高瑞山、阎孝文、许生福、张德尧、刘玉成，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李黑小、范玉荣（女）张天禄、李桂桂（女）、吕凤凤（女），陕坝中学生：贺培华等。转入第二批土改村时，工作人员仍无变动。

首批土改五个村是：

南台子村（现万丰村），胜利村（现曙光村），马道桥村（现继光村），杜家台村（现张家庙），杨满渡口村（现土默村）。

土改工作组进村后，住在南台子村政府（“德和泉”院内）组长李洪臣同志将工作人员合理搭配，每自然村2—3人不等，白天到自然村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晚上集中在村政府休息，集体生活，轮流值日，每天早晨学习土改路线、政策，贯彻始终，坚持不懈，并每天汇报交流各自然村的工作进度情况。土改工作全过程具体分几步走：

（1）召开形式多样的会议，组织学习、宣传土改政策。遵照扩干会议部署精神，贯彻土改政策。采取的方法，组织自然村群众会、片

会、妇女会、老头老婆会，青年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个别访问，座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学习政策，宣传政策，大造舆论，使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受到土改政策的教育，反复学习讨论，提高阶级觉悟，统一思想认识。

(2) 进行“阶级亲”不是“亲戚亲”的宣传教育：在群众受到政策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排队，发动苦大仇深的受害者，控诉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苦，分清敌我界限，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利用各种手段收买拉拢。不当防空洞（给阶级敌人隐藏财物），不当狗腿子（不给敌人通风报信）。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在打通思想，解除顾虑的前提下，南台子村群众揭发出特务赵子丰的罪恶事实，工作组写了专题材料报批扣捕，其主要事实是：

民国二十年（1933年）参加共产党，任区委书记，1939年担任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九年被捕叛变，把124名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临河县党部……后被国民党政府把郭北宸、高大羽二人杀害，并抓了许多地下共产党员和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1951年12月24日，被临河县公安局逮捕入狱；1952年2月24日，经临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见临河党史

资料第二辑 166页)

(3) 依靠群众，划阶级、定成份，三榜定案：成份的分类是：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小土地经营者（包括出租者）、其它（外地来者或有政治问题一时澄不清者……），其中：划富农、地主成份，必须计算连续三年（1947、1948、1949年）的剥削量，分别写出专题材料，由下而上，自报公议，上报土改总团批准，张榜公布后，再交由群众反复研究讨论，如此三次，无有异议，即行定案。

在土改运动中，我和张德尧同志写的划地主成份专题报批材料原文附录如下，以见一斑；

例如：郝××，陕西府谷人。

1947年：8口人（男5、女3）劳力6个，其中两个参加劳动。

自耕地510亩，租种地490亩，种农场地8亩，住房4间，凉房1间，碾磨房各1间，耕牛4条，耕马3匹，毛驴一头。农具齐备。

收入：自耕地410亩，亩产4斗，产量164石（每石300斤）放高利贷30石（每石收利七斗），纯利21石，总收入185石。

支出：长工两个（郑栓子、杨新州），临时工折长工两个，长工和临时工的工资、口粮付27.9石，付地租12石，其它支出20.38石，



总支出 60.28 石。

纯剥削：总收入减总支出，纯剥削 124.72 石，剥削率占 67.4%。

1948 年：9 口人（男 6、女 3）劳力两个。

自耕地 54 亩，租种地 80 亩，种“任和堂”地（庙地）86 亩，共种地 220 亩。住房三间，碾、磨、凉房各 1 间。耕牛两条、耕马一匹。农具齐全。

收入：220 亩地（亩产 4 斗）总产 88 石。

支出：长工、临时工开支 16.5 石，交地租 4.8 石，总支出 21.3 石。

纯剥削：总收入减总支出，纯剥削 66.7 石，剥削率占 75.8%

1949 年：人口、房屋、耕畜、农具同 1948 年。

收入：种地 270 亩，收粮 20 石。

支出：交地租 1.5 石，雇长工（刘老虎）支出 13 石，总支出 14.5 石。

纯剥削：5.5 石，剥削率占 27.5%。

群众意见：

一贯打骂长工，扣发工资，如杨新州给他扛长工，四年的工资分文未付。1949 年春郝牛小给他挖渠，挖了 54 个坑子（长 1 丈、宽 1 丈、深 1 尺为一个坑子），言定每一个坑子付糜子 3

升，挖完后颗粒未付。

一贯霸占渠道，水小不让老乡淌，水大有意淹别人，如淹死孙长福的青苗700余亩，造成全家断粮。

一贯霸占土地，他利用乡长职权，霸占了孙才小种的300亩地。孙的弟弟不让，他反把孙抓了兵。

强奸妇女，仗乡长之权，把吴拉女的男人抓了兵，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张口对吴拉女说：“要想不让你男人当兵，你就脱裤子”。结果被他强奸。

一贯仇视共产党和贫下中农，1942年，他向国民党政府报告说农民要反了，把王占山、王老海抓进牢房，进行严刑拷打，并说：“共产党来了是你们的天下，共产党不来就是爷爷的天下”。

一贯仗势欺人，1945年他把李兰英的弟弟抓了兵，李的母亲无人照料被冻死。同年为了霸占李三小的妻子，拿100块银元派李钻宝杀了李三小。

自报成份：地主

小组评定：地主

代表评定：地主

工作组评定：地主

## 结 论：地主

当事人签字：

刘玉成（章）

张德尧（章）

注：我的这份划成份的专题材料已被“临河市党史资料”第三辑刊用。

（4）召开斗争大会，依靠农民协会没收五大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召开全村的群众大会，对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打垮其威风，使之低头认罪。在此基础上，以农民协会，村政府为主，有组织地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房屋），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统一合理调配，分给无地少地的群众，根据土地的质量、距离远近，尽量调剂合理。强调政治翻身，反对“油水”观点，要求土地界限分明，定上桩号，如天吉太桥村，一翻身农民在交界桩上写道：“千年土地回老家，地主定在桩底下。”

（5）召开土改庆功会，建立健全村各级组织领导班子。

甲、庆功大会：宣告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灭亡，把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契约当众焚烧，对地主阶级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无条件地接受群众、村

干部的领导，监督改造，定期汇报劳动和思想情况。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指明前途，争取在三年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经群众评定，予以改变成份。

乙、整顿组织，建立健全村领导班子：通过土改运动的锻炼和没收分配工作，对干部进行了严峻的考验，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进一步提高，涌现出不少的大公无私的好干部，把他们选拔上来充实到领导班子内，当家作主，掌握村的领导权，对立场不稳，或自私自利的少数干部予以免用。

六、临河县土改运动战果辉煌，胜利结束。

1951年11月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3月15日宣告结束。运动全过程的路线，策略是稳健的。对敌斗争既准、又狠，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各族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全县共划地主884户，逮捕不法地主52人。富农312户。没收土地25,527亩、房屋3,808间、耕畜2,152头和其它财产等。

土地分配情况：雇农每户10.2亩；贫农9.35亩；少数民族予以照顾多分1—2份土地。地主、富农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1份土地，令其从事劳动生产。

在土改运动中，地主阶级杀害农民积极分子

四人，有第一区胜利村纵毒案，第四区乌兰村地主李万星进行阶级报复杀害村干部案等，均及时破案，严厉打击。

七、翻身农民高唱《山曲》歌辑：

远瞭大青山高又高，

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共产党来了天睁眼，

云遮天变成亮堂堂天。

共产党来了天睁眼，

劳动人民掌政权。

共产党来了把身翻，

烂皮袄换了一身海昌兰。

分的土地沙盖楼，

幸福的光景在后头。

包头的大路通陕坝，

咱们的后套发展大。

\*\*\*

\*\*\*

\*\*\*

土改运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内容丰富多彩，迄今三十有九载，时不算短，我回忆记述之事实，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领导、同志们批评指导，补充校正，是所切盼。

# 临河市第一 中学校史概略

临河一中提供 文史委整理

创办于一九五六年临河市第一中学，迄今已有三十五年的历史。纵观校史，回顾历程，临河一中不失为一所历史较长、社会影响较大的好学校。从建校到一九六六年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6—1958年：创办与奠基阶段；

（二）1959—1962年：于艰难中成长、在奋进中发展阶段；

（三）1963—1966年：经风雨、见世面，稳步前进阶段。

## （一）

一九五六年初，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入高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即“四十条”。“纲要”的实施，巩固和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国民经济呈现了蓬勃向上的局面，教育事业相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位于河套平原中部的临河县从1925年设治，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解放止，二十四年来饱经忧患，历经沧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艰难地、迟缓地行进。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临河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前夕，统计县有户数：20,236户，人口：91,947人。全县有小学四所，其中县城仅有一所完全小学，（旧时有1—6年级，即称完全小学）。人民政府成立后，全面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这就要求教育事业必须以较快的速度，跟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更好地为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光阴进入了一九五五年，据当时九月份统计：是时，县完全小学发展到七所，初级小学42所，高级班22个，初级班121个，民办班2个，但是，当时已经拥有人口十万余的临河县尚无一所中学。小学毕业生如果继续求学，唯一的出路是去陕坝和五原就读。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满足广大群众子女入学要求，在中央“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文教总方针指导下，经当时的河套

地委决定：在临河县创办第一所中学——临河中学，并指示：临河中学2596平方米的基建任务要“抓紧领导，及早开工”。一九五六年四月，河套行政区教育处长苗瑞风带领建校筹备组的张志德（军转干部，后被任命为副校长）、王子彬（县教育局科员）等同志，多次深入城关镇近郊选择校址，后经反复研究、多方协商，决定在县城西门外、距镇二华里处，划地三百亩，建立一中校舍。五月破土动工，八月落成建筑面积为1487.17平方米校舍六栋。其中一栋为教室（可容四个班）学生宿舍三栋，每栋东头各挂一处教师办公室，还有一栋校长办公室和会议室。图书、仪器室和教导处占一栋。学生宿舍系顶头大铺，每铺可容学生8—10人。九月一日，第一批新生220人入学。新生系由河套行政区教育处统一招生，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85%，其余源于城镇。学校的领导机构为两长两处：校长：杨超。当时任县委委员，1956年7月由中央行政教育学院毕业。副校长张志德。教导处主任：王荣。总务处主任郝尚义。另设行政后勤人员九名，教学人员九名。教学规模定为18个班。初中部的三个年级，每年级四个班；高中部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建校初期，临河中学有中共党员2名，与县第一完小建



立了联合支部，杨超任书记，张志德任副书记。九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县委书记兼县长仝发启亲临大会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临河中学赠送了锦旗。当时的河套行政区教育处长苗瑞凤也出席了大会。学校创办初期，八名教学人员既是班主任，又任任课教师。他们分别是：数学教师：兴连学（兼一班班主任）、邹国华（兼三班班主任）。语文教师：高树义、李世英、窦振环。地理教师：陈媛（兼二班班主任）。生物教师余跃才（兼四班班主任）。体育、音乐教师：李培田。行政人员有团委书记：王宇镜，教导员兼生活指导：杨鹏飞，图书管理人员：贾克俭，事务员兼伙食管理王世和。会计：史永忠。还有工勤杨二虎和陈庚寿及马二双两名炊事员。其时，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展以“五热爱”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教学人员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又是政治思想教育者，每位教师一专多能，一人分任数门课程，教学态度端正，作风严谨，严格要求学生，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行政人员中以校长杨超为表率，热爱本职工作，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建校初，草拟了临河一中的远景和近景规划，使广大师生倍受鼓舞。教导主任王荣同志以高度责任心和博学多才赢得全校师生的拥戴。他

为学校制订每学期的教育工作计划和学生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指导学校步入了正常的教学生活轨道。同一时期，学校根据团中央的布置，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有效地加强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特别是劳动教育，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当时的临河中学座落在坟滩荒丘和断垣残壁之中，只有六栋平房的校院内，到处凸凹不平，状如无数的大小丘陵。平整土地、开辟运动场地、盖厕所、修路与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摆在广大师生面前。这一年学校的工作重点是：以教学为主，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开展建校劳动。全校师生齐动员，上至校长、主任下至普通学生，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用双手和汗水修通校内至校外公路之间的校院路。开辟了方圆为400平米的运动场地。同时开垦荒地205亩，作为校田。此间，学校的文体活动也比较活跃。在“教育为政治服务”方针的指导下，配合党的政治任务，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一中师生的社会影响日趋扩大，作为县第一所中学的首届中学生更是劲足心齐，人人以争做第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者为目标刻苦自奋，勤思精读，用双手开创良好的学习环境；用汗水浇灌知识的花朵。建校一年，临河中学就

开创了尊师、爱校、团结、自奋的校风，为今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一年。年轻的县中学步入了1957年的秋季。这一年按照教学计划，新招收一年级四个班、学生220名。教学人员增加了十名。他们分别是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的贾玉福；由河套行政区调来的图步新、凌钧铭；由杭一中调来的柴如斌、侯良汉和楼宪；由陕坝师范调来的乔瑞生以及经过中师培训和教师培训的范硕清、苏连科、蔺如祥。

教学工作推广和学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五环教学法”，实行了五级记分制。教学改革开始起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遵循精讲多练的原则，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如当时的教学课要求原15节课的内容用4节课讲授完毕，作业批改不过来，教师就利用课余时间把解法全部公布在大黑板上。第3节课则进行考试。学习成绩以四、五分居多。兄弟班级之间开展联谊活动，互帮互学，相互促进。教师中多数身兼数职，同时带几个班的课程，既保证每天晚上批改作业备课，又坚持每周两次的业务和政治学习。广大教师把兼职、多代课视作党组织与校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和重视，因而感到高兴且干劲十足。体现了轻视索取而看重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继续开展

的扩大学校规模、创造良好学习环境的建校劳动中，这种无私的奉献和苦干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仅57、58两年间，全校师生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共扣土坯20余万块，建起了面积为80余平方米的厕所一处，面积为30多平方米的锅炉房一座，冬贮菜窖两个，校墙1,000余延长米。在整个建校劳动中，随处可以见到师生的身影；每一处建筑物都凝聚着师生的汗水。新道德新风尚为一中师生共有，唯独没有邪气歪风。在57年秋招收的第二届初中新生中，均系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而来。同年秋至翌年初，反右派斗争在这所正值艰苦创业的学校开展。起先是学文件、进行大鸣大放，继而又集中在杭后一中与陕坝师范学校联合搞运动。河套地委派了工作组。结果有五位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几位教师的“右派”言论材料系由原调出单位转来。当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均给予处理。是年颇有才华的李世荫老师亦遭罹难，幸未处理，留校后改作教务工作。然而政治气候并未阻止学校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学校有13个班，学生人数增加到660人。教职员40余人。兴建了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兼饭厅）一座。58年的秋季，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经过酝酿发动阶级，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学校也毫无例外地卷到运动中去。全日制学习改做半天

上课，半天劳动。各班以轮流大炼钢铁为主，又分片包干搞基建，搞支农。当时还选调四名中学生上午学习，下午去民办小学教书。学校也在积极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鼓干劲、反右倾思想指导下，开展了所谓的红专大辩论，提出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使部分学有专长、钻研业务的教师积极性受到一定挫伤。但是尽管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口号，助长了片面追求多快的急躁冒进情绪，尽管学校也搞了大炼钢铁放卫星，亩产万斤放卫星，甚至诗歌放卫星，十几节课的教学内容一节讲完放卫星等等，但是，县中学的广大师生仍然视教学工作为主体，教师坚持了辛勤备批、严格考核制度；学生遵守优秀学生条例，勤奋学习。1959年7月首届初中毕业生193人参加统一的升学考试，成绩名列全盟前茅。毕业生中有98%分别升入高中、师范学校和其它中等专业学校，2%的毕业生当了农中教师。同年秋，再度招收初一年级四个班的新生220人。新增高中一年级两个班新生100人。全校共有15个班，752名学生，教职员工47名。同年为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上级派陈士录同志任一中专职党支部书记。杨超校长不再兼任。自此，学校变初级中学为完全中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连接校领导与青年学生的纽带作用也日趋明显。学生会下设五部，即：学习部、文艺部、体育部、劳动部和生活部。文艺部在音乐老师陈致年的指导下，工作尤为突出。学校组织了艺术团，内设编导组、戏剧组、舞蹈组以及乐队，除在课间普遍开展唱歌、跳“安代”舞等活动外，每月举办一次文艺晚会，高中班以班包演，初中班以年级联合演出。学校艺术团的成员又系班级文艺的骨干和组织者。艺术团还不时应县委宣传部的邀请，出席县级文艺晚会和为县级大型会议献演。逢年过节的街头宣传演出，更具吸引力。在一九六〇年全盟中小学文艺会演中，校艺术团自编自排自演的节目为全县争得了两个优秀奖。1960年，党中央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全国农村掀起了以纠正“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特殊化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教育战线也在贯彻“八字方针”，学校工作全面恢复正常。提倡“敦品励学，尊师爱生”的校风。并在当年全区“赤峰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响亮提出了“学福建、赶赤峰、力争全区第一名”的奋斗口号。同年五月份，杨超同志调巴盟师专工作，上级派王建义来一中

任校长，杨金山任副校长，提任王宇境和王世和为副教导主任，郝尚义调离一中后，由李宝章接任其校总务主任之职。是时，王荣同志仍为校教导主任。为了使教育与经济形势相适应，解决小学师资缺乏问题，六〇年春，一中还招收了春季新生100人，增加了教工9名。全校有17个班，847名学生和56名教职员。同时，按照县委的指示精神，将初二年级大龄学生组成师范班，至暑假毕业，为县输送教师52名。七月，初三毕业的四个班和初二提前毕业的一个班学生总数为204人，有90%的学生升入高中，余者相继参加了工作。同年秋，教育形势更趋大好，初一招收了十个班，530名新生，并为县代办了两个二年制的师范班，学生人数100人。此时，学校共有25个班，在校学生1250名，教职员已发展到87人，由于班级急增，班容量加大，原有的校舍日显不足，经县委批准，在今巴盟军分区礼堂一带，建立了一中分校，一年后，随形势发展，在狼山建立二中，分校遂撤销。进入冬季，“八字方针”进一步深入实施，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政策广为贯彻。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一中也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支农运动，通过大会动员、小会讨论、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等程序，最终，从初中班和师范代办班中抽170余名

学生回归农村任会计员、保管员和炊事员；149名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与此同时，部分教职工下放公社农业中学和小学任教。经过师生下放、精减后的学校尚存教学班21个，其中高中班4个（高一、高二各两个班），初一年级8个班，初二年级5个班，初三年级3个班，代办的初级师范1个班，共计在校学生928人，教职工76名。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以政治运动方式搞起来的人民公社和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之后，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随之而来的是步入了一九六〇年泛及全国的困难时期。物资奇缺，粮食为最，粮食供应站供粮不足，一中学生须回社队为学校催粮。“低标准、瓜菜带”是当时办伙食的原则。身临其境，全校师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在205亩校田上辛勤劳作，一颗汗珠跌八瓣，终于解决了蔬菜自给和劳动日粮食补贴的回报。同时，再度显示师生建校的劳动本领：和泥托坯、放砖垒墙，又建起了碾磨房一座和加工厂一栋。学校家属也可以进厂搞加工生产。这一切都是开展正常教学的基本保证。另一个重要保证是在困难时期，学校加强了学生政治思想的教育，当时的县领导和校领导，经常向全校师生作关于形势的报告，号



召树立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鼓起勇气，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战胜灾荒。特别是师生中的党团员，时时起带头作用，事事走在前边。下乡支农，与广大社员同甘共苦，每日食粮仅有2—3两，大多以苦菜充饥，但仍然日均每人锄地二亩余。晚上还唱歌跳舞，与社员举办联欢晚会。越是艰苦，越是珍惜宝贵的教学时光。是时，广大教师深夜精批细改，一丝不苟；众学生饥腹秉烛，寒窗苦读。特别是首届高三毕业班的同学更是废寝忘食，忙坏了当年的生活指导教师：不得不夜半查教室，深更查宿舍，督促同学注意休息。到了61年的春季，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在初二年级的35名学生中，又动员年龄较大的7名和代办师范班的42名学生回乡支农。进入夏季，初中毕业的三个班134人，除39名学生升入高中和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外，余52名学生担任了小学教师，43名学生返乡务农。同年秋，县委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为解决全县北部地区公社贫下中农子女就读问题，决定把一中分校迁入狼山镇，建立县第二中学。其时，二中拥有16个教学班，在校生数753人，教职员工68人。当年上级拨基建经费五万元，二中新建了校舍678平方米。后又追加经费22762.89元，以购置教学设备等支用。经过几年艰苦时期，意志、思想和生活的

磨炼，六二年秋季，首届高中毕业生81人中有77人参加高考，结果有27人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升学率达36.37%，当时居全盟之首。同期毕业的初中四个班162人，其中152人参加升学统考，26人进入高中部继续求学。从60年至62年间所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后来在高校攻读还是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一般均具备了良好的品德、扎实的学识功底以及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许多年后，实践证明，这批学生中的部分人或在各级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或成为高级科技人材，如万继生、周维德、张志信、王治权、汪登贵、刘文忠、刘文斌、胡玉明、田强等。

从1963年始到“文革”前夕，这一段是县中学经风雨、见世面后进入稳步发展且日趋兴盛的时期。此间，校领导王建义、杨金山先后调离，高清云同志任一中校长，王荣同志仍为教导主任。高校长赴任后，从正反两面总结了治校办学的经验和教训，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改革和调动学生积极性诸方面入手，开始对学校进行治理整顿。教师队伍是治学基础，这时期，广开才路，聘师唯贤，除了接收全国各地名牌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外，又积极物色已下马学校中学有专长的中青年教师，组成一支年轻、高质量的骨干教师队伍。与此同时，进一步鼓励老教师发

挥积极作用，为从事教育工作15年以上的老教师颁发了书写着“辛勤十五载，道路红又专”的光荣状。在广大教师中开展了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思想教育，提倡进行有益的课堂教学改革。学生中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的教育深入开展，相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受益非浅。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一马当先；校领导、班主任、生活指导教师经常深入班级和宿舍，通过召开生活会、座谈会以及个人谈心等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提高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增强克服生活中困难的勇气。校工会、校团委和学生会配合学校的中心工作，开展多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如交谊舞、普通话在当时校园内颇为盛行。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也充分调动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的德育工作，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干部的组织与工作能力。六三年开展的学习焦裕禄和雷锋的活动，更是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把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推向了高潮。发展智力的教育寓于各学科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之中。学科的单科竞赛、作业展览、作文讲座、诗歌朗诵等等形式多样，评“满堂红”和优秀学生的活动频频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一年再次制订了“学福建、赶赤峰，力争全区第一名”

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学校文体活动也异常活跃。班班有节目，处处有歌声，文艺汇演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在县专业文艺团体水平之下。特别是师生同台演出的《逛新城》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作为学校的传统演出节目，保留了很长时间。学校文艺队还利用节假日下乡演出，丰富农村基层的文化生活，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学校组织的篮球队、排球队经常与兄弟单位举办友谊联赛活动，并在盟县级的球赛中，多次夺魁，为一中争得荣誉。

临河中学从创办之日起，就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广大师生的劳动意识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无时不在闪光。几年间，在美化环境，改变校容校貌的活动中，又得到了发扬光大。植树造林活动年年进行，校门口已建成面积为20多亩的小苗圃。从1963年起师生动手开挖了面积为700平方米的人工湖，湖旁建起了假山，湖心又筑有亭台。之后，王荣主任亲自为其命名为：文山、武湖、育英亭。人工湖建成后，夏季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游泳比赛；冬天又是学生滑冰的乐园，就连进城办事的农村老乡也不时绕道驻足观赏优雅的环境。良好的校风，严谨的学风，严肃的纪律，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是这一时期一中被社会公认的主要特征。

从1963年到1965年间，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整个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城乡一些单位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发生“右”的错误。64年末到65年间，一中由于开展“四清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一定冲击，少数教师受到了伤害，直至被下放农村。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内容所替代，忆苦思甜成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主要形式。直至1966年5月，“文革”风暴席卷全国，临河县中学，这所走过了创办奠基、成长发展和稳步前进的十年历程之后，也毫无例外地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 社会主义新 中国财政的优越性

——临河市建国前后财政状况的见闻

李 清

财政是国家形成以后的产物，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只有财政，才能为国家实现它的职能提供各项开支。

从我国财政的起源以及财政发展过程看，不管是原始公社末期或奴隶社会以后的所有阶级社会中，财政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财政是为历代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直接或间接剥削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财政才起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剥削的工具，而是建设社会主义重要工具了。现在，就这个问题，我对建国前后的一些财政状况做一回顾。

## (一)

民国时期，临河县政府内设财政科（也称二

科)，有科长、科员、办事员、雇员。其掌管内容，“关于岁入岁出预算核议执行事项，关于税捐税征之规则改进监督考核事项，关于库款出纳保管事项，关于公粮征收管理划拨事项，关于公有财产管理监督考核事项……”等条文规定，而实际执行的又是一回事。

从其收入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向农民及手工业者、商人等征收的赋税。各项税捐名目繁多，很难全部列举。仅据民国二十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调查表所列举项目有：田赋附加学捐、田房附加学捐、戏院学捐、菜园学捐、骆捐附加学捐、牲畜捐、地亩捐、警捐杂捐、林业基金生息、田房捐基金生息、医疗所生息、婚帖捐、商会补助费、公益捐。在税务联合征收局的比额表还列有屠宰税、斗捐、牲畜交易税、普通营业税、屠兽检验费、猪羊肠捐、烟酒公卖费、烟酒产销税、烟酒牌照税、边关税、卷烟统税、抽荒金、地价、禁烟罚金。此外，还有土地税、田赋土地改良物税、筵席税、娱乐税、信托管理费、代办项下收入、财产孳息收入、租金、公田租及其它收入等等。

国民党税赋项目之多，是众所周知，民间早有怨言。就国民党内部官员也不能不承认。如民国二十三年韩梅圃著《绥远河套调查记》内（民

国二十三年七月樊库序)第25页记载：“苛捐暴吏，河套之税捐，名目繁多，如田赋、印花、地亩附加、牲畜捐、菜园学捐、田房学捐、驼捐、附加学捐、随粮代征学捐、公益捐、烟馆捐、禁烟特捐、烟亩罚款、店捐、房捐，税目之多，仆更难数，直接间接，均予农民以重大负担，而实数折征，又几倍于定额，盖暴吏催款，勒索备至，农民无知，畏之如虎，见有红色戳子之条子，即不得不以款付之，动不知据何定章与否也，连同付款，每项年纳杂捐，当在二三十元左右”（以银元为计算单位——作者注）。又，临河负担“地亩摊款，按丈青地亩，每顷三十元，田赋附加每顷一元二角，每顷又有丈青费二角。地亩摊款实征数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八元，（以银元为计算单位——作者注）。田赋附加四千三百一十五元。”又据1933年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报告记载：

“平绥沿线地广人稀，农作物收获甚多，惟苛捐杂税，多至不胜枚举。”

还值得追述的，国民党统治期间，不只是税赋多，而且漫无标准，很不合理，就以人所共知的，河套农民对国民党征公粮、拔壮丁，称为“两大害”的征购粮来说，因为所征粮食项目多、数额大，群众叫作“统计粮”，普遍实行丈青估产，大户操纵，对贫苦农民计算下的负担十分沉



重，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成能估二成半，七成八成估一石。”对地富大户的地，以多报少，实际是把负担又转嫁在农民头上。如国民党五原县长郝熙元、临河县长白保庄在民国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呈报财政厅文内说：“以五临两县往年丈青弊端百出”。又在《河套调查记》所载：“惟河套丈地，向不据实认真，大地主之地一顷丈三四十亩。”又载：“政府征收田赋中，彼可转而渔利，如种田百顷，在官只丈二十顷，以四元收赋计八十元，彼于佃农可丈青八十顷，亦以四元收赋，已获利一倍矣。”正因为负担的不合理，群众怨声载道，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据《河套调查记》所载之，河套佃农家庭收支调查概况：“家有男子三人，女子三人，小孩三人，种中地一顷，下地一顷之多，年获糜子六石，值洋八元，麦子四石，洋二十元，豆子一石，洋两元五角，葫麻五斗，洋二元，瓜子一斗，洋二元，麻子一石，洋二元，荞麦二石，洋三元、莜麦两石，洋三元，副产洋一百元，谷子三石，洋二元，山药十石，洋十元，其他洋七十元，合计年收入二百二十五元五角。年支摊款洋五元，水租洋五元，蒙人水草洋十元，村款洋五元，种籽洋五十元，牲口吃用洋十元，修理牛具洋一百元，长工洋十元，短工洋五十元，买布洋三元，买皮洋六元，

棉花洋两元六角，食用三十元，调和油酒洋二十元，修盖房子洋二百五十元，读书费七元，其他支洋七元，合计年支洋六百零九元四角。收支相抵，不敷洋三百八十三元九角。另又记载：“河套小小富农家庭收支调查概况是：家有男子五人，女子三人，小孩一人，种上地五顷，中地五顷之户，合计年收入洋六百一十四元，年支洋四百三十七元六角，收支相抵，净余洋一百七十六元四角。”

再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开支看，据民国三十年度岁出临时门概算格式实例，分为行政支出、教育文化支出、经济建设支出、保安支出、财务支出、其它支出。但真正用于生产建设的，微乎其微，多数是用之不当，挥霍浪费，即便是公杂人员，尤其小小公务员也感到维持生活困难，如《河套调查记》所载：“河套各县地方支出，虽有预算，然近年以地方财政拮据，多未能依照预算支出，而各县亦有未能如数收足者，计临河地方各项支出，现按八扣关发现洋。安北以六扣关发，但折扣后，又以三成现金七成粮支付，粮（糜子）以二元一石计，较市价昂七角，扣薪金九元之保卫团丁，按六扣发计五元四角，再以三成领现金，计得一元六角二分，余三元七角八分，仅可领糜子一石九斗，按市价可售二元三角

七分，总计七折八扣后，仅实得现洋三元九角九分耳。五原财政又较他两县更枯竭，各地之机关人员，月领维持费每人各六元（公安局不折不扣），维持费之公杂费，以七成领发。差人八成。但所关发者为该县地方所出之不兑现铜元票，以五百枚作一元，计每人可领得三千枚，以市价可值五元现洋耳。然有一怪现象者，即经常支出，虽被折扣无几，而各机关学校，可借词领得临时费，倘机关主脑善伺县长之意，则可常久得临时费，即以普通言，临时费之领得，有时较经常费为多，且或可领得现金焉。盖河套机关无分公私大小，悉为主脑独裁制，因无规律章程之足守也。”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九日一个代表小公务员上书绥远省政府主席说：“外县各级公务人员有半年未发薪饷者，有三四个月不见分文者，依靠薪水为生活者，实无法生活，但是有的那样生活富裕，有的这样无衣无食，自然不平则鸣了。”（择自内蒙档案馆405号之1931卷）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公务员之间，也是贫富不均，而小公务员生活又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财政收支混乱，还表现在无章可循，无法约束，更谈不上建立地方财政体制，也不可能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从历史档案查得民国二十年临河财政收入为103463元，而支出

为37072元，其余66391元，不知去向，民国三十五年绥远予算统计表，内列临河县各种税收20674667元，但支出为439981360元，支大于收如此之多，毫无予算约束。所有这些，足以看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一片混乱，不可能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从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党参议员张守仁等六人向省参议会的提案说：“绥西各县自治经费异常困难，请省政府彻底解决，以减民困，而利行政案。”这也说明当时财政的实际状况。

## (二)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3月20日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陕坝专署，各级财政机构也相随建立。

建国之后，临河市财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认真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财政状况逐步好转，改变了建国前的百业凋蔽、市场萧条，经济崩溃，财政混乱的严重局面。财政工作经济发展过程，始终保持一致，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工作

紧跟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发展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又通过资金的再分配，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加快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呈现出稳步、协调、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

五十年代，工商税为了配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生产关系变革，贯彻执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运用税收的重要杠杆作用，明确规定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并在工商税收政策上，实行公私区别对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了生产发展，起到了稳定物价，活跃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农业税收方面，就其税制法规来说，1950年在新解放区建立统一的农业税收制度（即《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采取累进税制，贯彻阶级路线，按征税对象数额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执行结果，贫雇农税率一般为10%以下，中农为20%左右，地主、富农为40%左右。这样计征，有利于削弱地富阶级经济，适应土地改革前的农村情况。附：临河2区25保各阶层负担统计表

阶 层	户 数	人 口	土 地		农 业 税 负 担				负 担 占 总 收 入 %
			占 有 (亩)	人 均	税 率	总 负 担 (千斤)	人 均 (斤)		
雇 农	15	41	134	3.3	8	1	28	6.1	
贫 农	60	268	1099	4.1	9	9	34	7.2	
中 农	93	457	6535	14.3	25	124	273	18.2	
富 农	14	95	1674	17.6	40	82	866	27.0	
地 主	3	22	699	31.7	42	31	1419	31.0	
合 计	185	883	10141	11.5	25	247	281	20.0	

表上看出，贫雇农负担低，地富负担高，从而使贫下中农摆脱了多年的沉重负担，一致赞成拥护新税法，而地富大户散布不满言论说：“统计改成农业税，保甲变成评议会，三天、两天就开会，咱们说话没地位。”从1951年土改之后，随着农村经济情况变化，调整了农业税累进税率。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经济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农业税改为全面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制，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由于农业税计算收入按常年应产量作为计征依据，增产不增税，长期贯彻了稳定负担、公平合理政策。对产量低，收入少，生产、生活困难而无力缴税的农户，依法给以适当的减税或免税，并对需要支持和鼓励种植的农作物（如饲草地、猪饲料地、林粮间种地以及社员自留地等）免征农业税。以临河市1989年一年计算，共减免农业税113万元。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民负担，一直坚持实行轻税政策，农业税占农业收入的比例，临河市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0%左右，到1989年下降为2%，这个负担水平确实很低。历史上所说“什一之税”，是历来被称颂的轻税，现在2%的负担率，远远低于“什一之税”。所以负担水平低，是因农业税按常年应产量作为计税收入，增产不增税，其增产部分全部留给农民。现在每亩征收农业税5元

多,约占收入的2%,这与旧社会大部分收入缴送“统计粮”的沉重负担对比,实在是无可比拟了。

从建国后,临河市财政支出看,1953年起正式建立县一级财政总预算。对于财政关系、预算、决算、会计、审计、财产以及物品管理等制度和经费标准,先后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要求,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逐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财政的支出,本着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分配。由1950年的供给制财政,逐渐转向建设财政。由于各个时期工作重点不同,而资金的使用上是本着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先维持、后发展,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分配。首先保证农牧业发展所需资金,同时大力支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尽量压缩行政经费和非生产性的开支,在各个时期始终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和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 (三)

新中国财政管理的优越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这与建国前的财



政有本质的区别。例如，1989年临河市共支出5438万元，其中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支出869元，城市维护费705万元，文教卫生事业费1656万元，企业挖潜改造资金352万元，工业交通事业费83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83万元，价格补贴304万元（内市镇居民肉食补贴225万），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25万元。这些都是用于促进工农牧业生产发展，改善广大群众生活条件。

二是财政预算，始终注意和保持平衡。年初预算核定后，积极组织收入，严格控制支出，讲求聚财、用财、生财之道，力求圆满实现收支平衡。值得说明的，临河市以往一直是支大于收，为了使预算不发生赤字，国家在财力上给以适当补助，如1989年上级补助款项就有1552万元，保证了预算平衡。这也反映出中央和自治区对临河市的关怀和支持，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优越性。

三是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和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可以反作用于经济的原理，始终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为安排资金的突出重点，从而对发展生产取得了显著效果。通过下列经济效益对比，即可看出建国后财政经济所起的巨大变化。

项 目	建 国 前 ( 1949年 )	建 国 后 ( 1989年 )
工业产值	3.3万元	21094万元
农业总产值	2177万元	28638 万元
粮食总产	9656万斤	51468 万斤
大小畜	1.6万头	58万头
中小学	41所	205所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是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讲求效益的生产建设型的财政，是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这与建国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朽财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附注：

笔者解放前曾任五原和临河县政府秘书，解放后在临河工作，后调巴盟行政公署财政处任科长有年，现已退休，所撰史料，多是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的事实。

# 解放前临河工商业概况

高士信

## 一、商业

临河市解放前是祖国北部边陲小县，属于绥远省管辖。虽然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便利，但因国民党政府腐败，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相当困苦，所以工商业也萎缩不前，没有大的工厂和商业网点，大部分都是小本经营、夫妻商店，除个别两三个大商号和小作坊外，都没有雇用工人。

1915年以前，国民党政府没有公布货币条例，都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经营方式也相当落后，如糜子可换吉盐、布匹；鸡蛋可换火柴、煤油、针线和小百货及日用品；畜牧产品，可换取大百货、棉布、衣料等。大烟土更能换取任何工业品。有个别不法之徒便乘机搞欺诈活动，如与蒙族同胞以糜子换取吉盐，不是使用秤，而是用门板量：双方商定以放不住为原则，吉盐放在门板上堆起来，而糜子放在门板上便会流下去，这完全是一种欺诈的手段。更有甚者往

白酒里掺上水卖，不过这只是极为少数人而已。

到1915年国民党国币条例公布后，才改用国币制，以银元为基数。但由于国民党印出的纸币太多，国库空虚，物价不稳，商品价格天天飞涨，如，一个土布上午伍元钱卖掉，下午七元钱也买不回来，第二天就涨到十元钱。所以老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而东西越来越少了。

鉴于以上情况，民间就想出另一种方式来代替货币。就是以货物为标准，大部分以白市布或土布、糜子为基数。例如，一个工人给地主做一年工，讲明给几个土布或几石糜子（一石：300斤）就是男女联姻也是以白市布、糜子等为交易条件，一个姑娘是要多少市布或土布或糜子，然后再折成钱或物，这说明人民对国币的不信任。

至于商品的来源，当时因为没有固定的运输行业，更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所以相当困难。在夏秋两季以水上运输为主，大部分商品，都通过永济渠到黄河往来于包头，银川等地，以马道桥为商品集散地。如宁夏的煤炭、木材和水果通过黄河水道运来临河，临河的粮食、畜产品通过水路，再运往包头、银川等地，于是马道桥便成了商品集散地。每年夏季经常停有一、二百只大船和木筏。同时在马道桥建立了许多门市部。

到了冬季黄河封冻，船筏不再运行，马车、

牛车和骆驼就成了唯一的运输工具，来回往返得半月之久，这样给地主、老财造成了发财的机会，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牲畜，牛马大车，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大车把河套的粮食、畜产品、大烟土用车拉送到包头、河北等地，再把外地的棉布、绸缎、百货运回临河，借机大发横财。

1939年，绥远省政府由榆林迁陕坝，同时，陕坝又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所以陕坝人口猛增，临河的驻军和人口也随着增加，门市部业务量也大大增加了。

日本人投降后，陕坝私人集资成立了汽车运输合作社，汽车往来于陕坝包头之间，因买的是破烂的旧汽车，又因没有石油，只好用木炭来代替石油，来回也得四、五天。但到底还是比其它运输工具快得多了。

原来临河商业网点大部分分布在县城东西大街两侧，东起现在开源商场，西到临河一中。现在粮食一门市巷，过去叫铁匠炉巷，大部分是铁匠炉；现“三八”门市部西巷过去叫康四巷，巷内有澡塘，戏院都属康四所有。南二街原叫平康里巷，大部分都是妓女院，也有个别门市部和小手工业作坊。

当时大小商户有三百余家，摊贩50多个，小手工业作坊有七、八十户。

## 二、商业网点的分布和经营情况

棉布和百货业中，最大的是“天然小商店”，坐落在市中心区、现在的红卫门市部，该商店由经理韩茂如等人合资开设，大约有十二、三人，其中工人五、六个。他们的人大部分是由京、津、沪来的，商业信息灵通，人员经验又多，大部分商品经由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货，在京、津、沪都驻有采购员，严格要求进货的质量，所以他的商品比其它商店的商品新颖、美观，销售量也大。所用的包装纸都印有该店的商标，如顾客对该商店的商品不满意，可以随时退换。同时，还负责送货上门方便顾客，不论路途远近，都能按顾客所要求的时间送到。“天然小商店”的制度也和其它商店不同，工资经常调整，干的好的可使奖金高于工资。售出的商品包修包换。经常研究市场动态，残次冷背商品及时处理。对顾客百拿不厌，百问不烦，对顾客来有迎去有送，帮助顾客挑选商品，更不许与顾客争吵，争取好感，扩大业务。

“万利和”商店座落在现物价局门前，这是临河县第一个全砖门面商店，它是陕坝最大的商号“万利和”在临河的分店。经理刘月岫，河北人。该店经营方式和“天然小商店”相同，批发零售兼而有之。经营品种上至绸缎布匹，下至针

线百货。进货渠道，远到北京、天津、上海和苏杭二州。销售地不仅限于河套全区，还销至宁夏、阿盟等地，外省市也有它的销售网点。

除以上两个大户外，还有“惠昌源”，经理王兰庭，也系数人合资商店。经营方式大体相同，不过没有以上两大户的资金多。再其次还有“同福元”、“文华茂”、“晋元昌”等商号门市部。

除棉布百货行外，再比较大的行业就是付食、糕点、酱园。

酱园有“乾泰新”，经理高玉堂，原座落在今经营管理处。该店经营糕点、付食、山珍海味、烟酒糖茶，制作酱油、醋、糕点。各种酱菜，用的都是上等原料，香油用的是纯香油，猪板油必须用水煮出来的才能用，用铁锅炼出来的油怕有异味。糕点和醋酱油师傅都是从北京请来的，所以产品很受欢迎。

“玉记酱园”，原设在一建巷内。该店的醋酱油，采取山西的制作方法，各种原料和成品经过长期的烤晒，才能出厂，所以“玉记”的酱油驰名河套。

还有其它几个酱园，如“隆记酱园”，经理于受芝。该址在今城内五金门市部处。“同合酱园”，经理牛××，该址在今电信局处。“任记酱园”，

经理张循任，原在现二轻门市部处。“万记酱园”，经理张尔经，原在现糖业公司对面。

还有大的行业，就是中西药房：

“寿山堂”，经理王药山，原在现一建巷口。

“万寿堂”，经理张循任，原在现二轻门市部。

“寿民堂”，经理李元寿，原在现旧文化馆对门

“保临堂”，经理贺朝源，原在现糖业公司门口

“福寿堂”，经理郭聘贤，原在现生产资料门市部处。

医院与诊所：

“西北医院”，经理李子材，原在现展览馆处。

“耶稣教会诊所”，原在现工农兵食堂处。

“商隐诊所”，经理孙商隐，原在现展览馆。

肉食品行业有程德田，阎风梧，王元子，杨炸子等六、七个生熟肉门市部，大都分布在临河东西大街的南侧。

最著名的是老陶（陶海山）的熏肉铺，在绥西一带很有名气，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东进到北京后，还经常派人来买老陶的熏肉。临河城内大人小孩都知道老陶的熏肉好吃。他煮的肉，肥而不腻，皮软而肉香，红润而美观。他的制作方法精细：一等肥肉不煮，三等的瘦肉不煮，头蹄下水不煮，防止有异味，专作二等肉。它的煮肉汤是从山东带来的，调料相当齐全，一点也不能马



虎，他的门市部设在康四巷口，三间土房，房子虽然不好，肉香满绥西。

### 三、饮食服务行业

主要饭店有“三仙居”、“振记饭庄”、“兴记饭庄”，还有许多小食堂大约十来户，如黄宽的稍卖，段金山的过油肉，都是有名的。

旅店业，大部分是车马大店，有郭申店、许润魁店，严二寡妇店，比较好的是马登甲客货栈。

理发店，最大的是石井泉，他是从北京迁来的，有四、五个师傅，六、七个徒弟。还有几处个体理发店。

照像业，只有一户即“鸿生照像馆”。

### 四、小手工业方面。

因为临河没有机械化农具，大部分都是用人工，也没有工厂，所以小手工业比较兴旺，尤其铁木两行，专作小型农具，大部分都是手工业生产的。所以铁匠炉很发达，有张三毛、李洪洞、冀二四兄弟、王疯子等处铁匠炉。分布在城内和马道桥一带。木匠作坊有王俊，王大年，辛二虎，菅二狗等。铸匠炉有范兰香等三户。银匠炉有安银匠等二户。铜匠有二铜匠等三户。制作马鞍的有张伦一户。黑皮白皮业各三、四户。粮食

加工业有十来户。另外农村的大地主在乡下都开有油酒缸坊。

以上工商业都归商会管辖，政府的一切税收杂捐都由商会经管。临河城内当时商号林立，人口稠密。城市人口大约有一万余人，因为城市的规模不大，显得相当热闹。

1940年，日本侵略河套，在临河住了有七、八天吧，所有商号都关闭，有力量的商号都迁走或转移，没力量的都被日伪军抢劫一空，临走还放火烧了许多商店。

1944年黄河解冻时，在塔儿湾打起冰坝，黄河水出岸，临河的护城坝决口二、三处；河水冲进了临河城内，深达四、五尺，大街小巷可以行舟，所有在临河西部的商店和民房都被冲毁，由于以上两次大灾难，临河的工商业几乎全部倒闭，彻底崩溃。1945年以后，才逐步建立起一些个体小商品和摊贩，但全部资金不大，小打小闹。

新兴的棉布业有刘治、王守恒、石昆、石巍、石玉、石岚、张来喜等；百货有阎克勤，王月庭，都是百货棉布掺杂经营。文具店有，刘正舆，李喜山。糕点有邓其芬。杂货业有武永昌，吴起昌，王全河等。五金有何继善。但都门面不大，资金很少，大部分进货都是用自行车自己驮

运。还有新生的干货行业有刘安，张生贵，韩虎豹、刘四居等。粮食加工业，因为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所以大部分都恢复了。

回忆可能有失实之处，仅供参考。

# 河套语言纵横谈

张联江

人类的祖先在漫长的群居集体生产中，由于相互交流联系的需要，逐渐地从最早简单呼声发音而至于进展到复杂有规律的发音创造了人类语言。尔后，人类运用语言这一交际工具作为劳动生产、社会相处交流思想感情和心得经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又充实丰富了语言本身，使语言进化到更高的层次，并且反过来更快速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至今，语言仍然是人类最普通而又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和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语言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阶级服务，但阶级也在影响语言，利用它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所以，语言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探索某一地域人们群体语言的形成、特点与发展，就不能离开这一语言群体在

聚集融合过程中的历史原因、地理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去认识；也不能单纯地依靠从语音的物质外壳、从词汇的建筑材料、从语法的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去片面了解，而应该顾及到地域、历史的兴替，民族的交往融合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本文就设想从这一审视角出发，对内蒙古西部河套语言作浅薄的初步探索。

## 一、现代河套人的组成及其来源

从现在的任何一机关单位、团体、学校、厂矿在册人员登记表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殊现象：即大部分人，不管是干部、职员、工人，还是教师、学生，甚至农牧民，在登记表的籍贯栏内，不约而同地写上他（她）们各自的祖籍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甘肃、宁夏、东北或南方各省。其实，他们好些人已经在河套定居了若干代，或者本人就出生在河套，吃河套的糜米、羊肉、山药旦长大的，已经算是百分之百的河套老居民了。为什么不填“内蒙”这一籍贯呢？是他们不忘故祖，恐后代湮没祖籍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呢？目前还讲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户籍、档案、材料掌管部门和专管人员对此现象不以为怪也从不追问，确实使一个初来

乍到的外来人听闻之后感到迷惑纳闷的。不过这种现象也不无好处，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河套地域所居住的人绝大多数是外来户，有如美洲的大部分人都是别洲来的移民或其后裔一样。同时，祖籍的这种登记法给了探索河套人的组成及其来源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线索，从而对语言、习俗的研究，政治、经济的沿革，生产、生活的演变的因由提供了有益可靠的资料。

现今在河套定居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

“除过蒙人，后套没有本地人。”当然，从表面看，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从历史统治的沿革看，汉族占有河套划为管辖范围的时间不算短，较之各少数民族占有河套列入管理范围的时间不相上下，而其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共同生产、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出现过，按理说，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开发河套建设家园中都应当是主人，不应有什么主（本地人）客（外来人）之分。不过，细致审视一下历史的过程，在隋唐之后，以至于清代这漫长的岁月中，河套这块土地都曾是少数游牧民族的牧场，他们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因此，从历史现实去认识问题，上述的说法还是对的。

现今河套人的组成及其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早期的征戍人员、随军服务人员及其眷属。这一部分人大多是来自与河套地域附近周围毗邻省、区的农民，他们是被官府的征集、皇家的征战令而来，他们的行踪无定，随着战争的性质发展而游移。战争胜利了则向前推进，吃了败仗则往后撤退，相持稳定时期他们就常驻戍守，因此流动性大，没有什么长期定居的可能。即使有特殊原因而离队留下在当地生产生活，（如受伤、掉队、被俘、疾病、投降等）也极可能在当时政治条件下改变国籍与族系以求得生存。在当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改变职业从事游牧，要象汉朝的蔡文姬、宋朝杨延辉因祸得福侥幸进入贵族行列者恐怕只是极少数。这样，他们的后裔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游牧民族的一员，失却中原汉家的任何特色。所以尽管有这种成分却难以查对。

从历史资料看，历代被征戍的人员，都是从上谷、定州、相州（今河北）、渔阳（今北京）、云中、朔州、河东（今山西）、云阳、上郡、西河（今陕西）、朔方（今宁夏）、河内（今河南）等地征集的，自然就是这些地方的当地人。

(二) 清朝末叶屯边垦殖和民国初期官办垦殖移边开垦移民及其眷属。清朝初期，边塞汉人有私自到河套垦殖者，皆受到当地蒙人驱逐和官

府明令禁止。迨至清朝末年，汉人私下通过蒙族头面人物订立垦约，这时候汉蒙双方的官家才无可奈何。因为是私人开垦，免不了涉及许多利益恩怨，斗殴残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打开了这久经禁锢的围垦大门，早已为人垂涎不已的沃地河套当然不会被人轻意放过，于是捷足先登上河套宝地的便是山西北部和陕西北部贫困破产的农民，他们，只要一人入套，便拉亲托友、呼儿唤女的一大批涌进河套。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才正式下令开禁准垦，批准官商张之洞、岑春煊在山西设立的丰宁押荒局，并委派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专门管理垦殖事务。但不久因贻谷受参去官而大兴的渠务开垦一度中落。

民国以后，才为一些认为有利可图的官员们瞩目，他们报准政府成立垦务局，以不同地价招垦。自始，晋、陕、鲁、湘、甘、宁的移垦者相继接踵而至。

值得一提的是鲁民开垦。民国十四年（1925年）主事者王鸿一呈准山东省政府，由实业厅筹款七万元及各县摊派款共十四万元，供移民的开垦费用。当年来套的就有六百二十三户，约三千人（以后还有依附亲戚相继而来者）。惜经营不善，移民生活无法解决，不能进行稳定生产。移民有



小部分返鲁，部分转向街头搞摊贩贸易。是以至民国十七年只存四五百户。他们散居于五原、临河。其村名皆以“鲁”字作冠以示不忘故地。以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为村号。（如鲁仁村、鲁义村）至今犹在地名档案中查到其事。由是，河套的山东祖籍人定居下来繁衍为现代河套人重要的一支。

另有一支湘民移垦西北合作社，在临河六合公。有地五十余顷，本拟发展，但因民国十五年河套告变，主事者星散，是以不果。湘民以故来套甚少。

（三）建国后人民政府有计划部署移民迁徙来套定居者。如对密集的人口地区冀中白洋淀进行人口疏散，整治永定河兴修官厅水库对水库淹没区户的善后搬迁，使得不少河北籍的农民来套定居。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乌拉特前旗原属安北县的各乡村及五原县。又如五十年代，人民政府为建设祖国北部边疆，从南方各省（主要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等人稠地窄的省市），北方（主要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人口稠密省市）抽调了大批刑期较长（五年以上至无期、死缓）的犯人来内蒙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完成集二、包兰两大铁路的修筑任务以及呼、包二市的一些基本建设任

务以后，大部分转到地方农场和厂矿。（如营盘湾煤矿、中滩农场、乌海、建丰、狼山、临河农场）从事工农业生产。刑满后人民政府又结合移民政策给予留场（厂）就业，接家来套定居。六九年遣散农村时，除中滩农场全部、临河农场大部送至伊盟安家外，其余全部放在巴盟，散居于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杭锦后旗、临河市、磴口县农村。

（四）民国以来，农村遭受刀兵水火的天灾人祸无法为生的逃难逃荒者。这部分人分两股来自两个方向。①来自东路：是冀、鲁、豫、晋、陕几省的人，他们经由京包铁路进入河套。大部分就近定居以至于远，所以在乌拉特前旗、五原落脚居多，向西侧依次递减，但陕北人例外，因陕北人在杭锦后旗落户的老居户是亲朋的居多，通过亲戚**夤**缘斡旋，下户问题较易解决。所以大部分到了杭锦后旗。笔者曾在一九七三年就亲见所住的小队一次下了五户从陕北府谷来的亲戚。②来自西路。这是宁、甘两地人。特以甘肃省武威地区的人最多。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一百几十户向河套涌来，目标重点是磴口、杭锦后旗，其次是临河，再往东则极为稀少。在磴口，几乎没有一个村没有甘肃民勤人，而且总在十多户至百户之间。杭锦后旗也是如此，不过

每村在十多户左右，比磴口为少。

（五）解放后由于建设需要，从中央或各省、市、自治区调来的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由部队转业来的转业军人、退役军人，由大专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教师。这些人来源复杂遍及全中国的各个民族（可能青海、西藏在外）。他们，大部定居在城镇，很少一部分因故散落农村。

（六）六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下放的知识青年。他们虽然在打倒“四人帮”后落实了政策，大部分已返回原籍。但也还有一部分因婚姻关系或其它原因留在河套定居。他们的定居地大部分在城镇的学校或事、企业单位中。他们的祖籍以京、津、沪居多，江浙次之，其它省区又次之。

（七）解放后为躲避政治斗争而逃亡来套的漏网地主、富农，反动政府骨干、军官，反动会道门的道首、道徒。他们大都在五十年代就定居河套。还有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时期流窜而来的盲流以及八十年代为躲避计划生育而来的超生户，来此定居的也不在少数。这一部分人最为复杂，祖籍遍及祖国各地，散居地点不固定，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些这些人至今还没有户籍（黑户）。不过，从调查中了解到“盲流”大多数来自西路的甘肃、四川，

“躲避计划生育”则大多数来自东路的山东。

如果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看还应该加上第八类人。他们是内蒙古包头市以东地区的人，有的是从东北调来的工人或干部，有的是在抗战期间平绥路沿线（内蒙古境内）各城沦陷撤退来套、光复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或不愿返回原籍在河套的定居者。本地称他们是“东川人”或是“东面人”。他们的语言虽然有些是晋语区，但语音、语汇与河套的语音、语汇也大不相同。

以上八大类就是现今河套人的组成和来源。

## 二、河套语言的形成

由上述可以看到河套人的祖籍多么复杂。这些人在群居的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就必然要运用各自的语言或是改变自己的语言学习当地的语言去适应它，才能让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得在生产、工作中发挥交流思想感情和在学习、生活中发挥交流经验感受的作用。在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但在语言的使用、特别在河套这片汉族人民占人数比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地上，汉语起到了主体作用。蒙语虽然在个别蒙族聚居的村落通用流行，但由于人数比例偏少，不能影响汉语作为主体的大局，只是处于对汉语有些微影响的从属

地位，绝大部分蒙族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套话。因此，本文所要谈到的河套语言，实指汉语中“晋语”区的河套方言。

### （一）河套语言的基础骨架

汉语，在世界语言谱系分类法中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是世界诸多语系中最大的一个系，拥有十一亿多人口。汉语是汉藏语系最大的一个语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语族，拥有九亿八千万以上的人口，汉语不仅在我国汉、满、回、畲族中通用，而且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中普遍使用，在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中大部地区流行，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唐人区流行。由于人数众多，居住地域辽阔，年长日久，内部彼此分歧逐渐增大，又分出官话大区、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语、闽南语、闽北语八大支，其中以官话区方言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官话大区下分北京、北方、胶辽、冀鲁、中原、兰银、江淮、西南等官话区，它奄有东北三省、京津二市、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江苏江北部、安徽大部（以前把河套方言列入为北方话中北方官话内的<sup>n</sup>g音地片）。从一九八六年全国方言调查定论后，河套方言又归属于新从北方官话区划出来的

“晋语区”五台小片内。河套语言的基础骨架是来自山西北部 and 陕西北部，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晋语区，所以，河套语言的基础骨架（指语言所属的语音，语汇和语法）无疑地属于晋语范围。但由于融合了早期开垦的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加上近期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混合，同蒙古族长期共处的影响，语言的“晋”味已经趋淡，再加上吴、湘、赣、闽、粤、徽、客家诸语的掺和，又增加了一些亦南亦北的口气。普通话的提倡和在学校实行教学，又有向普通话转化的趋势。近年来流行的河套语言已逐渐失去山西、陕西北部晋味的特色，有官话倾向，有各语的杂拌气，还有普通话的变形，间或还流露出一些蒙语词汇，形成了今日既官非官、亦晋亦蒙大杂拌而又普通话的具有河套地域特色的特殊语言，即河套语言。然而，它虽是一种新型语言，却在大部分语音和语汇中完整地保留着晋、陕北鄙乡土老晋语的语言骨架。

从临河、杭锦后旗抽样调查的几个村的户籍和几所学校的学生登记表的籍贯来看，以山西、陕西两省的祖籍最多，其中山西省籍的以河曲、保德、偏关这三县偏多；陕西省的则以榆林地区所属的府谷、神木两县最多。而祖籍是甘肃的居第三位（但在杭锦后旗和磴口县则居第一位）。

甘肃省籍的以武威地区的民勤县最多，武威市次之。这些占比例最多的外省祖籍的人都是已经定居在河套有三代或更长时间的老户，时至今日，仍然在他们的曾、玄后裔中出现不忘故祖地的现象，确是耐人寻味值得去研究它一番的。府谷、神木、偏关、河曲保德这五个县从现在的行政归属看，分属于两个省管辖，但从地理的角度看，却都在黄河的东西两岸，都靠近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从历史演迁看，战国时期同属于赵国新辟的疆域，以后又同时为秦国吞并。在秦王朝和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几乎同属于一个州郡。晋王朝五胡乱华时代以及南宋偏安时期为异族占领期间也总是属于同一外族的管辖时间居多，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清朝末叶、民国初期，才因黄河的隔阻把这五县按河的东西位置分划为两个省管辖。因此，虽说是两省人而他们的语言基本相同，风俗习惯基本一样，小异之处绝少，是标准的晋语区范围。这五县由于地处偏僻，与外界交往极少，长期的闭塞状况历史赋就他们极强的保守性，短时期难以动摇他们烙印很深的祖籍语言。他们北迁开垦河套的时间最早，定居的人数也最多，在河套的定居分布点也最广，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村寨没有他们，而且占大多数。他们扎根深、影响大，河套

语言中处处流露出他们的乡音土话。所以说，陕北、雁北的乡音土话构成了河套语言的基础骨架。

(二) 受到的影响：现在的河套话毕竟不是原原本本的陕北话或雁北话。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它呢？这就要谈到影响和形成问题。受到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 干扰和影响最大的是西北的兰银官话。

原因之一是河套的西部唐代就属于朔方郡，以后在清朝又隶属于宁夏省，民国时期还是马鸿逵的管辖之下。开垦河套时马鸿逵曾在临河设立开垦点，因而迁徙入套的回、汉两族人不在少数。

原因之二是地处古沙陀国受沙漠包围的甘肃省民勤县，是干旱最为严重的地方，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的境况逼得他们出外寻找活路。民勤距离河套不远，早已听闻这片膏腴之地。所以自民国以来至解放期间，他们就离乡背井，扶老携幼跨过腾格里沙漠投向河套的怀抱，先来的尝到了温衣足食的甜头又给贫瘠的家乡捎去报喜信，以至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自民勤托亲来河套定居者仍络绎不绝，至十年动乱时臻达高峰。他们的定居分布点是由西向东推进，首先占领了边口的磴口县（磴口县的民勤户比例最大，村村队



队皆有，有的村队简直是清一色的民勤户)。继而向毗邻磴口的杭锦后旗西南进军以至最后充斥了杭锦后旗的每一个村落。但比例次于磴口。笔者试举曾居住过的光荣公社红太阳七队(1969年春)的居民祖籍为例。如表(见102页)

当然，这只能反映河套西部的一部分情况，不能概代全套。其它地方如中部的临河、东北的五原、东南的乌前旗与西南的磴口县，调查起来将是另一个样。举此例只不过有助于了解西北兰银官话在河套所起的影响，并给后面要谈到的河套语言内部的异同作一点说明(由于迁移的人数由西向东依次递减，那么影响也就因强而弱地递减造成东西的语音分异)。

②其次，对河套语言形成起强有力的影响的是冀、晋、豫、东北各省的移民。他们的移居情况已如第一章所述。他们的定居点是自东而西依次递减，以乌拉特前旗最多，五原次之，临河又次之，至于杭后、磴口就微乎其微了。但对山东人来说，则临河五原两地最多，杭后次之，磴口及乌前旗是微乎其微。

由于这东、西两股强有力的影响，河套东、西两端的语言发生了可以觉察的差异，尤其是语音，一出口便可以听出东西的不同。因为拼音字数最多的两个韵an和ang，河套东、西部读法迥

祖籍 项目	祖籍										
	总计	陕 二 县	山 三 县	西 三 县	甘 民 勤	肃	北 京	山 东	安 徽	江 西	广 东
户数	44	17	5	9	3	2	1	1	1	1	5
人口	166	53	15	53	10	10	1	5	3	16	
占比例 %	100%	25.6	9.2	25.6	6.1	6.1	0.6	3	1.8	9.8	

到了1979年，十年后的变化如下表：

祖籍 项目	祖籍											
	总计	陕 二 县	山 三 县	西 三 县	甘 民 勤	肃	北 京	山 东	安 徽	广 东	宁 夏	下 知 乡 青
户数	59	26	7	10	3	2	1	1	1	5	2	2
人口	262	104	37	58	14	12	1	6	20	2	8	
占比例 %	100%	40.1	14.1	22.1	5.3	4.5	0.4	2.3	7.7	0.8	2.7	

然不同。东部为晋语大包片的基础骨架却为北方官话区所干扰影响，；西部为晋语五台片的基础骨架却受到兰银官话的侵染，西部比东部在an韵上多了个开首〔i〕成了三元音复合韵母，而东部则在ang韵上多了个中介元音〔a〕成了两元音的鼻化韵母。其它异同在后面第四章中详述。

③又其次，对河套语起影响较轻的是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包括苏北方言、南京方言、皖北方言和鄂语。西南官话包括川语、滇语和广西官话。一方面是这些地区来河套定居的人较少，到来的时间也较晚；二是他们来到河套后大部分人讲的乡谈为河套人听不清也听不惯，因此影响较小。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他们谈的是较为蹩脚“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语汇也大多来自故里。因此，在年长月久相处的互染中，也就免不了在不知不觉之中融进或多或少的乡音，添加一些他乡词汇于河套语言中。

④差别更大的湘语、吴语、粤语、客家话、闽语、徽语、赣语这七大方言对河套语言的影响就很微小了。几乎可以说在语音方面丝毫不受影响，只不过稍许添加一些来自他们异乡河套人感到新鲜好奇的词汇罢了。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运用别人听不懂的祖籍语言与河套人交流，失去了他们祖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这一作用，只能借助于普通话

这一桥梁来进行交流，他们的后裔已经完全忘却祖籍语言，甚至有些后裔不但不会说，就连听也听不懂，说的是完全的河套话。

因此，我们就明白了河套这一地区的特殊语言是这样形成的，即：以最早来到河套开垦而又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山西、陕西晋语区的人扎下深根的晋语为基础骨架，流通语言为起点，接受了东西两路各类与晋语较为接近的各类官话的融合，又吸收了汉语在全国分布的各地方言为河套人乐于听用的乡音语汇，加上普通话的普及影响，最后形成晋语区独有的一支地方方言。

### 三、河套语言的特点

语言的特点是通过语音、语汇、语法这三方面表现出来的。要说明一种语言的特点，还必需有与之对比的另一种语言。本文在探讨河套语言的语音、语法、语汇时，均采用人民政府在全国公布推广实行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作对比。间中亦有采用其它方言对照处，但一定附加说明，为的是避免混淆不清。未标明某方言的，则是汉语拼音和普通话。

（一）语音：语言必须通过语音这一形迹鲜明的外壳来表达。这种声音，不是随意发出的无意义之声，乃是通过思维形式由发声器官按一定发

音方式发送的声音，这声音，代表一定的意义。语音和一切声音有一个共同点，即同是物理现象，由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四要素所组织。

音高方面，河套语言在发音时有偏低的沉重感。它比普通话多一个古入声，加上轻声则有六个声调，实际调值略比普通话低，阴平调值相差较悬殊，普通话为55，而河套话为35，阳平调则比普通话高为55，恰好与普通话的阴、阳平调值相反（普通话阳平为35）。上声略比普通话低，普通话为降升调214，河套话213，去声与普通话相等，都是降调51，只有入声43是河套语言所独有的声调。河套语言的入声比其它方言调值较高。

音强方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强音重音多数落在开头第一个音上，特别在短句、叠词中最为明显。这是因为河套语言“子化音”少，语句较短洁。如短句“好·不好”，“缺·德”，“讨·厌”，“谁·去呀”，“才·不咧”，“那·是”，“这·是”，“鬼·东西”“上·来”等。叠句如“娃·娃”，“姪·姪”，“紫·英·英”，“白·生·生”，“黄·澄·澄”，“阳·婆·婆”等（“·”号加在下面者为强音重音）。

第二种，轻声大多落在句的末尾。河套的“儿化音”特多。在名词和代词、动词几乎随时

能听到词尾的轻声“儿”。(r)。如猫儿、花儿、铃儿、钱儿、这儿、那儿、玩儿等。

音长方面：因为河套语言保留了几乎全体的古入声，入声发音短促，最后还带明显的喉塞音，所以入声的字词多到几乎每一句话中都有，所以，河套语言中，音与音的长短便显得异常突出，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听到有明显的长短音（用于抒情的长短音例外）。例如“你去呀不？”（一表长音，-表短音）。“谁去不一样。”，“到底还是一场空！”，“给咱捎带点。”，“钢铁长城”，“面不改色。”等。

音色方面：河套语言吐字虽见吃力，但字句极其清晰，音调纯正，易于分辨，没有含混不清、诘口聱牙的毛病。语句通常较短，简洁有力。

语音与官话各区差异较大，对比汉语拼音亦然。

#### A, 声母:

河套语言声母共有二十八个。它们是:

b 巴拜帮包杯本崩比标边

p 爬排盘彷徨泡培盆朋批偏

b' 八拔百剥薄北逼卜博不

m 妈埋满忙矛煤们蒙迷苗

f	香	芳	非	分	封	夫	斧	烦	放	肥
v	袜	威	穹	王	外	温	翁	窝	屋	勿
d	打	待	呆	丹	旦	当	刀	灯	低	电
t	他	台	贪	汤	涛	滕	梯	天	挑	厅
n	南	乃	拿	囊	挠	内	能	农	奴	女
d'	答	达	德	得	跌	特	独	毒	夺	铎
l	拉	来	兰	郎	捞	肋	雷	冷	离	连
z	咋	在	赞	脏	糟	曾	贼	宗	走	族
c	才	餐	仓	操	策	慈	从	粗	崔	村
s	腮	三	桑	骚	森	斯	松	搜	苏	酸
zh	闸	铡	札	翟	哲	辙	只	轴	捉	杂
ch	插	拆	彻	吃	赤	出	戳	叱	尺	
sh	杀	勺	舌	失	十	刷	说	属	石	
rh	然	嚷	饶	惹	人	仍	柔	如	软	闰
j	基	家	奸	姜	皆	交	京	今	居	捐
q	欺	卡	千	腔	敲	茄	亲	穷	秋	区
ni	捺	逆	匿	纳	聂	拧	牛	你	年	娘
x	西	虾	仙	相	消	邪	辛	凶	休	虚
g	戛	该	干	肛	高	歌	给	根	工	勾
k	咖	开	刊	康	考	课	坑	空	抠	枯
g'	割	轧	鸽	各	骨	谷	刮	郭	国	革
ng	哀	安	昂	熬	偶	沓	肮	袄	岸	恩
h	哈	孩	酣	奔	蒿	河	黑	很	侯	乎
o	衣	因	英	忧	于	冤	岳	孕	月	云

与汉语拼音相同的声母有：b、p、m、f、d、t、n、l、j、q、x、g、k、h、r、zh、ch、sh、z、c、s等二十一个。其中zh、ch、sh三声母只限于入声字，如在舒声字则zh、ch、sh三母改读为z、c、s。

与汉语拼音相异的声母有：

ḷ、b'、d'、g'三个声母是河套语言特有的入声字声母。这三个声母的音不同于b、d、g三个爆破塞音。b、d、g三母是浊塞音的不吐气音，而b'、d'、g'三母则是浊塞音的吐气音（因印刷没有国际音标，故用右上角加小撇号以资区别）。

2、有v声母，汉语拼音中虽有此声母，但汉字中却无此声母字，所以只作拼外来词或汉语方言用。

v声母是浊摩擦音（不吐气），和f（清音，不吐气摩擦音）是一对相对的辅音。出现于河套语言的零声母以u元音为首的字中如汉语拼音中：

wa改读为va（蛙、娲、娃、瓦、袜等字）。

wan改读为van（弯、完、玩、万等字）。

wanɡ改读为vanɡ（汪、王、枉、忘等字）。

wei改读为vei（威、微、韦、卫等字）。

wo改读为veo（窝、我、卧等字）。

wen和wenɡ都改读为vonɡ（温、文、蚊、问等字）。



wu 改读为vu (吴、武、误、屋等字)。

3、有ni声母，汉语拼音无此声母。汉语拼音的n是后齿齶的舌尖齿上音，而ni则是齶颚间舌面颚音。此声母出现在与齐齿呼的n声母字中，此音与n和i韵相拼的音相近，好似n和i的合写(在字形上)。

4、有ng声母，汉语拼音无。此声母只出现于零声母的开口呼韵母中。如：

a韵：a、ai、au、an、anŋ，皆改读为nɛa、nɛai、nɛan、nɛau、nɛanŋ。

e韵和o韵：皆改读为nɛeo。

ou韵：改读为nɛou。

5、zh、ch、sh三母不管和任何韵母相拼，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字一概改读为z、c、s的声母，只有入声字才仍读zh、ch、sh的音。

6、rh声母与ong韵相拼时改读为u，如rhonŋ改读为uonŋ(容、茸、绒、融、冗等字)。

B韵母：

河套语言有三十一一个舒声韵母，十八个入声韵母，一个儿化韵母，共五十个(由于没有国际音标印刷字，很难用汉语拼音音符标出，故不能一一书写出)。

河套语言的韵母与汉语拼音韵母的不同有：

1、韵母混用。此为河套语言的一大特点。

有五对韵母混用不分。它们是：

①en韵和eng韵混用不分，都读成eng韵的音，等于说河套语言没有en韵。如奔、崩同音，笨、迸同音，分、风同音，奋、凤同音，坟、缝同音，粉、讽同音，门、盟同音等。

②in韵和ing韵不分，都读成了ing韵的音，等于说河套语言没有in韵。如：宾、冰同音，疾、病同音，乒、拼同音，贫、平同音，民、名同音，今、京同音，亲、青同音，新、兴同音，林、零同音，英、因同音等。

③un韵和ong韵不分，全念成ong的音，故河套语言中没有un韵。如春、葱同音，盾、洞同音，滚、巩同音，魂、红同音，昆、空同音，沦、龙同音，舜、送同音，孙、松同音，温、翁同音，纯、丛同音，尊、宗同音等。

④an韵和yong韵不分，都念成yong的音，故河套语言没有an韵。如裙、穷同音，旬、雄同音。

⑤ai韵与ei韵混用不分。绝大部分的ai韵字都念成ei韵的音，但例外地有几个ei韵的字反而念成ai韵的音，故而两韵并存。如歛、哀同音，害、嘿同音，埋、煤同音，贼与鲷两字反由zei念成zai，那和内反由nei念成nai。

2、河套语言有四个韵母改读他音。

①an韵全部改读他音。但改读情况东部和西部有差异，东部改读的a元音偏向于e元音，西部则除此之外还在韵头加有齐齿呼的i元音。

②ang韵全部改读他音。改读情况东西部也存在着差异。东部元音a偏向于e音，西部元音a偏向于o音。

③iang韵全部改读他音，改读情况与上列ang韵改读情况相同。

④ian韵完全改读他音。东部改读a元音偏向于e元音，而西部则将a元音换成偏向于o的e元音。

o韵，除个别字仍读o韵（如哨、哟等）外，其余大部分字改读为e音。

3、河套语言有部分韵母与个别声母拼读时，韵母改读为其它韵母音。如：

①zh与ai相拼时，ai韵母改读为e。

②p、m、f与ou相拼时，ou韵母改读为u或ao。

③n与ong相拼时，ong韵母改读为eng。

4、河套语言中还有个别韵的改读现象。如：

①n与u相拼，其韵母改读ou音：奴、拏、弩、弩、怒、努等字。

②l与u相拼时，其韵母亦改读ou音。因

此，噜、芦同音；卢、楼同音；鲁、篓同音；路、漏同音。由此可见u韵与ou韵亦有换韵现象。

5、河套语言中还有改呼现象。如合口呼韵母uang，韵母与g、k、h、zh、ch、sh六个声母相拼时，韵母改为开口呼的ang了，因此岗、光同音；匡、康同音；夯、荒同音；张、庄同音。

6、河套语言保留了古入声的全部（只有少数几个字如烙、六、剧三字转为去声）。这是河套语言区别于其它汉方言的又一大特点。而且河套语言的入声是全部以喉塞音收尾，与其它保留大部或一部入声的方言以韵尾-p、-t、-k有截然的不同，为节省篇幅起见，十八个入声韵母及一千多入声字不再列表介绍。

### C、声调：

河套语言连同轻声在内共有六个声调。古平声在河套话中已分出了阴平和阳平，这和各大官话区基本一样，但调值却完全不一样，与普通话相比，恰好翻了个个儿。

阴平：调值为325，为简略计，记作“-”，这调值与普通话的阳平调值35非常接近。

阳平：调值为55，记作“/”，与普通话的阴平调值55正好一样。与普通话相比，调值正好阴阳颠倒。

上声：调值为213，是个降升调，与普通话

上声调值214相比显得升调低一些。记作“∨”。

去声：调值51，与普通话去声完全相同，记作“、”。

入声：调值43，是降调，记作“。”。

轻声：大部分在儿化音后，记作“。”。

连音变调：两个平声连续，一种情况是前音读去声后音读上声。如爸爸(bà bā)，妈妈(má mā)，第二种情况是前音读平声，后音读上声，如天天，常常，铃铃，等。两个上声连读，则前音仍读上声，后音读平声。如奶奶，痒痒，耍耍，链链，锁锁等。两个去声连续，全不变调。

D 语汇（也可称作词汇）：

兹举一些经常听到而又与普通话及其他官话有异较为特殊的词汇如下（前为普通话发音，后为河套话发音）：

1、时间。拂晓：五明头。上午：前晌。中午：晌午。下午：后晌。黄昏：黑将来。昨日：夜来。去年：年四。前二年：大前年。后三天：外后天。目前：务今。向来：呆利。

2、地形。土围子：库联。高地圪旦。高条地：圪梁。高土埂：圪楞。低地：圪八。更低地：圪洼。村庄：营子。尖的突起：圪丁。角落：圪老。胡同：黑廊。住：缮。死结：死疙瘩。

3、称谓。父亲：大大。祖母：娘娘。外祖母：姥娘。岳母：外母娘（对外人称）。男性老年人：老汉。男性年青人：大后生。男孩：小子。女孩：闺女。兄弟：弟兄。弟弟：兄弟。最小的男孩：猴小子。最小的女儿：猴女子。大龄未婚男壮年：光棍汉。大龄未婚女子：老闺女。内兄：妻哥或大兄哥。妻妹：小姨子。

4、动物。公狗：牙狗。母鸡：草鸡。公猪：老骚猪。公羊：老骚胡。小羊：羔子。小公羊：羯子。公马：儿马。母马：骡马。母马发情：起骡。母猪发情：跑窝。小牛：犊子。小马：驹。蜘蛛：罗马蛛蛛。跳蚤：圪蚤。虱子卵：虻子。小蚊虫：蠓子。青蛙蟾蜍：蛤蟆。

6、植物。向日葵：葵花。蕃茄：洋柿子。马铃薯：山药旦。腌白菜：酸菜。

6、职业。各种工匠：耍手艺的。乞丐：讨吃子。厨师：大师傅。接生婆：老娘婆。售货员：站柜台的。更夫：下夜的。门卫：看大门的。

7、衣物。上身衣服：袄儿。下身衣服：裤儿。鞋：鞋钵子。被子：盖窝和盖绉。

8、天气。落雹：下冷子。逆风：呛风。出虹：现绛。天气转冷：凉哨。

9、动作。蹲下：圪就。来回扭动：圪拧。

瞎参合：圪搅。不正：圪歪。伴行：相跟。午睡：歇晌。闲谈：叨拉。看望：眊。丢弃：蛮了。遗失：耳了。抛掉：冒了。抓捕：逮。追赶：断。摸捏：揣。观望：瞭哨。吩咐：安顿。累：熬。巧：利索。溜冰：打滑岔。说谎：兜没的。吹牛皮说大话：呵坨。发面：酵面、起面。骗：日哄。哄孩子：乖哄。精干：精把。让开：起开。厉害：吃劲。闲游：逛跬或圪溜。代人待客：代东。步履不稳：圪扎。跌倒：蹶倒。接在一起：弥住。不随便：拿捏。通奸：打伙计。

10、形容。逗玩：耍笑。不自在：克凉。伤心：凄惶。严声：嗓。丢人：败兴。没本事：爬长。受害：圪制。凶横：日恶。奇怪：日怪。怯弱：佻。闹矛盾：闹饥荒。欠债：拉饥荒。折：撮。热闹：红火。罗嗦：咬喃。闯祸：拉下圪旦或戮拐。损害：作害。求告：央计。样子：相数。鬼祟：鬼眉溜眼。嫉妒：眼气。孤单：孤哨。似睡：迷糊。糊涂：胡噜。不景气：灰塌二胡。忙乱：碰头七坎。有趣：失笑。风趣诙谐：老央。

11、其他。笑人痴呆：唐货或粘子。造作：圪耻或圪掐。经营：刨闹。无赖：嘎杂滓。弯曲：圪溜。中空：圪桶。杂种：圪泡。深坑：圪洞。聪明：日灵。乌鸦：黑老哇。猫头鹰：突丝

怪子。很：赫勒。无论如何：长圆或贵贱。彻底  
闹垮：日塔。顶棚：仰尘。完整：囫囵。淡而无  
味：寡。淡：甜。不平展：圪绰。

12、河套语言保留下来的古词汇特多。为省篇幅，仅举其最为人们熟悉和常用者十数则为例。

①昨天叫“夜来”。此词出自古《书经》。

②午间叫“晌”。出现在南唐后主词《浪淘沙》，元曲和《西游记》中也多次有过。

③无论如何、反正叫“长圆”此词出自很古老的《史记·魏其武安侯传》中。

④闲谈叫“叨拉”。此词在元曲杂剧中屡屡出现。

⑤凑合、对付、暂且叫“圪且”。此词出自古代文言词的“苟且”，《汉书》、《晋书》多有刊载。

⑥“攮”在河套话中有二义，第一义念cuān，意思是聚集、围拢。此词出自《墨子》。第二义念zān，意思是挣下了或积蓄，此词在《西游记》多次出现。

⑦揽长工的“揽”引申义有承接、包干、承担的意思。此词出现在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庄子》、《古乐府》、《苏东坡诗集》中。



⑧ 吃搅的“搅”。第一义捣乱。出自诗经《小雅》；第二义拌和，出自唐代张彦远《历史名画记》中。

⑨ 干活叫“动弹”。出自《水浒》传。

⑩ “挛”这词，河套话念luán。“挛甚”是干什么，“挛头子”是无意义的白干，“不和他挛了”是不和他联系共处了。这“挛”字出自《易经》和《汉书》。

⑪ 掴念guā，河套话念刮，即打耳光。此词出自唐卢仝的《示添丁诗》。

⑫ “趿拉”一词出自《西游记》。

⑬ “摺”是放置。此词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

⑭ “揣” chuāi，河套话第一义测度、估量叫“揣摩”。出自《战国策·秦策》；第二义怀藏，典故出自《西游记》。

⑮ “克巴”由古词“掐巴”转化而来，指折磨、算计他人。此词在古小说《醒世姻缘》中多次出现。

⑯ “拴”是元朝杂剧中常用词汇。

还有很多，如咬哺、囫囵、口信、呵坨、众人、甚、打饥荒、捱、掌柜的、挨、呛、撮、撵、撵等词，都一一能在古籍书中找到它的出处和踪迹。

河套话所以保留如此之多的古辞，与它的地理僻远、历史的战争频繁、民族交错的开垦、政治的阶级压迫原因有关。尽管河套有天然赋予的独特优越条件（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水利便利），但在旧中国漫长岁月中，长期困守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老百姓，仅能世世代代地保守地固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余荫——闭塞落后、愚昧贫穷，语言就能例外吗？

⑰如今河套语言的词汇仍然是单音词居多，许多别地区已经发展为双音词、多音词的词汇，在河套仍为单音词。如“什么”叫作“甚”；“怎么样”叫作“咋”；“可以”、“能够”、“行得通”叫“能”；“不行”、“不能”、“不应该”、“不可以”等一切否定词都用一个字“不”代表。动词的单音词更多，一个“格”字可以表达许多不同的意思。

建国以后，不少单音词已向双音词和多音词过渡，如糕、油、井、布、鸡、床等因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商品品种多样化而有了附加特指成分成为复音词了。

所以说，社会的政治制度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兴衰，社会经济的兴衰又以人们物质拥有和精神拥用为其标志，而这两种拥有的丰富又导致语言发生适应性的变化，从而在另一方面推动着社会经

济更进一步的发展。

⑱河套语言的叠音词最多，随时随地都能拈来一大串。如名词叠音阳婆婆、竹篮篮、油坛坛、醋罐罐、麦秸秸、麦鱼鱼、满山山、毛眼眼、满肚肚，对门门、白脸脸、酒盅盅、手腕腕、柳梢梢、半炕炕、一盞盞、满锅锅、满家家等。动词叠音开门门、说话话、打铲铲、磨刀刀等。其形式有AAB式，ABAB式，AABB式，A 乞BB式，A 格BB式，A 个BB式等。

⑲河套语言歇后语也是比较多的。很多既幽默诙谐又有很浓的地方特色。如：咱是那小庙的神——承受不了那大香火（暗喻无福享受特殊宠惠）。狗戴帽子——装扮起好人来啦（讥讽假充好人）。灶王爷伸手——想拿糖咧（讥讽拿架子）。窟窟眼窍多了——这心就不实在了（讽喻居心不良）。姓羊的——前怕狼，后怕虎（剖解胆小鬼）。电线杆刻图章——大材小用（惋惜人才）。狗吃青草——长得一付驴心肠（暗喻坏人使坏）等。

⑳河套语言的串话。河套八百里广阔无垠，人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内，大自然赋予他们豪爽奔放的性格。给他们以乐观好胜的性情。所以在交谈的对话中，为了调笑戏耍，经常用“串话”这一独特的表达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就在上下

辈、至亲好友之间，也莫不如此。如：

骑着骆驼牵着鸡，高的高来低的低。

骑了个骆驼吆上个猪，可把事情做了个苦。

一个指头能戳破天，真把自己说了个玄。

介绍信想盖大红戳戳，快送上羊肉砣砣，有了老羊（羊肉）和老胡（胡油），一路顺风没人堵。

花椒树上结核桃，不信你那个鬼圪嚼。

②方言与外来词：

由于从四面八方赶来河套的人从五十年代开始逐年增加，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减少，最近几年已趋于停止，因此，原本就留传在外地的方言，也就有一些为河套人所用，渐渐流传于民间，由传播而趋于稳定。如广东话“顶呱呱”（最好），吴语“拆烂污”（从中破坏），豫语“啥”（什么），北京语“是吗”（包括河北）土默川语“没有洁”（没有了），湘语“相因”（便宜），川语“活路”（职业）等方言就成为河套语言范围内的辞汇出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语也有一些渗入到河套语言中来。这是因为蒙古族在河套居住已有好几百年，在河套地域，除去汉族就数蒙族人多。比较显著的是不少地方名采用蒙语译音。如磴口县有许多以“套海”命名的地方（“套海”蒙语是河

湾的意思),如“沙腾套海”、“沙金套海”、“哈腾套海”、“巴彦套海”、“纳林套海”。还有“乌兰布和”、“补隆淖”、“包尔盖”等命名的乡和农场。临河有“丹达木头”、“黄羊木头”、“乌兰淖”、“乌兰图克”。杭锦后旗有“三淖尔”、“小召”、“召庙”等不胜枚举。

除了地名以外,其它词也有蒙语转化到河套语言中来的例子,如蒙语把打猎时用的棍子叫“布鲁”,河套语把棍子叫“不浪”就是从蒙语转化而来。又如蒙语把火柴叫“曲登儿”,河套话称火柴为取灯。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河套语言吸收了不少可为我用的外来词。有些外来词已普遍流行于河套城乡,成为河套语言的一部分。如:

一般名词:“巧克力”、“冰淇淋”、“咖啡”、“法兰绒”、“白兰地”、“威士忌”、“白朗宁”、“来福线”、“爱克斯光”等。

#### 四、河套语言内部的异同

同汉语的分有各种内部方言一样,河套语言内部各地、各阶层、各不同年龄的人之间也有大同小异的区别。主要可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东西地域的异同:

处于河套东端的乌拉特前旗，一是地理环境与包头市接壤，二是该地移民大部分早期来自山西省的雁北、忻县、晋中等地区，建国后才有了冀民的大量迁入，接着才有鲁中、辽西、内蒙东部等地人的迁入，陕西人迁此数量有限，不足以影响大局。最后来的江淮、西南官话区及南方诸省人，一是人数少，二是大部分在城镇，更影响不了晋语的语音语汇，因此，东端的河套语言是晋味较足，还杂有京味，北方官话味，比较接近普通话，与包头市、土默川话相仿佛。

处于河套西端的磴口县却是完全另一个样。一是磴口县原属宁夏省，一度属甘肃省，与西部的兰银官话区毗邻，二是早期到这里定居的大部是伊盟黄河岸及陕北、银川方面的人。陕北的老晋语至此无法独占鳌头，只能与西北的兰银官话平分秋色，加上五十年代以来移来定居者绝大部分为甘肃的民勤人，京、津、鲁、豫、冀以及南方诸省来此的人很少，几乎谈不上什么影响，因此，这个县的河套语言便有了“晋味不足，民勤声入”的杂腔。这样一来，与东端的乌拉特前旗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中间五原、杭后、临河的情况是：杭后较偏向于西，这是杭后有了大批的甘肃民勤、宁夏各地的移民，但最早到来而又人数最多的还是陕北

人，其次是雁北人，因此晋味仍是很足，只不过被民勤腔冲淡了一些而已。五原则较偏于东，偏向于被东面几大官话区的冲淡，因为移民有一半以上来自晋语区。临河则位于两者之间，临河早期移民是陕北、雁北各半，山东一部分，所以他们的语言就此生了根，后来大增的移民不管来自何处，均未能影响老晋语的大局。因此，东西两端的分界线可从临河边缘上划，把临河划为西端是因为临河有自西而来的移民，语言受了一些影响。当然，要明确无误划出分界线是很不容易的。

东西两端明显区别只表现在几个韵母上。

一是汉语拼音的〔an〕韵，东音念偏于e音，西音念偏于i音。汉语拼音的〔ian〕韵，东音念偏于e音，西音念偏于〔ae〕，而处在中间的临河、杭锦后旗念〔ian〕。汉语拼音的〔uan〕，东音念〔vaen〕，西音念〔van〕。汉语拼音的〔yan〕韵，东音念偏于e音，西音念偏于i音。前面已经列表说明，这里不再举例字。

二是汉语拼音的〔ang〕韵。东音念〔aeng〕，西音念〔aoŋ〕。汉语拼音的〔iang〕韵，东音念〔iaeŋ〕，西音念〔iaoŋ〕，如：江、枪、湘，东音念如〔jiaen〕、〔qianŋ〕、〔xianŋ〕，西音念如〔jiaoŋ〕、〔qiaoŋ〕、〔xiaoŋ〕。汉语拼音的〔uang〕韵，东音念〔uaeng〕，而西音却由

合口呼改为开口呼，改为〔aog〕，与汉语拼音〔ang〕韵同音。

三是汉语拼音的〔ai〕韵母，东音与普通话相同，也念〔ai〕，但带尾音-n，西音则全念成〔ei〕音。如开、该、孩、呆、胎、奶、来等，西音念成〔kei〕、〔gei〕、〔hei〕、〔dei〕、〔tei〕、〔nei〕、〔lei〕。

其它声韵调，东、西两端相同，词汇有小异。

## （二）城乡语言的异同

解放以后，河套各旗县城镇的工商业开始起步，逐年递增地发展。城镇人口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特别是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以来，增长的速度更为显著。就以临河市城镇为例，解放初期不足万人，而今已有十五六万；为了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政府又在乡镇企业比较集中的集市设镇。这些城镇、乡镇居民，大多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为了工作、学习（机关、团体、单位、学校都首先表率推广普通话）、生产、贸易（工厂生产商品、企业和公司办转运推销，都需要与外界人士接触）的需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学普通话、讲普通话，也已经有一部分人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交谈。自治区东部调来的蒙、汉干部，他们居住在城镇，工作在机关都是讲的较为标准的普通话，有的全家如此，的确起到了推广普通话讲用



普通话的表率作用，由于这样的推波助澜，城镇的青年人已普遍能讲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大大改变了城镇讲老晋语的老习惯，使得老晋语大逊其色。

在农村则不然，居住在农村的农民，由于他们的生产性质必须守在田头地角；有些人长年累月守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极少有出外涉历的机会。牧区的牧人住在更加偏僻的靠山荒野地带，接触外界的机会就更少。这样的一种闭塞环境培育出他们语言守旧的性格，所以他们今天仍然讲用着老祖宗从山西、陕西、甘肃带来的多少变了一些但仍然气味浓郁的家乡话——晋语和东西两边官话区的混和话。这样一来，城乡之间的语言便有了差别。主要在语音和语汇上，语音，城镇人发音接近普通话，〔zh、ch、sh〕不仅在入声，在平声也能听出与〔z、c、s〕的区分来，〔ai〕韵音已不是〔ei〕韵代替，返为〔ai〕音了，〔ang〕韵也不再是〔aog〕了。农牧区的语音则仍如上说，语汇上城镇人多了不少接受自外来的新语汇，农村人则一如已往还是一套老语汇。

### （三）老一辈与下一代的异同：

老一辈与下一代的异同，在老居户中（有四代以上者）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今七、八十岁的都是在河套出生长大的，甚至他们的父辈、祖辈也是出生在河套、长大在河套。所以合家语言

相同。但这批人不多，只占三分之一左右。

河套现在的居民有半数以上的人是建国以后才赶来定居的。上至老年人下至中年人仍然说着典型的他乡话，即他们的祖籍话。虽然有些中年人也已经能讲用一些河套的日常用语，但不完全，且说得不伦不类，有些话象陕北话，有些话象民勤话，可有些话还象家乡话。所以就出现了如下几种怪现象：

①父母说南方话，儿女却说的河套本地话。

②祖父母说山东话，儿女们说的是普通话，但孙辈们说的是本地河套话。

③合家中除了十五岁以下孩童全说民勤话。

④父母说蒙语，子女则说普通话或河套本地话。

⑤夫说本地话，妻说普通话，儿女说本地话。

⑥父母说北方官话，儿女说本地话。等等。

总之，爷孙、父子、夫妇、兄弟姊妹、亲戚之间说两种汉方言以上或蒙汉语两种的家庭不在少数，不仅城镇如此，农村亦然。

综合上述，可以给河套语言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了。

河套语言是以汉晋语作基础骨架，融合了各官话的一些特点，又受各方言及蒙语影响的有河套特色的语言。

# 对旧社会“新生活运动”

## 之片断回忆

刘培荣

### 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背景：

“新生活运动”的提出是在红军长征进入陕、甘、宁边区后，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的东北军势力，与之协同剿共，并以“拥护一个领袖，团结一致抗日”的号召，实现蒋张合流。为此于一九三四年在汉口成立了“四维学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担任会长。并制定会章，设立了理事会，推定理事十五人，东北军的王卓然为理事长，蒋系“复兴社”的刘健群为副理事长，贺衷寒、邓文仪、袁守谦、阎宝航、高崇民等十三人为理事。该会先在汉口设立了“新生活俱乐部”，接着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区分会的“新生活俱乐部”。当时正值抗日气氛弥漫全国，抗日浪涛日形高涨，而蒋介石所谓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说教，已不得人心，

失却市场，人们对剿共行动反感很大。其时全国人民“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声浪鼎沸，蒋介石慑于人民的反日怒潮，伪装同情抗日，但又以“和平非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论调，对抗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当时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统一了中国，而实际上各省的封建大军阀都是各霸一方的小皇帝。如：晋绥的阎锡山，两广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新疆的盛世才，甘、宁、青的五马（马步芬、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仲英），他们表面上服从中央，其实皆是心有所怀，各行其事，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对大西北鞭长莫及，根本统驭不了。再加上日寇唆使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疆自治运动，在德穆楚克东普鲁的鼓噪下，也蠢蠢欲动。蒋介石为了转移众目睽睽的抗日视线，缓解与时俱增的抗日怒涛，用新生活运动作为精神支柱，以统一思想、集中意志、拢络异己、共同剿共，所以于一九三五年在报上宣告成立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并通令各省市都要建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四维八德”作为举国上下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河套虽地处边陲，行动较缓，但亦于翌年在五原、临河相继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这一组织机构。

## 二、后套地区的状况：

当一九三六年在后套地区五、临两县推行“新生活运动”之时，这里的境况是渠道纵横，人烟稀少，芨芨红柳，遍地丛生。西起三盛公、四坝、太阳庙一线，东至西山咀、乌梁素海，南临黄河，北到狼山湾一带，东西长320华里，南北宽120华里，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二十万。阴山横亘于北，西山咀、卧羊台阻拦于东，在公路还不够畅通、陆路处于无形的情况下，唯一的交通全靠黄河水运和驼运，如五原的义和渠贯通街市中心；临河的永济渠、丰济渠、黄土拉亥河、杨家河，木船、皮筏畅行无阻，来去频繁，成为套内各村镇与包头、前后山一带及宁夏、兰州等地区之商业物资转运中心和交易腹地。临河马道桥为河套中部水运交通枢纽，陕坝园子渠口停泊船只可达二、三百只。五原义和渠桥每于通航季节，船只亦有百艘之多，进入城内桥东西两岸。位于五临两县之间的天吉太桥，船筏络绎不绝。五临各码头年吞吐量已达2500吨，均系私营船业所承运，为河套水运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在当时来说，确为“新生活运动”的宣导，创设了便利条件。否则，只能停留于县城一隅之地，而对广大的农村，因缺乏交通工具，无

法深入下去。那时的后套还没有摆脱文化晚开、教育落后的处境，五临两县仅在县府所在地设有完全小学一、二所，没有中等专业学校，到外地就学的也寥寥无几。要说多的话，那就是烟民多、娼妓多、盗匪多。大烟流毒后套，开始于民国初年土匪蜂起之时，直到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阎锡山派兵屯垦后套时，土匪为患，甚为炽烈，大家小户不能安居乐业。虽然屯垦军进套后，剿灭了大小股土匪，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清乡，而潜在的匪徒，仍散居于偏僻的角落，伺机进行抢劫。又加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打宁夏败退下来的散兵，落荒鼠窜，其少数官佐随身所带的小武器（手枪和八音子），在大军缴械时，未被搜查没收，而给后套境内潜伏下不安因素。明抢暗算，请财神、绑票的事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罌粟籽在后套也落地生根。后套地区广种大烟，占地将近二十万亩，临河种烟最多时达到十万五千亩之高峰。因为种大烟经济收入比农作物高出好多，由于普遍种大烟，造成普遍抽大烟，就以五原、临河来说，全县成年人的35%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城市和集镇都设有烟馆，彰明昭著地出售“清水净烟”。由于抽鸦片成瘾，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好人抽成灰人，健康人抽成病人，病人抽成死人”者比比皆是。许多因抽大烟

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甚至服毒自尽者亦时有所闻。有些烟鬼倾家荡产后铤而走险，沦为盗匪的也还不少。妇女为吸食鸦片而卖淫作娼，混渡时光，明的暗的屡见不鲜。不但破坏生产力，而且摧残了人的身体，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 三、“新生活运动”的宣导与推行：

从一九三六年春，临河、五原按照省令，分别成立了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临河由县长陈令德兼任主任，五原由县长马汝骥兼任主任，在各该县政府民政、教育和公安局的协同工作下，会同机关学校，组织员工学生，在城区街头巷尾、集市贸易点、公共场所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宣讲活动，其内容以“四维八德”为中心题材。所谓四维就是“礼义廉耻”。说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欲张，国乃复兴”；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每个宣讲员都是依据统一印发的“新运”手册，进行宣讲。手册之全部内容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项道德规范。并阐述何者为礼，“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何者为义：“义者宜也，舍己救人谓之义”；何者为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

廉”；何者为耻：“耻者痴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要求人们既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既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教导人们只能服从，不可反抗，作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俯首贴耳地听其摆布。便于贯彻蒋介石一再坚持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的主张。当“新运”宣导期间，对有损国粹的黄色书刊，危害社会的迷信活动，以及共产党出刊的书报、宣传品，均在查禁之列，一经发现立即予以封闭，停止其营业，追究责任。并按照“新运”之规定，定期或经常性地督促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商号和城镇居民必须做到六要，即：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要求，以上所述之四维、八德、六要，乃是新生活运动所依据和推行的教条，也是它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并且认为“行动是需要，理论即是真理”，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还奢谈什么从困难中寻出路，在逆境中找光明。处变不惊，以变应变。养成道德风尚，创设新颖环境。厉行禁烟禁赌，取缔帮会邪道，加强防共设施等，也列为宣导新生活的课题之内。在推行整洁、简朴、迅确的六要上，按五临两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要求，在县城东



西沿街的商店，南北巷道的住户，都要在各自的门前安放一个或两个用红油漆标号的“太平水缸”四个耀眼醒目的大水瓮。各个互为穿插的小巷道之“太平水缸”责成街道间邻长定点安置。对规模较大、门面较宽的商店如五原的复兴西、福义隆、福和隆、永生号、德星明、晋益祥、久记、瑞生永、协成厚等百货商店，在铺面门前均安放两个太平水缸；此外还有专营茶叶的义昌茶庄，专营纸烟的恒兴西，专营食盐的日盛盐店，六陈行业的天恒永、大恒永、广泉永、仁和永等粮店，也都安放两个太平水缸。特别是王靖国在五原南街新建的资金雄厚、门面壮观而宽大的屯垦合作总社门前，安置了三个太平水缸。五临两县的商贾都向屯垦合作总社借贷和批发承销百货，使后套商业在衰败中有所复苏，蒙汉人民从四面八方，云集五原、临河县城进行物资交易。其时临河的大商号有万利和，小商店惠长源、复兴玉、同福元、隆振西，玉记酱园、振记饭庄、元丰粮店、万福斋糕点铺、德胜厚、文华茂、蚨来号、福元长，在其商店门前无不耸立着1—2个粗大的“太平水缸”。所有县城内的各机关、学校、各种作坊、民间院落，也都毫无例外地依据面积大小，安放相应数量的“太平水缸”。以至居民住户、邻里之间，也都照此而行，不能有所

违抗。

按照“新运会”的要求，每日早、午、晚必须清水洒道、扫除污物，经常保持地面整洁，讲求卫生。同时在街道和公路两侧，如五原、临河县城从东门到西门的这条街上，每隔二百公尺，还要栽一个路桩，上面写着“行人车马靠左边走”的字标，以指示来往行人和车马驮脚循序往返。有时庄户人进了城，因目不识丁而走错上下道，不但受到警察的训斥，还要款二角，以示惩处。并规定每周对饮食行业进行一次食品卫生检查，如发现有发霉或陈腐食物，不但吊销营业执照，而且处以五块以上银圆之罚金。

我记得那时在外地求学的中学生，于暑假、寒假期间，回到县里在教育局的指派下，分头担任新生活运动的宣讲员，每人发给“新运”手册一本，作为进行宣讲的依据。那时五临没有汽车，自行车也寥寥无几，如下乡宣导“新运”，冬天骑骆驼，夏天坐船筏，甚至三两个同学坐着二饼子牛车下到农村去宣导“新生活运动”。当地人还为搞“新运”编了一首顺口溜：“民国二十五年春，大家小户闹新运。门前放置太平缸，晨昏三次洒街坊。四维八德口头禅，无耻之徒更嚣张。废除邻闾兴保甲，翻箱倒柜整治人”。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国共携手合作，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形成了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在人们面前展示出新的希望，开创了新的生活道路。所有社会青年，在校学生感受最深。当时从学校到部队，从城市到原野，都在高唱国共合作歌，其歌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一条线上。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齐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两党亲密合作，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动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中华民族不会亡。”我和同学们深有感慨地说，这才算有了新的生活气息，开始了新的生活征途。

是年十月绥包沦陷，后套地区溃兵云集，五原、临河的县政府变成支差局，区乡公所都成了供应站，日夜忙乱着征粮要草，供应军需的事务。对新生活运动的宣导与推行，从而搁置起来，无人过问。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率部进套后，流亡到榆林的绥远省政府也迁回临河陕坝镇。五原、临河和退居到执子补隆的安北设治局，重新恢复和建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工作机构附设于各县政府民政科，这时的“新运会”空有其名，并无任何活动，实际是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一年绥包的日伪政权，配合日军在其

占领区所进行的清乡运动和汪伪政权倡导的“新国民运动”，鼓吹“和平反共救国”，展开法西斯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同年十二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汪精卫声称伪政权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同舟共济，渡此难关。并以确立战时体制为名，在日伪区全面控制战略物资，以供应日军给养。为此绥包日伪想方设法派遣敌探潜入后套，并暗运鸦片、料面及生活奢侈品，向我方套购粮食皮毛等军用物资。为此傅管区在敌我交界地区专设了缉私所，对盗运、贩卖粮食、毒品的走私犯，给以应有的打击。

一九四二年“新县制”实施后，于四三年即把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作，由各县政府移交给该县三民主义青年团接管。“新运会”主任一职，仍由县长兼任，书记责成三青团筹备主任或筹备员兼任。后套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计：米仓县乔学曾、刘培荣；临河县王一方、刘博；狼山设治局赵国鼎、马国珍；陕坝市政筹备处常佩三、韩佩兰；五原县薛佩印、郭秉章；晏江设治局张恒信、张却凡；安北县张玉璞、薛必达。

各县局“新运会”还刻有长方形木质印鉴，作为行文之用。下设总务股，由县府民政科兼办；宣导股由县党部兼办；推行股由三青团兼

办。并规定每月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清洁卫生大检查，以“新运会”名义，三青团牵头，由警察局、民政科、县城中心小学等有关单位，抽派人员协助之。

这时的“新运”，对礼义廉耻的含义，随着时势的需要，作了新的简明解释：说什么“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彻彻底底的觉悟”。而在“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六要要求上，也随着抗战的实际，一切从简。只强调生活务求简单朴素，行动必须迅速确实。而整齐、清洁不象抗战之前那样放在六要的首位。在新生活运动宣导方面，也有新的说教，提倡要有大国民风度的气魄；要厉行踊跃输将、慷慨捐献的义举；要具备洁身自爱、廉洁奉公的操守；要发扬激励奋发、明耻教战的精神。在八德方面，着重于忠勇为爱国之本，强调对国家要尽全忠，孝顺为齐家之本，对民族要行大孝。而仁爱信义和平，虽属八德之内，但不像提倡忠孝那样大肆渲染，出口效忠党国，入口大孝当明。并对关公（云长）很崇拜，认为关公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其人格体现，为人楷模；如千里寻兄之仁；华容放曹之义；秉烛保嫂之礼；水淹七军之智；单刀赴会之信；这不但是关公人格

上所具有的五德，而且是合乎我们中华民族基本道德的。通过弘扬关公精神，突出忠党爱国要求。尤其对国民党，三青团员能否对四维八德，率先躬行，以身示范，作为年度考核的依据，甄审优劣的标准。

笔者回想起抗战时社会上的人们，曾以讽刺的口吻，嘲笑的语言，对“新生活运动”流传着这么几句话：“礼义廉耻发空论，四维八德愚弄人。整齐清洁一阵风，简单朴素倒是真。行人车马靠左走，迅速确实溜后方。”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团实行合并，统一组织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归在县党部内。在“以党养党，经费自筹”的情况下，经济来源短缺，人员紧缩裁减，所谓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随之消然无声了。

# “十年黑暗 一线光明”

——杨家河土地纠纷案始末

(附明公乔培新史略)

武健康供稿 口述

武英士、苏希贤 整理

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与流亡在榆林办公的绥远省政府①，训令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②，飭该署调查临河县杨家河地方的大地主杨米仓（杨米仓于1922年病故）霸占农民土地纠纷一案并具报处理情况。专员陈应道转令正在临河视察的专署视察员乔培新受理这个案子。这桩土地诉讼官司，杨家河一带农民已经从临河县打到绥远高等法院，直至南京行政院司法部，有十余年时间了，但由于当时官场黑暗腐败，每次都因杨家买通赃官，使农民一再败讼。

在当时复杂的半封建社会和以权代法的环境下，乔培新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排除障碍，秉公办案，费了很大周折，经过辛苦地查档案，翻

地契，并到群众中深入进行调查了解，终于找到了地主杨米仓各种欺骗、霸占农民土地的确凿证据。乔在中共河套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写成一篇《关于杨家河土地案的调查报告》文章，发表在中共临河地下党组织创办的《临河日报》③，公开揭露了大地主杨米仓的阴谋和祸民伎俩以及各级贪官污吏欺压勒索农民的严重罪行，使其丑形曝光于河套人民面前，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临河人民欢呼此举为“十年黑暗，一线光明”，众口称颂乔培新公正廉明，伸张了正义，人民为之扬眉吐气。但也因之得罪了反动势力，专署把乔培新召回五原，两个多月未予分配工作，直至一九三九年春天，傅作义成立“绥远省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时，始任命乔培新为五原县委员会书记。虽然如此，但对绥远省政府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对于此案欲袒不能，终于得到了解决。

杨米仓如果伤天害理地霸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各级执法官吏如何置公理于不顾，而贪赃枉法、压迫勒索农民？这桩官司农民为何打了十余年打不赢？其经过情况，需要作一番追忆简述。这样，才能从中认识乔培新的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和人品的高尚坦荡。在当时处于有强权无公理的邪恶社会下，他从一个官位并不很高的专



署视察员身份，敢于同顽固的黑暗势力对着干，展开无畏的斗争，揭露了当时被省县显赫官吏所庇袒的杨米仓欺民罪行，以及社会、官场上的黑暗腐败现象，并能曝光于报纸舆论，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为人民伸张了正义，一时大快人心。其胆识与大无畏精神，当时蜚声于临河、五原与安北三县的整个河套地区，成为人口传颂的新闻佳话。

先从杨米仓的发家说起

民国六年（1917），河曲人杨米仓、杨满仓弟兄二人，因包办经营五原大地商王同春沙河渠的渠道与土地没有获得厚利，变更思想，另觅途径，转向河套西部创业。在今杭锦后旗之西，贿通当时杭锦旗王府官吏，用少量租银包租到手千余顷“永租”土地。因有地缺水，乃与附近各天主教堂接洽，借得巨款，订立“渠成浇过地亩后，尽先转租耕种，收租还债”的合同，遂邀王同春审度河流，勘定渠线，于民国六年开挖杨家河渠。此渠的河床线路自黄河岸义祥永、毛脑亥地方开口，向北挖至板斗甲浪出梢贯入乌加河，计全长为一百六十华里的杨家河大干渠，当开挖到二道桥以北地段时，不幸杨米仓、杨满仓因积劳成病，于渠未通梢之前，在民国十一年、十二年相继病逝，由大杭盖杨茂林以及二杭盖杨春林、

三杭盖杨文林继承父辈事业，继续开挖杨家河。直至民国十五年冬（1926）终于挖通并接入乌加河。因杨家家大业大权势大，老百姓通称杨家大地主为“杨柜”。

清末民初时期，汉民向蒙旗包租土地，有“水到哪里种到哪里”的规例，即渠道延长地亩则扩大、渠道缩短地亩就减少，当时人称“渠地”或“渠租地”。杨米仓开挖杨家河渠的同时，为占蒙地，又自杨家河凿口，开挖了准格尔河（民生渠）、黄羊木头渠、乌兰淖尔渠、陕坝渠、蛮会渠、三淖尔渠、老谢渠等七条大支渠。各渠之长，各有七八十里。由此随渠展地，占有土地扩大到数千顷之多，比他原向蒙旗立约包租之土地超出好几倍，大大地侵占了蒙旗与蒙民的利益。

苛刻收租剥削佃农的血汗：

这些渠道都是杨米仓雇上内地贫苦农民胼手胝足地挖出来的。当时渠工的苦很重，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工资很低，一般日工资仅能挣到三四角钱，而且还常常遭受施工头儿的打骂。但渠成之后，便成为杨柜的“聚宝盆”和“摇钱树”了。土地是“刮金板”，杨家河一带的土地很膏腴，土质之肥，农民誉曰“沙盖楼”。杨柜把土地浇灌后，出租给佃农耕种，收取高额租粮。他向蒙旗交纳的地租是很低的，一般一顷地仅六、

七两银子，而且还是在籽种入土长出青苗后，杭锦旗才派人来勘查实际播种面积，他给丈青人员“吃上好的，拿上硬的（银子，银元）”，买通这些官员，秋后按测定的亩数以多算少，交不了多少租金。可他向佃农征收地租时，就苛刻的多了，一般要高出蒙旗好几倍。若收取土地上的收获物抵租，时称“分股子”，有“四六”、“倒四六”、甚或“停半、对半”分成之重。地租之外，还要加征水费。剥削农民地租是他生财致富的重要手段。没多几年，杨柜就家大业大，财发万金，成为河套西部巨富，可与河套东部的王同春比富贵了。

#### 侵吞救灾款占夺农民土地：

民国十四年（1925）春，冯玉祥将军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为开发西北计，建置临河设置局，首任局长肖振瀛，筑城于强家油房。（民国十八年十月升格为县，彭继先为县长）。并在陕坝成立“绥远垦务第六分局”，开始丈放杭锦旗和达拉特旗向国家报垦的杨家河和黄土拉亥河灌域的土地，以便招民垦种，发展经济。地价定为三等：上等地每亩银元一元二角，中等地一元，下等地八角。并规定优先卖给原佃农民，谁交钱，谁领地，发给土地执照，国家承认为自己的永业田产，保障所有权。这原是冯玉祥将军爱国爱民

之意。但由于这段土地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的赔教地，当时划归天主教堂管业。农民在崇洋惧外心理驱使下，怀疑冯玉祥将军已将此地明令收归国有的权威性，深怕日后地权没有保障，故持观望态度，一时掏钱挂领者为数寥寥。同年底，冯玉祥将军率部西进甘、陕，参加北伐，农民更加畏缩不前，不敢冒然挂领这档土地了。第二年(1926)，绥远省政府以临河几年来连遭过境“兵祸”之扰害，为减轻民困，拨来十万元救灾“善后流通券”，其币值与当时的通货“平市票”(即绥远省平市官钱局发行的纸币)同值流通。杨柜的住地二道桥和三道桥时属临河四区管辖，是该区的巨富首户，被推为该区董事(即区长)。杨柜看到农民对挂领土地心存疑虑，觉得有空子可钻；又得悉省政府给临河拨来一大笔救济农民的“善后流通券”，就向县政府写申请，托词该区遭受兵祸最重为由，领到数万元救灾款，尽数贪污自肥。杨柜用这笔救灾款捏造了许多假名姓佃农名字，造具花名册，到陕坝垦务第六分局，上下打点，贿赂串通地亩局官员，交钱挂领了数百顷应该归属农民领业的土地据为己有。并将地照由杨柜私存，准备留给儿孙作产业。杨柜财欲迷心，贪婪不足，仍向佃农收要地租钱粮，一如既往的苛刻，从而激起佃农对他

的强烈反抗。

作贼心虚恶人先告状

杨柜以卑劣手段巧取豪夺，用贪污款向垦务局挂领占夺农民土地的事，没有不漏风的墙。嗣后被农民侦知，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引发杨家河一带农民于一九二六年进行过多次激烈的反抗。杨柜看到农民人多势众，众怒难犯，慑于人民威力，不得不将贪污到手的救灾款退给农民一部分，藉图敷衍民怨息争。农民开会决定：一面向临河县政府写信揭发杨柜的贪污和占夺民田的不法行为，一面公众议决此后不再向杨柜交租了。

“猪八戒倒打一耙”。一九二八冬，心术不正的杨柜以农民“抗租不交”是受共产党煽动为辞，向临河县县长王文墀告状，请求县政府严飭佃户迅速向他交租。那时候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杨柜上下买通官吏因而胜诉。县政府以“租田纳租例有常规”，说农民抗租是不法行为，飭令农民如额交租，不得违误。“有钱买得鬼推磨”。杨柜还买通县长王文墀任命杨家的四杭盖（排行老四的杨泽林）为临河县教育局局长，七杭盖杨贵林为教育局视学。从此，县衙门里有了自己的子弟参政说话。杨柜如虎添翼，在四区杨家河一带简直一手遮天，在山为王，为所欲为，没人敢惹了。临河县政府偏袒杨柜告状胜诉，农民不服，又于一

九二九年上诉于绥远高等法院，要求高院主持正义，为民作主，令杨柜退还占抢农民赖以活命的土地，岂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官污吏都是黑心肠，杨柜把杨家女儿许嫁给高等法院院长侯丰鲁的儿子侯定远为妻。法院的院长与被告杨柜结成了儿女亲家，为之庇袒，农民有理的官司没打赢，又败讼。高院把此案悬吊不理，搁置了好几年。由于农民几番追讼，高院又屈判农民上告有误，有违事实，于是置之不理，不了了之。农民倔强志坚仍不服，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通天上告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适值抗日战争爆发，司法部一时无暇顾及受理。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行政院始批转驻榆林的绥远省政府和驻五原的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处理这桩拖延十来年的官司。由于乔培新以第三区专员公署视察身份受理这个案子，在中共河套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才将此案原委查理清楚（见前文）。临河农民见到报纸上披露了这桩官司的经过情况后，额首称庆，奔走相告，人口传颂，誉之为“十年黑暗，一线光明”。当时农民还用感激的语言称颂乔培新为“乔青天”，这说明断明此案阻力之大，太不容易啊！笔书苏希贤一九三九年在黄羊木头八岱滩魏恒如家居住时，就听到魏的儿子魏振业（乳名方树，是我姑表亲兄，也是

动委会干部)跟我叙述过这桩案件的梗概。我还从魏手中阅过披露乔培新所作的《关于杨家河土地案调查报告》的《临河日报》，是当时震动河套民心的一大新闻，其情节至今印象犹深。

### 农民胜讼土地公营

乔培新《关于杨家河土地案的调查报告》见报后，大煞杨柜的威风，杨家河一带的民众欢欣鼓舞，无不拍手称快，河套各界人士亦对于杨柜祸民恶行舆论沸腾，使其名誉扫地。但杨家并不死心，一九三八年冬，他又写告冤信与驻榆林的绥远省政府，申辩此案纯系共产党鼓惑农民对他诬陷，要求为之重新调查澄清是非。一九四〇年春，抗击日寇的“五原战役”胜利后，绥远省政府派教育厅科长辛崇业（字级三，河曲人，与杨同乡，当时家居五原县今什巴格图乡辛柜村）去临河调查此案。辛崇业鉴于杨家河一带民众对于杨柜之霸道行径，人言纷纷，群情激愤，慑于民意难违，欲袒不能。为免事态闹大，不好收拾，也为杨家尔后着想，乃设下圈套，想用怀柔手段愚弄农民。于是，由杨柜的子孙辈杨忠、杨孝、杨义、杨廉、杨杰等人出面，置备丰盛的酒席于三道桥杨柜缸房大院，设下“鸿门宴”，邀请地方上的绅商大户作陪，宴请以刘成为总代表的一百多位农民，希图息争罢讼。但农民们已识破了

杨家的奸谋鬼计，到了这天，全部被请的农民，都是硬骨铮铮，一个也没有赴宴，使杨家的阴谋伎俩落了空，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人。

不久，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据报得知杨柜用卑劣手段以不义之财骗买了国家大量土地的真实情况后，为平民愤，也为树立傅作义本人的爱民形象和安置抗日阵亡将士家属及残废军人就业起见，断然决定，立即在临河县第四区平化乡三道桥，成立绥远省政府杨家河灌域“土地代管处”，遂将杨柜原承包于杭锦旗并已放垦的土地，除给本人留下自耕的土地外，其余全部收归代管处经营。以推行租佃合作，实现耕者有田为标榜。此后，凡原佃农户都向代管处缴纳租粮，其余土地安置军人家属耕种。杨家河一带农民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的与杨柜争讼的土地案官司，经过长达十二个春秋的斗争，至此，才取得完全胜利。难怪乎农民说是“十年黑暗”！从一九四〇年始，才获得了自耕农的身份和权利。杨家河一带农民每念及此，无不追思取得土地案最终胜讼之原因，是与乔培新一九三八年秋在共产党地下组织支持下的秉公查案与明断有关。“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这是杨家河一带农民认识到的与封建恶势力作斗争的真理。



农民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杨家河一带的农民，也和全国农民一样，分到了祖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成了国家和土地的主人。

### 历史如镜功过判明

杨柜虽然为富不仁，霸占农民土地，干了很多祸民恶行，但其开挖杨家河之功绩即在当时，还是有益于河套人民的。其开渠之动机虽然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但留给后世的客观效益，也给河套人民造了福。这条干渠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全系生工，其直如矢，流畅无阻，水量充足，效益之高，为河套十大干渠之冠。并且开挖了七条六支渠，六十多条小支渠，干支连贯，有如蛛网，多系杨米仓父子经手开挖，全渠灌域面积总达七千余顷。从民国六年开挖，历经二十余年之辛苦，父辈与子侄相继，辛勤艰苦，耗银七十余万两，勉强支持。曾将其妻子的金银首饰变卖，开付工资，以致债台高筑。其弟兄子侄多人为之忧劳过度，而相继早歿。杨家河灌域之土地固很膏腴，但是如果没有杨家河渠水利之便，何以开垦未久，竟能成为河套农业精华之区。水利是农业之命脉，故杨氏之功绩可与王同春并垂不朽。评价历史人物之功过，应以其对社会与人民

之贡献为依据，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杨米仓弟兄及其子侄辈。象杨米仓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是不能任其淹没无闻的。一九四二年，傅作义在河套实行新县制，将杨家河灌域新置一县，并以杨米仓的名字取名“米仓县”，以纪念其历史功绩，并将县政府设在杨家所居住的三道桥。今天说来，傅作义当时的举措是应该的，对的。（米仓县名于一九五四年撤销改名杭锦后旗）。

#### 附明公乔培新史略

乔培新家住包头过了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高头窑村（在今高头窑公社境）。是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派人去清华大学要毕业生，党组织考虑到他是绥远包头人，就让他趁机回绥开展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从北平出发，回到归绥报到后，傅作义分配他临时搞统计工作。稍后，去归绥中山学院教书，又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十月，绥、包相继沦陷后，他随流亡群众于一九三八年春辗转跑到了榆林。八路军驻榆林办事处负责人巩逢春同志劝他不要暴露身份，应返回河套或伊盟开展党的工作。适驻榆林的蒙旗宣慰使署总管荣祥派他和殷石林返伊盟达拉特旗大树湾，

策动伪军满纳生反正，但当他们到达大树湾时，满纳生已被日军缴械，此行不果。

一九三八年七月，乔培新随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陈应道来到五原，被任命为专署视察员。当时，临河一校的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谁料，该校校长李善庭（国民党员）却公开进行压制，师生们为之十分愤慨。乔培新以视察员身份到临河后，根据中共河套特委的意见，建议临河县政府把李撤掉，换上我们的同志，大大伸张了革命正气。

一九三九年五月，“绥远省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在五原成立，乔培新被傅作义任命为五原县动员委员会书记。经过艰苦的动员工作，使当时的五原城乡出现了浓郁的抗日景象：到处可以听到《军民合作》、《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嘹亮歌声；到处可以看到墙报、画报和大幅抗战标语。在一个时期内，五原城乡到处是“军民齐动手、团结起来齐抗战”的生动局面。使傅作义在第二年春收复五原的抗战中，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取得了“五原战役”大捷。

一九三九年十月，傅作义物色本地人到包头抗日前线工作，乔培新因是包头地方人，且尚未

暴露身份，使傅在政治上对他放心，而且在五原抗日动员工作有成绩，使傅相信他能开展敌后工作，因此被选中任命为包头县县长，同时兼任国民党包头县党部书记长（秘密身份是中共包头县委宣传部长）。乔培新接到通知后，带领人马立即上任，将县政府设在蒲圪卜村（在今黄河南岸达拉特旗乌兰公社境）开展抗日工作。

乔培新利用县长身份，经常深入各地了解敌人和友军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上级指示下，他还以县长名义，向包头各地发表了《告同胞书》，以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他还曾多次去该县四区境内东至哈什拉，西至杭锦旗边缘，向驻境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是杂牌军）进行慰问，宣传抗日。强调包头地处抗日前线，应该团结起来，保护人民利益。对这些杂牌部队认清抗日前途和稳定军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入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在河套地区的反共活动日趋猖獗。这年七月，乔培新因公去第三区专员公署（专署已自五原迁到东胜）述职，在专员陈应道那里，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文件。文件提出要“赶走驻伊盟的八路军”。乔培新立即向中共包头县委书记李秉清作了汇报，李又报告给中共伊盟工委负责人杨一木和李维新同

志，使他们提前采取了应变措施。

一九四〇年冬，中共临河县委书记赵子丰被捕叛变，使河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乔培新曾通过赵子丰与中共河套特委发生过横的联系，所以他也被赵供出暴露了，党组织及时把这一情况通知了他。乔培新带领几位同志离开县政府，躲到了苦计沟（现杭锦旗塔拉沟公社）。不久，傅作义调他当绥远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通知他回陕坝履新。他知道傅作义别有用心，没有回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傅作义拍电给伊盟游击区司令苏开元，让苏转告乔培新回陕坝。苏是中共地下党员，只与南汉宸同志单线联系。虽不知乔培新也是地下党员，但觉得其中有点问题，就写信让乔去他那里一趟。乔意识到处境危险，就带领保安队长胡庆云及薛巨明等九人，于三月九日离开包头县政府，到了苏开元那里。晚上，苏开元向乔透露了傅作义要逮捕他的意图。乔培新决定去伊盟工委，三月十日即从苏那里启程。在途中，他给张子岗（包头县保安队副队长，地下党员）写了封密信，告诉他情况紧急，迅速组织撤离。张子岗接信后，立即组织人员，带上武器，赶往苦计沟，他们会合后，星夜兼程奔赴伊盟工委。工委杨一木等同志经研究后，认为继续

留在包头有危险，就派人护送乔培新等去了延安。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傅作义下令通缉乔培新，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也亲署手令，以擅离职守罪通缉乔培新，而此时，乔培新同志已抵延安两月有余了。

对于乔培新其人竟是傅作义眼皮底下隐蔽多年并深受傅器重提拔的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当时陕北各界人士为之舆论纷纷。深赞其几年来身处险境做事稳健、履险如夷之才能，如果不是多才多智，何能若斯！

乔培新同志到延安后改名苏芝仁，被调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当副处长。解放初期，任西北人民银行副行长。一九五三年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九八二年退居二线，在中国人民银行当顾问，同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董事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 〔注释〕

①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十七两日归绥与包头相继沦陷后，绥远省政府迁到榆林办公。

②因省政府迁到榆林办公，为便于治理未沦陷地区，故当时的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辖着七个县：即绥中的萨县、托县、东胜、包头；绥西的五原、临河、安北。简称五、临、安、东、托、

萨、包。专员公署临时设于五原，并与五原县政府合署办公。

③一九三八年六月，在中共临河县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活动下，将《临河公报》改为《临河日报》。报社设在临河县民众教育馆内。临河县政府委任民众教育馆长侯福荣（中共地下党员，现名侯野峰，曾在外交部供职）兼任报社社长。报纸版面四开，单面石印版。每期销售四百余份，临河的机关、学校、农村以及五原、安北均有订阅。报纸宣传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县长私卖粮食等贪污事实，刊登了乔培新所作的《杨家河土地案的调查报告》。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团结了大批知识青年，教育与团结了各阶层群众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受到河套人民的欢迎。

### 附注

武健康，今年八十一岁，住五原，退休，三十年代曾在临河四区杨柜居住地平化乡当过“乡村建设指导员”，知道杨柜霸占杨家河一带农民土地的始末情况；又且与临河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兼《临河日报》社长侯福荣相交熟识，对《临河日报》披露乔培新的关于《杨家河土地案的调查报告》内容知之较详。

苏希贤（崇德），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在“绥远省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工作，从该会成立一直工作到该会撤销后调到晏江县与固阳县。在乔培新担任五原县动委会书记时，乔是苏希贤的上司，固阳县又与包头紧邻，故对乔培新在五原与包头的工作情况，当时耳闻目睹，有所了解，现还记忆犹新。

（解放初期任五原一中校长的刘进仁同志，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曾任中共临河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间的公开身份是临河县动委会书记，与笔者苏希贤都是动委会同事，彼此相识，苏以上司及长者视之。解放后又同在五原工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间，他给中共五原县委写了一篇题为《抗日战争时期河套政治情况》文章，笔者苏希贤见之，辑存了这篇文章，文中提到：“……乔培新同志，抗日初期以专员公署视察员名义来的河套，就以他的身份，把杨柜霸地多年打官司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给解决了……”。）

武英士，现任中共五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收集提供了一些有关文字参考资料。

故此，三人合作整理，并由苏希贤执笔综合，写成这篇史料，以存史实，并供参考。讹误之处，请读者和知情同志予以指正赐教。



# 开挖杨家河的杨 氏家族传略

刘培荣

杨家原是山西省河曲县城关镇人，光绪七年由于晋西北一带连年遭荒旱，加之地瘠民贫，兵连祸结，而至十室九空。诚如民间顺口溜所形容的“黄河边上河曲地，十年就有九不收，女人糊口掏野菜，男人谋生走口外。”因而杨谦、杨万偕同其子杨米仓、杨满仓等人，从河曲逃荒到后套，当时落足在五原蔡家地安身，给地主郭大义（人称郭商人）当雇工，随后又受雇于王同春门下，给王柜挖渠，扛长工，杨家父子由于在干活中吃苦在前，勤快过人，而取得王同春的好感，不几年在王的器重与信任下，杨米仓、杨满仓弟兄俩分别当上了王同春公中（牛犊）的头儿，负责管理一方牛犊的事宜。及至民国元年其子杨茂林（大杭盖）和杨春林（二杭盖）也成为王同春开设的“同兴号”货店的管事人。民国二年（1913年）绥远实业厅告示招商承包土地时，杨米仓、杨满仓弟兄俩迁来临河份子地，遂将卜

尔特拉(碱圪卜的意思)即现在的份子地乡境内的土地向垦务局承包下来。杨家为了谋取地利,势必修挖渠道,因而立即着手动工添挖份子地的旧东渠,开挖新东渠。在卜尔特拉这块碱圪卜里,杨家试种了三年,因无利可图而另觅新途,迁到老杨家河一带安家立业。

老杨家河渠槽原为山西平鲁人杨风珠创挖,后被风沙浸没,水源断绝,杨家河遂从此荒废。迨至民国五年(1916年)河曲人杨米仓、杨满仓从份子地转向陕坝西荒漠之处、杨家河旧地两岸创立基业,遂包租杭锦旗极西之地五千顷,并与附近各天主教堂接洽,借得了开挖杨家河之巨款,订立浇过地亩尽先转租耕种合同。随之勘定渠线,兴工开挖。起先由杨米仓、杨满仓弟兄俩着手经管开渠的人、财、物一切事宜,从民国六年到民国十年每年解冻后,即按勘定之线路,连续挖渠不止。直至民国十一年,已挖至老临河的杨柜缸房,(即临河设治后的四区平教乡一带)。不幸杨米仓因积劳成病,经治无效,于民国十一年病故,紧接着杨满仓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也因病与世长辞了。

杨家河从黄河北岸渡口堂毛脑海开口,到乌加河归尾,全长一百五十余华里。头年冬挖到乌兰淖尔约四十华里。第二年冬挖至中官堂,第三年

挖至二道桥。当杨米仓、杨满仓谢世时，只完成了工程的一半以上，而未竟之功，遂由其子杨茂林和杨春林（即大、二杭盖）继承父业，接续开挖，先后经十余年之久，费银七十万两，始将杨家河全线贯通。水到渠成后，截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大杭盖杨茂林病故，二杭盖杨春林、三杭盖杨文林和四杭盖杨泽林、五杭盖杨鹤林，继承父兄遗愿，在开挖杨家河期间，同时开挖了准格尔河、东道渠、老谢渠、三淖渠、陕坝渠、蛮会渠、乌兰淖支渠、黄羊木头支渠、中官支渠等各大支渠。且疏浚了沙沟天然退水渠。还在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等处修建了大桥五座，以利东西通行。

杨家小弟兄春林于民国二十一年病亡，随之杨鹤林、杨文林、杨泽林均因忧劳过度，于民国二十五年前后相继早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军兴，杨家河已成为河套灌域后来居上、唯一产粮的大干渠之首。它位于河套灌区的西端，横贯于临河四区的全境。傅作义又在河套实行新县制时，将临河四区划为米仓县，即今之杭锦后旗的大部，由于杨家河是从南到北的一条大干渠，它对于河套灌区特别是原米仓县的农牧业生产，起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和促进农牧业发展的作用。以致促成老临河四区新县制后的米仓县成为河套灌

区粮食生产逐年丰收的主要粮食基地。例如抗战期间傅作义又在河套的十万人马及六千公教人员，所需之军粮、公粮（名曰统计粮）应征数为三十万绥石（每石三百市斤）、合九千万斤。而原米仓县（杨家河灌域）就承担着十六万绥石，占后套地区军公粮负担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同时由于杨家河渠深水大，浇水容易，灌溉方便，可灌面积达六千顷（每顷一百亩），过去由于对渠道的管理欠佳，维修工程跟不上去，以致时而决口成灾，给当地人民也带来了一定的灾难。其时收交水租以丈青为依据，每年水租丈青地约五千顷左右，每顷地水租以十元收取，每年可收五万银元。

当民国二十年（1931年）傅作义又接任绥远省主席后，责成省府建设厅收管杨家河干渠，将原来的“民办官督”改为“官办民助”。对杨家所挖之各支修渠系，认定为杨家自修渠，不再收归公有，准其自行管理。杨氏父子深知后套之特点，“民生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又以水利建设为前提”，所以对于有关水利的维修花费，毫不吝惜，概未有废弛。后因历年收入渠费，远不敷出，经年累月，亏损甚巨，故在杨泽林经理任内，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傅作义进套后，遂呈请上级水利管理部门，准予另行选人经理。

总之，杨家父子对开挖杨家河这条大干渠，解决了灌域面积七千顷的淌水问题，是有所功绩的。同时与他人合资修挖了较大支渠六十九道，在临河四区，即新县制时的米仓县，形成渠系纵横交织、连贯有如珠网的水利图景，从民国五年到十九年的十四年内，杨家挖干渠和较大支渠长约三百多里，共挖土方一百一十多万方。其功绩可与开发河套的王同春并垂不朽。

笔者从1943年到1950年，曾任米仓县三青团主任、参议会会议长、政府副县长、代县长等职，故对开挖杨家河的杨门第三代杨占林（六杭盖）、杨云林（八杭盖）有过相识，第四代的杨忠（县参议员），杨廉（公粮保管员）、杨义（平政乡乡绅），杨存（平理乡民选乡长），以及第五代的杨家训、杨家瑞等在县境内国立绥远中学的后起之秀，接触颇多，对杨家的概况有所了解。尤其于1985年春夏之际，专程到巴盟农牧学校走访了在该校任教的杨家昭女士（杨忠的二姑娘，乳名叫二兰子），获得一些杨门后代的片断，对本文的撰写与核实，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但因时隔年久，疏漏不全，在所难免，尚希杨家子孙与社会知情人士，给以补充指正，以匡不逮。

兹随文附上“杨家在河套地区世系表”请参阅考证。（见表）

## “德和泉”往事钩沉

李国祯 提供      文史委整理

我的祖籍河北省枣强县。清道光年间我的老奶病故，留下三男一女，无以为生，女儿为长，只好嫁人。余弟兄三人（老大李镇海14岁，老二李镇江12岁，老三李镇山9岁）一路讨吃跑到河南少林寺学艺。老三李镇山九岁开始学艺，掌教人很是看得起，所以练就一身好功夫，19岁时，业可使出千斤大的力气了。三兄弟学成下山后，也想为国家出力、为民族立功，无奈毫无进身门路。于是，我的老姑姑尽全力为最小的兄弟娶妻成家。就这样，三兄弟与其姐姐、姐夫同居一院，种田的种田，做木匠活的做木匠活，我的老姑姑与三奶奶除操持家务外，又纺织又下地，日子过得很紧巴。数年后，经流昌镇大户张七爷之父（系亲戚关系）找门路，三兄弟才跑到北京城投奔了镖局。

第一次保镖：大约是同治年间，阿拉善旗老王爷过世，扎里达牙罗瑞卿小王爷由京都返回阿拉善旗定远营王府，因路途遥远险恶，清廷经过

考虑，特选定我的三个爷爷保送。小王爷出于对三个爷爷护送其平安返家的感激与敬重，非让三个爷爷留在其身边不可，爷爷们只好推脱说要回京都交差后再来侍奉王爷。于是，小王爷就在乌拉河西畔，拨了一段土地，即桃来图，让爷爷们安家立业。这就是后来的王爷地桃来图牛犊的基础。

第二次保的是杭锦旗王爷由北京回王爷府，行走路线是由神木县向西正直就到了王府。途中遇歹人抢劫镖驮，结果，经爷们奋力守护，镖驮保住了，二爷爷李镇江遇难。在绕道神木逗留期间，有原县知事遗孀二十余岁，身边有一五六岁男孩，娘家人见两个保镖人都长得魁武英俊，遂托县师爷高聋子说媒，经王爷的赞同帮助，与我的大爷爷做了妻室，当时办了喜事，就住在县知事的公馆内。

第三次保的是绥远都统马福祥，因为二位爷爷路经绥远时，都是马出面接待，所以预约好，由两个爷爷负责护送马由绥远回银川。

由银川回来后，三爷爷李镇山决心要与其二哥李镇江报仇。三爷爷把其长兄送到神木后，只身返回河北老家找杀兄仇人，该仇家使用一柄单刀，功夫不低，二人战了多时，三爷李镇山头上着了一刀，立即跳出圈外，蹲了一刻时间，又跳入圈中恶战，终将仇人劈死。仇报了，与地方除

了大害，遂找个地方养伤，伤愈后，实在无意再干这种卖命差事了，于是向西行经莎县又到了包头，听人们说起后套是个米粮川，是养穷人的地方，又听说王桐春如何如何。从此，三爷对后套产生了好印象，返回神木与长兄商议在后套立业，先由三爷进套摸底找关系，遂只身来到当时五原的大户王同春家扛长工。后被王发现有武功，非让当保镖，我三爷不允，最后还是当了站院头儿。那时节，与王家往来的大部分是蒙人，因我爷为蒙古族王爷保过镖，内心感到蒙人厚道实在，德性好，认为在套立点事业，非交往蒙人不可。因此，对蒙人特别照顾优惠。不到几年，凡来王家做生意，不论蒙人男女，一问李三不在就不做了。就这样，三爷爷在蒙人群众的心里树立了威信，直到光绪十八年间，传说王同春挖了瞎陈四（陈锦秀）的眼睛，三爷爷认为王心太恶，遂设法离开，偷跑到杭锦旗王爷府，王爷府的大臣们欢迎他，经拿林包图大臣建议，把魏羊地（今马场地乡）以西，南至黄河畔这一段马场地都给了李镇山，并让其20大几岁的寡居姑姑与三爷住在一起，从此，三爷住在魏羊地北畔的高土梁，以牧畜为生，经过千辛万苦，羊发展到三大群（每群400只上下），牛生殖到100头左右，蒙古老婆又给三爷要回一个周岁余的小



男孩（即后文中我的三爹李庆荣，乳名：李二宝）。清末某年春夏之交，魏羊地的魏二财主与强家油坊（今临河曙光乡一带）强二因淌水放坝发生了纠纷，魏二财主请我三爷出面调停，后来因干坝未放开对魏有利，魏对我三爷敬佩尤增，遂结为拜把兄弟，并将其西边一段约五六顷的好地让于三爷耕种，一切籽种牛具全部由他负责，从此，我三爷由以牧为主转为以农为主，我三爷本是庄稼汗，对种地很感兴趣，加上魏二财主的鼎助，不经二三年魏羊地已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顷地的大牛具了。除了粉坊又开了油坊，此时从河北老家又先后来了我爷的童年好友聂胡胡、辛安、邱长子、张栓成、韩山和高先生等人，帮我爷跑腿办事、种地、赶车、喂牲口。这就是后来的魏羊地牛具。待丹达木头牛具有了字号名“德和泉”，魏羊地牛具因是我爷爷一直居住的地方，所以又称“德和泉”老柜。魏羊地牛具发展起来后，又回神木请回了大爷爷李镇海，经商议决定在王爷地桃来图为大爷爷立牛具。于是，开始雇工挖渠，由乌拉河开口向西开挖一条长三四里的四六渠道，即可灌溉大片土地。又过了二三年，回神木接来了我的大奶奶与伯父李生荣，从此，大爷爷一家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桃来图住地原本没有油粉坊，只是在外院由杨生禄和高

守宪办了一个蒙古买卖，带六陈行业，并起字号名为“德义泉”。主要与蒙族群众共事，经营布匹、糖茶、生烟等宁夏货。货物由磴口县“福盛隆”丁三掌柜——即我的姐夫由骆驼驮来，再把米面、皮毛等运往包头等地，一直经营到大爷爷过世后，由伯父李生荣执掌多年，最后移居临河七里生工（今临河干召庙乡新利村一带）。这就是后来的王爷地桃来图牛犊。

关于临河城南的魏二财主与我三爷的关系亲同弟兄。魏病危之时，将全部地约以及妻儿和后事交赋于我三爷爷。魏病故后，依其所嘱，我三爷去包头为他定做了柏木棺材，待其子魏惠长到十八、九岁时，又将母子二人送回陕北黄府，并将祖遗旧宅修缮一新，置田几百亩，立了牛犊，与魏惠娶了妻室，此后，魏二财主在临河的土地均归属我三爷爷管理了。

我的父亲李增荣（乳名：银科，号：仁甫）本是我大爷爷李镇海的亲生子。十二岁那年，由神木来到临河，当时，我的大奶奶贤惠识大礼，认为我的三爷爷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且在老家，遂将自己的亲生子李增荣过继给三爷爷，并搬到魏羊地居住。我父李增荣经三爷的拉扯和指导，十五岁已成为种地能手，十八岁就当上了引人头儿。三爷为其娶了媳妇，二年后，媳妇病

故。这时五原设置了地亩局，我父被推选为临河地区董事。同一年，河北老家我的老姑夫张和尚，请我的三姑夫赵金堂帮忙，从口里把我的三奶奶和三个姑姑送来临河魏羊地与我三爷爷团聚了，民国元年，地亩局放地，我父亲大胆地把上丹达木头，下丹达木头的几百顷地挂下了。随后就计划开渠放地：一方面由李子英、张头、祁四头、葛四头等人筹划看地形，踩渠路；另一方面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首先开挖了丹达木头渠（即合济渠）。当时出钱最多的是史存娃、老赵海、温厚堂。其它人家，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就这样，七凑八凑，把这条渠挖成了。丹达木头渠大部分地段利用的是天生壕，全长六十余里，可灌溉良田约八九万亩。周围农民咸受其益。

第二条渠是三大股渠。由我父组织人、财、物力，并找了杭锦旗王爷及各大臣资助，除王府出钱外，还有“世诚西”田喜亭，蔡柜，郭延居，白桥宝等人也积了部分钱物。这条渠也是利用天生壕挖成的，全长五十余里。

第三条渠是兰锁渠（即永兰渠），利用天生壕开挖，全长五十里。大多数财力是由马福祥和杭锦旗王爷承担的。在三条大渠的开挖过程中，我父亲负责跑外交、找财主，李子英管帐、管钱

物，老张头监工，祁四头领工，老迟负责跑腿、传递信息，许多妇女帮忙烧火做饭送水，煞是红火。第二个年头，就是丰收年。李子英、老张头遂向我父建议，在下丹达木头长红柳地段建立牛犊，自己耕田种地兼营买卖。除了开设油粉坊外，还东去包头采办布匹、糖茶、水烟等货物回当地销售。李子英是买卖人出身，所以很重视做买卖的规矩，认为必须有一个正式字号名，遂起名“德和泉”。李子英当掌柜，设有记帐先生二人，分别负责牛犊收入、长工支出和油粉坊的出入及相互来往等。外出跑业务负责收换葫麻、篇豆等的有老丁、杨中如、杨三福。种地的引人头儿先后有葛四头、祁四头、王银元、高六子。这就是我父亲李增荣建立的丹达木头牛犊，为了区别于我爷爷的居住地，习惯上又称“德和泉”东柜。上面提叙到的老张头和李子英都是李家所信赖人物。老张头除了亲手为“德和泉”植树造林外，还号召农民多植树，喊明：谁植树，归谁使用。李子英是河曲商人，雄心大，胆量大，为人忠厚，尤其对我父李增荣忠诚不二。丹达木头牛犊是经他手建立的，李家在包头的房地产计有大小院落十三处也是在李子英手上买下的。李直到一九三〇年前后四、五十岁了，才成家，亲生子叫贺长宝。

关于“德和泉”的土地总面积概计：上下丹达木头共有买地八百顷。园子渠口、靠黄土拉亥河东岸向北有一段狭长地段，北与“世诚西”田喜亭的土地相连，约近百顷。代管蒙人的土地计有干召庙的饽召地和二十五里桥南北、郭廷居圪旦至三尖子这段地是马场地，还有东小召滩和黄河北岸的马场地。份子地有二十顷好地系临河第二任县长姚甲三的买地，姚回北京后，该地托我父代管。桃来图有可耕地六、七顷，是扎礼达牙王爷的出租地。大滩地是包地。

我的父亲李增荣生我兄弟二人，兄：李元祯（字干臣，1904—1952）我父是1946年秋天去世的，在其生前六十岁时，我兄李元祯掌管了“德和泉”的全盘事业。

李元祯原本爱玩弄武器，想当武官当军人。日本侵略军进犯后套，驻扎五原期间，我父携家眷逃宁夏避难，丹达木头牛圈只留下一个空院子，被门炳岳的中央军占为军部。不久，绥远的民众抗日自卫军八路军把李元祯从桃来图抓来丹达木头，硬要推选他当司令，选李聚五当参谋长，枪马齐全，共有大几百号人，声言要团结抗日。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八路军的头头有一半是李元祯在绥远一中的同学。是时，门炳岳军长任李元祯为他的第一支队司令，并与南京发了电

报，请示再发展一个骑兵师以及军饷等问题。也在这个时候，傅作义派阎伟厅长来套收编自卫军第八路军，在陕坝小城后大院设自卫军总部，派张钦当总司令，但是自卫军的头头们仍然主张跟上门军长当中央军。经阎厅长往返跑了几趟，把自卫军头头请到陕坝面见了傅长官，尔后终于收编。当时，李元祯和二百余名临河地区的自卫队员未去陕坝，仍属门军第一支队。随后，傅长官下令门军骑七师打五原，李元祯、吕宝山配合。五原战役胜利归来后，本是加官晋级之时，傅长官又提出让李元祯当官，门军长也提出让李元祯当司令官。但是李元祯却偷偷把自卫队员散了伙，他明知门军决不让过他，遂跑到宁夏或住在柳树巷王子荣家或去吴忠堡云缉梧家，以聚赌为职业，以抽大烟为享受，原来利用祁觉民、李善庭等知识分子为其活动，想当国大代表去南京的想法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宁夏的几年里，马鸿逵任他保安司令，马二少爷又让其当十七集团军参议，名誉有了，但据我所知，在此期间，李元祯并未予马家办过一件事。

一九一五年我出生在临河丹达木头乡。一九二五年临河建城后，我爷爷李镇山八十岁时，在西门里靠南处盖了一所院子，他进城养老，把我和李邦祯（我三爹李庆荣之长子）也带到城里，

送临河第一小学读书。回忆我在临河学生运动期间，与刘时平、李贵三人参加并在演出中扮伤病员。我在北平念书时期，参加过北平学生所组织的游行活动。当时，中华中学，师范附中等均由师范大学统一领导。初中一年级，我是童子年，在广武大街、西单、西长安街站过岗、放过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与张鹏举等同乡，被困在北平绥远第一会馆，在日本侵略军四门紧闭，大肆抓捕学生之时，偶然的机会，幸遇市政府老乡苏占元，苏给拿了200元路费，让我假装成天津买卖人，坐上日军由张家口开往天津的军运火车，抵津后，住在英法租界，后又坐英国商船货轮，逃到山东烟台，才算脱离了虎口，从此过上了流亡生活。这一次，我共带出绥远同学23人，（同行者有张鹏举、李庭秀（女）、李维中、陈良玺等）。沿路之上，我把典卖衣箱书籍、卖车子卖怀表、金戒指的300余元，尽数救济了同学同乡，就连带出的几件绒衣、棉袍也都与病号穿了。这是我爷爷、父亲的祖传家教——活着要仗义疏财，扶危救困，济世活人。几经辗转，一九三八年，我回到了后套家中。一九四〇年，我父让我经营桃来图牛骥。在高守信和贺喜红二人的协助下，相继开设了油坊和粉坊，由高、贺二人负责全盘，刘先生记帐，尚吉昌、

乌兰叩（蒙民）跑外交。就在这时，李元祯的小女人柴英来了，她想尽办法要独霸这个牛犊，因欺我太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打了她一顿。一月后，李元祯由宁夏回来不让我了，我只好把家眷送到七里生工伯父家中，于年底的腊月初六骑车去了宁夏。春节后，我把母兄设在宁夏磴子市23号院的库房打开，拿了一箱日光皂，一箱仙岛牌纸烟，卖了一百斤小包棉花，又买了十件细羊毛衫裤，坐汽车跑到兰州，两月余后，找到了绥远同乡会，由杜玉如、武成珂、王子威等同乡，把我拉到“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农经科当了傍听生。校址在西果园的深山里。一九四三年秋后，阿拉善王爷罗瑞卿带家眷来兰州五泉山王府居住，我去拜见王爷并说明情况，王爷亲笔为学校写了“蒙旗蒙族学生保送书”，从此，我成了正式学生，还得到了优待。一九四四年正月十五，兰州城里大办红火，适逢星期天，我起早进城，不慎滑进山沟，跌成重伤，在小西湖国立西北医院住院二十七天后，医生让我回家修养，于是由王子威给我凑了路费，坐水烟筏子第二次回了家。兄母见我回来，并不询问病情，以为我是不念书，回家分家产来的。每日开饭时间，我母亲就赶我家属离开，一连四五天，我确实神经错乱了，跑到韩留高家借车，搬上女人孩子要



到山湾岳母家中想办法。途经西牛骥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人困马乏，只好住下来，次日，牛骥上的众人劝我留下来，说这个牛骥二三十年没有李家人住过，现在有了主人万不可走。于是我一家三口就住了下来。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间，我先后在西牛骥救下过三家要饭的，计有高木匠和李大发等三家。他们讨吃到我门上时，都带一群无衣遮体的孩子，我让郭二留下来，先给粮，后盖房，终未让这三家人冻饿而死。一九四一年腊月，伙伙到场面背麦秸，发现麦柴里有三个人已不会说话了，我赶快叫人抬到羊房里，灌盐水，烧火烤家，几个钟头后，三个人苏醒过来，不会说话，只是磕头。原来，他们是西安地方抓来的兵，由绥东逃出来的。一直住到次年三月，天气转暖了，才拿了点路费和吃的打发走。

一九四三年，在兰州时，我看过两次共产党工作人员给学生演出的关于苏联集体农庄的戏，心中甚是羡慕，加上王子威、杜玉如、武成珂等同乡的启发，我的思想确实有所进步。尤其是王子威在临河县干过事，对我家的情况很清楚，他建议我回家向父兄要二、三十顷土地，为技艺专科学校的同学办个集体农庄，什么人才也有，全国也是第一家。我先后请刘福申老先生、吕子

义、云扣子、石义等人向我父兄要求，李元祯一伙都说我是要破坏“德和泉”的家业，千不让万不能加以阻止。我被气疯了，白明黑夜地抽大烟，自毁自身。1948年，在陕坝水文站工作的技专同学张绍周想在西牛犊建立水文点，我兄知道后，决意抄我的家：先是卖予傅作义四百根电线干，砍了西牛犊的树；后又派他的新任经理郭永海带好多人，把西牛犊存的公粮全部拉回丹达木头流了酒。在出殡我父时，把西牛犊的米面、油粉、醋酱盐及肥猪等尽数拉回东柜，最终又把“德和泉”两个乡的粮食保管员，写成我李国祯的名字。一九四九年，李元祯不顾当时临河县李桂芳政委的劝告，连夜逃跑，害得我坐了四十七天看守所，直到他回来后坦白交待，我才获释。一九五〇年十月间，我第二次入狱的两个月后，他又第二次逃跑，这就是封建大家庭中，弟兄之间很深的矛盾所致。一九四九年秋，郭永海把牛犊饲养的三条老牛宰杀后，分与众人吃了，加上砍树、流酒、宰牛三条罪名判了我十年徒刑。临河监狱一年，陕坝绥西监狱一年，王监狱长照顾我推碾碾磨，后又调到砖窑上装窑背砖。1952年我又被送到狼山农场开荒地、挖渠、打堰子，到二狼山背石头，往返三十里路，每次背65至70斤，整整背了三个冬天。1957年安政委给我

减刑三年，遂留狼山农场为国营农场正式职工。  
1960年农场让我带头返乡，回原地参加劳动。从此，我在丹达本头永桐树十队整整劳动了二十年。二十年来，我接受伟大的劳动政策的教育，渴望把自己建设好，求得新生。我把一切贪心、私心和邪念完全根除，努力树立劳动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1981年到包头定居，先后在郊区服务大楼和郊区贸易货栈工作都是本着上述思想要求自己的。

# 临河大户李仁甫赈 灾献粮史料拾遗

文史委采撷

民国十七年（1928年），莎托二县及梁外、后山等地遭了年景，大批灾民涌入河套地区。当时的临河大户李仁甫（即李增荣）已经执掌了家业。其时负责全盘的是李子英，分管记帐的是傅耀山。李仁甫放粮赈灾从当年的冬季开始至翌年阴历五月端午止。共放粮200石糜子（注），规定：大人一碗，娃娃一小杯。是时，来自包头的粮商以一块银元二升米的价格购米，但大灾之年，有人量，无人菜，待到地里豌豆结荚季节，李仁甫又嘱管家开放十二亩豌豆地，凡来了穷人只许装箩头，不准装麻袋。

据传，事后，绥远省政府以李仁甫赈灾有功，特送匾额一块作为奖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党四十一军把临河地区的粮草征收贻尽，大多数租户交不出租银，李仁甫的个别管家把租户的牲口拉回来抵

债，李知情后，表示不允。

抗战时期，李仁甫捐献粮食的举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曾有过报道。原文是：

绥西民众踊跃献粮〔中央社绥西某地八日电〕

绥西民众近纷纷捐献军粮，临河农民李仁甫捐献麦子糜子各一百石。陈广朝捐献糜子一百石。省府以该民等此种爱国义举，殊堪钦佩，特予嘉奖。

编者注：一石 = 300斤。

# 为纪念临河设治 六十四周年而述

郝维垣

据居住在临河的前辈老年人传说，清光绪年间，有位旅客到宁夏，路过强家油房（为今日临河所在地。旧时河套以买卖商号代替地名）小店住宿，其观察到强家油房地面上生长一种珍贵之草，遂对人说，这地方显示将来必定要建立衙门，这就是人杰地灵、人口繁荣的先兆。这位旅客先生是何技能，不得而知。

民国13年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而督办公署驻在张家口。察哈尔省都统为张之江。绥远省都统为李鸣钟。第十七混成旅长为石友三，驻包头镇守绥西五原一带。河套地区地广人稀，文化落后，芦苇、红柳遍地丛生。五原管辖莫及。有鉴于此，另设一县治理，东以天太桥渠（今日丰济渠）为界，西以磴口乌拉河为界，南至黄河，北至狼山湾，绥远都统公署委派萧振瀛来担任筹建设治工作，并随带各种科技人员20多人，萧振

瀛本人暂住“德和泉”为办公地方。首先选择县公署座落地址，召集地方人士、董事等开会，提出担达木头、魏羊地、干召庙、强家油房、祥太玉、祥太魁和善巴（今日陕坝）等址，并将县的名称应叫什么，交大众集思研讨。先作考查，然后决定，地方士绅与历史专家（跟随萧的设治人员），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与研究最后决定县公署座落在强家油房。在汉书里查考，古代河套地方，有过临河的地名，那么县名不仿叫成临河。呈送萧县长参考批示，得到同意，批示执行。

招雇晋北高级瓦工承包建筑县公署。建筑原材料由县公署供应（有专职人员负责），制绘图纸规划房间（指定专人负责），计正房一栋，东西耳房为县长办公室。东西厢房各一栋为科室办公室。院中间横盖一栋中有过道走廊房，东耳房为办公室，西耳房为法庭，过道走廊门顶有抱厦厅，挂有长方形牌匾，书写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落款是：吉林扶餘萧振瀛题。走出抱厦厅，东西有厢房各一栋。南大门为半园形，砖墙，门口看似住家大户门面，不似封建雄威庄严的衙门样。

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立临河县设治局，任命萧振瀛为局长。

当时临河地方形势成为洋堂洋人（前几十年

俗称洋堂洋人)的殖民地，地方政权鞭长莫及，无人管治。给洋人造成侵略之机。压迫无知农民，进而以宗教迷信毒害庶民百姓。光绪年间，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后，洋人借“宁条梁”洋堂打死一洋人事件，要挟清朝，把教堂所占土地许之，使教堂拥有所有权。且谁信教，就分给土地；不信教，不给土地。当地农民为获土地而信教。教堂向佃户分股收粮或纳税种地，农民也全是教徒。如农民间互有争执，上洋堂打官司，审判民刑事件，洋堂变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机关。

萧振瀛就任县长后，鉴于教堂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借传教愚昧人民，奴役中国人，遂决心与洋堂洋人作斗争，夺回国家主权。

首先向教堂提出抗议，言明教堂传教不符合宗教宗旨，而是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教堂不能收租纳税。洋人不是吃租的大地户商人(今日的大地主)。要把那些宗教败类份子驱逐出境，重振教堂，步入正轨。限定时间，中国土地一律交回县公署管理。教堂再不能收租纳税。如有违者依国际宗教法律治罪，决不宽贷。教堂不是法庭，不能接受民刑案件，萧召集各教堂洋人神甫(又叫司铎)开会讲话训斥，其中有：我为硝碱，



要把你们这些生羊皮灼熟成熟羊皮。（本人姓萧，一语双关）这句话一直流传民间，作为前代老年人讲与下一代人的故事。

县公署还出示布告，凡前领教堂土地，一律收归县公署管理。不得向洋堂交粮纳税，如有教徒甘愿为洋人作殖民地洋奴，再向洋堂交粮纳税，土地违抗不交与国家，按卖国贼处理，派军警逮捕，押送回县以叛国行为判以重刑，决不饶恕。自此，所有领地教徒，便纷纷向县公署交回教堂所领土地，不敢隐瞒分寸。地亩如数交回这一政策，把洋人神甫孤立起来，无计可施。不敢妄为了，只好听从萧县长指示办事。黄土拉亥河（今日为黄济渠），随当时形势所趋，也收归水利局管理。洋人提出要求，黄土拉亥河由教堂集资所开挖段落，系教徒出力，应予补赏。萧县长指示，在水费上拨给补贴，资助劳工。

三盛公为教区，管辖河套各个教堂。所有神甫都有高低不同文化程度。有的神甫看视他的行为语言礼节，十足如文人学士，与他谈起中国古典文化，无所不知，并能谈出中国古书有前人伪造。清朝老人们作过几十年考证工作，来中国的洋人并不无所用心，而是心思力竭搜括中国文化财宝。三盛公教堂设有大型图书馆，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各书局订有合同，不论

出版任何书籍均要邮寄。

三盛公教区办有社会上各种行业，所有各行技术人员，都是虔诚的教徒，并有高等技师为教堂中外神甫服务。

萧振瀛为吉林省扶余县人氏。为人贤明而耿直，办事大胆而果断。敢与教堂洋人斗争，收回国家的主权，不怕罗马教皇的权威。在当时国家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勇于为民作主，为国家负责，实属少有的且官，所以得到人民爱戴与拥护。

# 绥西粮库见闻琐记

王廷英

## 一、绥西粮库的由来

绥西粮库是1950年三月份新建政时正式成立的。由原绥远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绥西储运处“九一九”起义后的旧班底和华北、绥远两干校派来的学生如刘淑良（女）、杨海波、梁世峰、张鸿儒等十余人，以及省粮局委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库主任刘友财，人秘股长侯树南，财会股长赵宝山，保管股长庞天左，调运股长刘俊才（留用人员）总计三十余人组成。其人员以参加革命时间先后计：有参加过长征的和抗日的，有起义的和新派来的、调来的。从出身成份计：有旧职员、知识分子、地富子女、工农兵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关不大，成份复杂。

绥西粮库除直接领导陕坝三个库点外并领导临河、五原、安北、米仓、狼山、晏江县六个粮库。

## 二、绥西粮库初次整风审干

1950年5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任务是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存在着的居功自傲的情绪、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和政治上的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现象。

回忆当年整风动员大会的报告：这次运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实事求是弄清问题。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并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就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真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坚决反对乘机打击他人或采取报复的行为。既坚持分清是非、对原则的问题毫不让步；又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特别欢迎新参加革命的人员交待问题，交待什么，算什么；交多少，算多少，决不追源挖根。

在机关群众大会上刘友财主任首先做了检查，揭发和提问的人不多，原因是相处的时间短，他的问题不了解无法揭。但比较了解他的问

题的人，由于多种原因，不愿在群众大会上揭发，改作书面忠告。也怕影响他的威信，因他是党支部书记，从而他的检查在和风细雨中顺利通过。

当时的人秘股长侯树南，他的问题比较多，文化程度低，检查时常出现矛盾或重复，因而揭发提问的人比较多，他认为是群众故意刁难他，已快四十岁的人了，尚不知独立见解是什么。总以领导的命令为是，主观与经验主义十足。身为入秘股长，很少与人畅所欲言或推心置腹。尤对旧人员及知识分子抱有一种不信任感，且有时形之于色。他对这些人的政治观点、言谈行动、社会关系十分注意。就是日常工作，上班时的迟到早退，卫生区域是否打扫清洁，晚间睡觉电灯是否关闭以及男女往来都在监督之列，并以此项内容向党表忠心，是一个典型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在群众自觉交待问题时，有的人不是诚意帮助，而采取了追源挖根的主观方式，有的问题没讲完，就有人插言质问，甚至两三人提同样重复的意见追问，弄得初次参加运动的人，有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战战兢兢惊慌失措，与动员大会的报告精神简直背道而驰。这种左倾气氛，直接妨碍了同志们自愿交待问题的勇气与热情。

由于左倾风的干扰，几次学习会上，都出现了哑巴会：群众闭口不言，至使会场冷落。

运动结束时，领导在总结会上强调团结，并号召同志们心有所感，畅所欲言，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这些动听的话，群众已不太相信了，只是左耳进右耳出，走一下形式而已。而实际上新旧人员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干部的矛盾，领导与干部的矛盾，都在潜伏着。而官僚主义的领导尚未察觉。

### 三、“刘梁事件”是左倾官僚主义者的大曝光

梁世峰，绥远丰镇人，家庭成分地主，初中文化程度。1948年参加绥远新干校，结业后分配绥西粮库，是一位才华超群风流倜傥的青年，已加入团的组织。

刘淑良，女，北京人。出生官僚世家，其父曾任接收北京敌伪财产国民党先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北京解放后，刘参加华北干校，学习结业后，分至绥西粮库，是一位待人热情、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的好姑娘。在北京市二十六中求学时，其学业成绩出奇，身材貌美超群，即蜚声全校，被誉为校花。

刘梁二人同为直属二库干部，接触机会较多，加之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

谈话的内容便自然就丰富了。当然更能使人产生好感的，是刘那明艳的容光，轻盈的体态，柔和的声音，当她一出现在粮库的场地，人们顿时被她照人的光采所震慑。刘梁二人一个温情，一个诚挚，又处热恋阶段，自然是形影相随，如胶似漆。

刘梁恋爱库人皆知，同志们愿有情人早成眷属，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他（她）们也急于求成，向组织提出申请，乞求批准。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的领导却认为，团员和官僚小姐结婚，是立场不稳，并命令小梁与小刘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但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误解非难，越要抗争。况刘梁恋爱结婚是符合婚姻法的，加之二人相处数月，情投意合，休戚相关，已达到相濡以沫的境地，难舍难分，死不离。小刘为表达忠诚，将生命中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纯真的爱献给小梁，二人公开同居以抗争。群众认为米已成粥，领导会批准的。刘梁第二次又提出申请，但事出意外，骄横的领导，恼羞成怒，指斥小梁，不服从组织决定，乱搞男女关系，伤风败俗，并停止了小梁团的活动。

刘梁二人，申诉无门，陷于绝境，遂以自杀以示抗拒。1951年12月的一天，刘梁吃过恭喜的饭菜，且相亲相爱同卧一床，临天明时，小梁

用步枪先打死小刘，然后用脚蹬枪栓，对准自己的头部射击而亡。一对有情人，就这样不幸地离开了人间。

刘梁死后，被宣布为反革命自杀案件。群众对此事件的真相，虽心中有数，但不敢言，该事件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时期，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政治、党团、特务和警宪等各种反动组织。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大批政治土匪和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达二百余万。其反革命活动亦十分猖獗，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搅得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动荡不安。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反革命活动虽进行了镇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有的地区甚至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

自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大大推动运动广泛深入地展开。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分子，安定了新中



国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粮食系统在镇反运动中，纯洁了阶级队伍，暗藏在狼山粮库的主任张敬德通匪一案曝光后，被依法镇压，真是大快人心。但由于左倾积习，误伤了当时的起义人员武全体。

武全体，曾任国民党临河县党部秘书。1947年即调临河县政府从政。“九一九”起义后调绥西粮库。镇反时，粮库主观武断地认为：武系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当为党部骨干，党团骨干又多参加调统，故而误将党团骨干分子与特务骨干分子等同起来，移送法院，遂被判刑十五年。刑满释放后，武多次上访，始由法院改判，给予平反。1982年巴盟粮油公司按复职退休解决，此人尚健在。

## 五、“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末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决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情况后，于1952年2月26日，中央为此又发出《关于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的五反运动》的指示。

1952年春我地区在党的领导下，也开展了轰轰烈烈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收、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由于各级党委的具体配合，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奉公守法的工商户，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广泛发动群众，揭发贪污分子所惯用的各种手段和花招：如少报营业额、伪造单据、私立假帐、利用请客送礼交朋友行贿等卑鄙手段，进行偷税漏税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扰乱经济秩序以及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罪行。贪污分子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群起而攻之，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贪污分子陷于四面楚歌之境，只好老老实实坦白交待自己的贪污罪行，并检举揭发他人，主动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粮食部门在三反运动中，也取得辉煌成果。职工思想大大提高，正在总结经验、奋战到底之际，由于左倾积习干扰，在运动后期“打老虎”阶段，又出现了一些偏差，如“逼供信”、变相体罚等。

田福升，山西大同人，系起义人员，曾任五原粮站站长。此人能说会道，口直心快，但有时

说话不分场合，言多语失，无意伤人。时有该站谢鼎，此人善耍权术是一个当面奉承、背后使绊的两面派。他诬揭田福陞有严重贪污行为：

“1949年夏，以四船小麦二十万斤运包头换大烟（每两换小麦四百斤）并利用职权，敲榨勒索保管员以欠粮加利的手段，贪污小麦千余石（每石三元银洋），变价存入私商或寄回老家”。三反办公室，急于“打虎”成功，不深入调查研究核实，而采取了偏听偏信，主观认为“旧社会当官必贪。大官多贪，小官少贪，田福陞决不是吃素的人，因而对田采用了小会挤、大会压、白天站（不让坐凳子）、晚间不让睡觉的办法，对田进行折磨，但田坚决不承认，被认为是“畏罪顽抗”，这样折磨几天，田终因力不能支，只好乖乖地承认。定案时，因证据不足，构不成贪污罪，从检举时间看，又系解放前夕（因解放前贪污只作交待，不作退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却打了一只死虎，真是得不偿失。

## 六、绥西粮库的结束

1953年撤销绥西粮库与粮食公司陕坝办事处合并，新组建绥远省粮食公司包头分公司陕坝支公司。原粮食公司陕坝办事处主任杨来福任支公司经理，原绥西粮库主任刘友财任支公司副经

理，下设四个科，即行政科科长候树南；财会科科长郭玉田；统计科科长王召；储运科科长刘俊才，共计五十余人。原五原、临河、安北、米仓、狼山、晏江六个粮库改称粮食公司经营组。

杨来福，山西太谷人，抗战前即参加共产党，因受党的教育时间长，能遵照党的三大作风办事。他实事求是，经营结合实际，从不空谈浮夸。他发扬民主，遇事与群众商量，实行“人事、经济、生活”三公开，且能以身作则，每月终召开工作、学习、生活各种形势的会议，鼓励职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有错即改，无错加勉，赏罚严明。

在他的领导下，陕坝粮食支公司形成一盘棋，职工亲密团结，干劲冲天，业务欣欣向荣。

1954年河套行政区正式成立，将绥远省粮食公司包头分公司陕坝支公司改为河套行政区粮食局，相应地在陕坝、临河、五原、安北、狼山、米仓、晏江设置了粮食局。在党的领导下，依照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心全意地做好军需民食的供应工作。

后附：

本文写作时，走访了五十年代相处的老同志，如刘俊才、武全体、王伯芬等，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 冯玉祥将军和他的西北军歌

王和平

我在1936年参加了西北军的二十九军当了一名士兵，当时正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汹涌澎湃。我在少年时代就经历过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济南屠杀轰炸中国人民的“五·三惨案”。在小学也受到老师们的抗日爱国教育，还在济南仁丰纱厂做工一年，认识到日货充斥市场，民族工商业不能振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非抗日不能救亡图存。特别对冯玉祥将军在泰山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非常拥护，于是偕同亲友，参加了驻防华北的西北军，并在军营生活中体会到西北军歌深入军心，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养成习惯，实在值得称赞。

西北军的著名将领冯玉祥，1882年生于安徽巢县，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由一个旧军人转变成成为民主爱国的军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赞扬。1911年他发动“滦州起义”，响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5年支持救国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了台，张勋率“辫子军”拥护溥仪称帝，冯将军又率军攻入北京，平定了复辟丑剧。1918年与孙中山联系，拥护孙中山的政治

主张，1923年推翻直系军阀曹锟政权，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并派兵驱逐溥仪出宫成为平民。1924年11月孙中山抱病北上，次年3月12日病逝，冯玉祥不胜悲痛！1926年5月受李大钊的教导，不卷入军阀混战，立志寻求真理，去了苏联考察，9月回国，率部在五原誓师，并发表宣言，奉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心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随即率军援陕平甘，称为西北国民革命军。由于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与基督徒李德全女士结婚，有人戏称为“基督将军”。他在西北军的士兵中，仿照基督教的唱诗班，编唱了一部分军歌，灌输中国传统道德及军事纪律教士兵们遵守。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步步进逼华北，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西北军歌的内容更加深入贯彻抗日救国的思想，起到了鼓舞士气，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政治教育作用。1933年冯将军与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派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收复了察哈尔北部的沽源、多伦等四县城，举国欢庆，但遭到蒋介石与日军勾结内外夹攻，收买不坚定分子分化瓦解，使冯将军不得不抱恨离开张家口，解甲来到泰山，读

进步书，写白话诗，办平民学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1937年“七七事变”，西北军29军军长宋哲元部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从此抗日烽火在中国大地燃烧起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冯将军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水利，他在美国到处演讲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受到美国政府的刁难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几经交涉和各方援助，终于在1948年7月乘上苏联“胜利号”轮船，离开美国，准备经苏联绕道回国，不料船在快到苏联敖得萨港的前一天夜间，船上突然失火，浓烟把冯玉祥将军熏倒在客舱里，抢救无效，这位奋斗一生的爱国将军竟与世长辞了。他生前治军严明，在西北军中宣布有五条纪律：

- (1) 不准吸烟喝酒。
- (2) 不准嫖娼赌博。
- (3) 不准欺侮百姓。
- (4) 不准私入民宅。
- (5) 不准便服外出。

老百姓称赞说：“我们的孩子当了冯玉祥的兵就放心了，不会学着吃喝嫖赌。”冯将军本人一生也是不吸烟不喝酒，家里不准备烟酒，吃饭穿戴也很简朴，始终保持北方农民的习惯。他教育士兵不忘国难民苦，从他的军歌中也看得出冯将军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这种具体地结合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西北

军的士兵口诵心记，永志不忘，今将经常唱的西北军歌抄录如下：

1、新兵歌：（新兵入伍后，首先学会此歌，以后也经常唱。）

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护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不可忘保护人民。

2、吃饭歌：（每次开饭前，士兵先列队唱此歌，然后就餐。）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3、睡觉歌：（每晚集体列队点名后，唱此歌，然后就寝。）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明清晨要起早，精神休养好，国耻莫忘了，将来练的学术好，抗日复仇显英豪，外患方多，卧薪枕戈，救我中华民族。

4、服从歌：（强调军人绝对服从，不许违抗上级军令。）

军人首重服从，命令何等森严。纣有兵丁一万，何敌周臣三千，离心同德，胜败昭然。切戒藐法任意抗顽，切戒藐法任意抗顽。

5、八德歌：（应有八首，但经常歌唱以下两首，其余失记。）



①好国民，八德首歌兮孝双亲，孝双亲，柔顺承志兮定省勤，慈乌尚能知反哺，飞鸣日夜念劳辛。国民，国民，时时都要记在心，孝顺父母便是好国民。

②好国民，八德再歌兮弟要恭，弟要恭，兄弟相敬兮乐无穷，阅墙须防招外侮，家庭雍睦在和衷。国民，国民，时时都要记在心，弟恭兄友便是好国民。

#### 6、悔改歌：

悔改功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不怕已经做错，须知来者可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乃是完人，知过必改乃是完人。

#### 7、合群歌：

军人，军人，军人当今时势要合群，师克在和古训存，同棚如弟兄，武王伐纣世所闻，战胜唯一心，休因小事苦相争，试看鹬蚌利渔翁。

#### 8、卫兵歌：

①我卫兵护全军；守职务振精神，枪械子弹莫离身，只知道将军有令要遵行，全军保障赖一人，站岗时要小心。

②我卫兵护全军，守职务振精神，夜黑风号有雨声，这时候更要仔细听真，莫叫敌人扑近身，站岗时要小心。

#### 9、射击歌：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

一。利用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蚁聚，留神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散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碍邻兵发枪击要注意。

#### 10、战斗歌：

①战半动作切要，士兵均须牢记，一闻前进命令，奋勇不顾敌火，战友伤亡取其子弹，如无命令不得顾之，如无命令不得顾之。

②受伤不得擅退，须遵命令而行，有时官长不在，我当勇往表率，我苦战时，敌亦苦战，我困难时，敌更困难，我困难时，敌更困难。

#### 11、夜战歌：

古今来各种战斗夜战最为难，森林村落皆黑暗，进退实维艰，全凭着，视力，听力，警备须周全，敌军、我军与友军更要分清真。

#### 12、夜袭歌：

敌人昼战夜必困，步哨偷睡无精神，暗进，暗进，夜间袭敌，敌不备，以少胜多易成功，奋勇扑敌营，敌人夜必惊，愿我军人学甘宁夜袭敌营。

# 绥西饭店业风情

王廷英

## 一、解放前绥西饭店的风情：

绥西的饭店业，在长期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三十年代初，已形成独特的风情，不论大小饭店，各自都有独特的拿手好菜。如陕坝“三和元”饭店的烧麦，肉嫩馅鲜，状若麦穗有底有帮，不塌不陷。“信德”饭店的馅饼，皮薄馅足，色泽金黄，吃时香脆流油，食后半小时尚有余香。“恒玉永”饭店的烧葱，清素新鲜，辣香可口，嚼之有味，垂涎欲滴。回民“老李”饭馆的早点锅魁，油、糖、面比例均匀，状是混糖月饼，烤色金黄，吃时酥软香美，久存也不硬化变质，成为陕坝独特的早点佳品，一直流传至今，仍为国营一食堂的畅销品，购者争先恐后，惟恐买不到手。

各饭店在门市的装璜上，也是别出心裁，力争新颖别致，美观大方，五光十色，以吸引顾客来店就餐。

俗语说的好，“菜好招来八方客，味香引出洞中仙”。开饭店要的是饭菜多样、香美可口、惠在其中；又装璜别致，秀在其表。只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结合而统一，才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1939年傅作义率军政人员三万余，由晋西北河曲返抵绥西，陕坝人口骤增，饭店业出现了空前的兴旺，座落在中正路繁华市区的“恒玉永”饭店尤为醒目，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兹将“恒玉永”饭店作一简介。该店原是1924年山东武清人氏李永顺在五原开设的。请同乡山东鄄城逃荒来的张朝宗为厨师，由于营业不佳，两年即欠下张的工资240元，无法偿还。1926年李请人与张说合，愿将饭店一半财物，作为抵债，老张憨厚朴实随口同意，表露了穷苦人的真实感情。而社会上的帮闲人却说：“240个袁大头（银元）换来了一堆旧家俱，此人真傻，傻得出奇”。（注一）

1927年“恒玉永”饭店由五原迁往陕坝，改张傻子为经理。张是一个外憨内秀，善于思考，胸有成竹，知人善用，经营有方且精通业务的能手。在他的领导下，饭店营业，逐日好转，在陕坝镇已崭露头角。

傅将军的军政人员驻陕后，张傻子反复思

考，认为发展饭店事业的条件，已经成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心有灵樨一点通，火速装璜门面，内部分设特别室、雅室和普通室。增添精致餐具，聘请高级厨师，使饭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这样地处繁华市区，门市装璜新颖，室内坐位雅静，堂倌服务周到，饭菜多样香美，尤其在煎炸烧烤时，凡路人经此，香飘扑鼻，使人垂涎欲滴。如此得天独厚的“恒玉永”饭店，奋战三年，1942年即名震绥西，真可与“麦香春”饭店的声誉在归绥市、“凤麟阁”饭店的声誉在包头市同媲美。

抗战时期，“恒玉永”饭店接待过美国外宾、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兼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以及国民党中委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和国民政府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先生，更给该店增加了光彩。因而凡婚丧喜庆，或托人求情、协商生意，大多顾客都乐于来此。他们讲排场、耍阔气，挥金如土，常出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场面，张傻子荷包的钱票，也赚得鼓鼓的，常沾沾自喜，志满意得形之于色。

## 二、“恒玉永”饭店的经营管理措施：

(一) 门市装璜：饭店的门面正中上方悬挂着木料刻制涂有“恒玉永饭店”五个金字的招牌，

金光灿烂，令人耀眼。店门外两旁的对联是：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门内照壁悬挂本店格言三条：即管理上力求严格，经营上务必灵活，职工生活上体贴。这几句格言竟成为后来“恒玉永”饭店发达兴旺的秘诀广为流传，成为经营饭店的人学习的座右铭。

（二）室内墙壁张贴印制的吃饭十忌的条幅：一忌饱不节；二忌太快；三忌过咸；四忌挑食；五忌分神；六忌滚烫；七忌生冷；八忌饭前大喝饮料；九忌轻视早餐；十忌饭前发怒。

（三）使用餐具：盘碗较小。因为凡到饭店吃饭的人，总会多要几个菜，方能尽兴。采用小盘装各样菜，每客不过一两口，余香不绝，下次还想来吃。否则盘大吃腻，下次就不愿再来了。

（四）计划用菜：不怂恿顾客多要菜。过去请客的主人是让客人要菜，如果点得多了，堂倌就是阻拦说：“菜不少了，先吃着不够再补”。就这两句话，便可以算是两面俱到，主人和客人都听了高兴。

（五）要拜师学话：语言是饭店的生命线。堂倌常与顾客周旋，关系着饭店的兴衰、交易的成败。拜师学话，使用巧妙的语言，自然顺着客人说，但是要不亢不卑，即便有时驳回，语言也必须中听的。

(六) 会话实例：下面是前“恒玉永”饭店少东家张思明回忆介绍的一段堂倌王成毛和史常庆与顾客的真实对话。

1946年春傅部东进绥包张家口，原傅副长官部改设留守办事处，任杨子禛为处长。杨是傅的小同乡、老部下，军人出生，曾任营团长并在战场上立过战功，颇得傅的赏识。但此人一贯骄傲蛮横，盛气凌人。早在当营长时期，即在蛮会西南（今杭后永胜胜利村）购买土地数顷，派军丁管理耕作，独霸一方，即人们所称的杨营长圪旦，当地群众虽忿恨侧目，但敢怒而不敢言。

斯年农历五月端午，适逢傅将军寿辰，杨处长借机号召陕坝市各机关首长，假“恒玉永”饭店会餐，以示祝贺。该店得知，受宠若惊，既感到首长信得过以来店吃饭为荣；又惟恐杨处长难于接待，无奈只好全力以赴。

午时各首长齐到入座，堂倌已端上烟茶水果点心，首长们品茶聊天，时间稍长，杨处长催问：“客人已到齐，菜为什么老不来？”堂倌说：“火候不合适，不能给您老端上来，宁愿来晚点挨几句骂，也不愿端上来不好吃而挨骂。您老稍微等一等，马上就来了”。端来后，处长嫌菜色不好说：“你们这个厨师可真糟”。堂倌说：“要比您老处里的大厨师，自然是比不上

了，但他知道，您老今天光临，已经忙得一头大汗，”。吃菜后处长又说：“你们这个厨师，越来越退化了。”堂倌说：不是厨师越来越退化，而是您老的口味越来越高了，所以从前吃过的，今天都吃不上口了。”其中一个客人插话说：“菜太咸了没法吃。”堂倌接着说：“一个人一个口味，有人吃着嫌咸，有人反觉太淡一点，这个菜您觉得咸了，咱再给您来个让它淡一点，您看好不好？”客人又接着说：“再来一个算钱吗？”堂倌又说：“当然不敢算钱，不过您要吃得好吃，就是算钱处长也是高兴的。”又一个客人说：“你们怎么会用这么差的肉料呢？”堂倌说：“今天没有买到好的。”客人接问：“为什么？”堂倌说：“一是好的少；二是别人先给买走了。”客人追问：“谁买走了？”堂倌答说：“听说是副长官部留守办事处的采买。”

会餐终了，一位首长站起来说：“你们这里的菜，做得可真好，真是货真价实，名不虚传。”堂倌说：“您这不是夸奖我们，而是恭维请客的主人杨处长，您想我们这里不好，杨处长也不会请各位到这里来吃饭呀。”堂倌与绥西上层社会人物周旋中神情自若、随机应变的对话既轻松，又幽默，且语言巧妙而不低三下四，使杨处长和众首长也无法挑剔，只有高兴而归了。



### 三、“恒玉永”饭店的店规：

饭店业遵循“笑迎千户客，服务八方人”、信誉第一，顾客至上的传统精神。各自都设有店规，但多大同小异，为免繁叙，仅将“恒玉永”饭店的店规列后：

1、店内职工要视信誉如生命；对顾客保证不欺骗，不说慌，不以假乱真，不偷工减料，不耽误客人开饭时间。

2、顾客进店，堂倌要笑脸相迎，一视同仁，亲切接待，并和颜悦色地站立一旁，有问必答。顾客离店时，要迅速送至门口，并高声报告客人赠送小费的数目，以表谢意。

3、店内职工要互相监督，确保饭菜质量，达到花样多、味香美，客人满意。

4、顾客离店时，因一时不慎遗留下的东西要及时交柜，妥为保管，等待认领，以重信誉。

5、店内职工要爱护本店一切财物，严禁偷盗行为，达到丝毫为重。

6、店内职工要视店为家，视经理为家长，服从经理分配，有意见当面提，不准背后乱议论，更不准说慌话、传闲话、拨弄是非，保证店内职工上下团结一致。

7、学徒进店学艺，须有介绍人担保，确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传艺，毫不保留。徒弟受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以终身。

8、同行伙友来店交流经验，要以诚相待，决不隐私或保留，以便共同提高。

9、店内职工除掌勺厨师为顾客操作饭菜时可品尝顾客的饭菜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动用，即使剩饭剩菜也由客主取走，严防漏洞。（注二）

10、店内职工要经常注意卫生，保证室内窗明、地洁、桌亮、餐具随时冲洗、工作服经常换洗并设置药品保健箱，以供客人急需。

11、顾客要求送饭菜上门时，堂倌主动督促掌勺厨师，按约定时间备妥，及时送去，使顾客满意。

12、职工亲友来店时，经经理批准，方得用餐，但以职工的大锅饭为准，不得额外招待。

#### 四、“恒玉永”饭店对职工的福利措施：

经理张傻子是一个胸怀宽阔知人善用的能手，对职工管理使用要求很严，但由于自己出身贫寒，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因而对店内职工的生活十分关心，兹将他与同行业不同的福利措施列后：

1、经理同职工同吃大锅饭，吃饭时拉家常、谈业务，亲密友爱。

2、每年发给职工工作服一套（其中堂倌掌勺厨师两套）。每月发给职工理发票一张，每半月发给职工澡票一张。

3、店内职工生病，经经理批准，到指定医院治疗，凭据报销。

4、职工工资按农历每月十五日发放。每年腊月发放双工资，照顾过好春节。职工遇婚丧大事时，由店预借半年工资或更多点，按实际情况而论。

5、店内每日所收小费，按农历月终发放。除经理外，按人头均分，店内不得留存或挪用。

“恒玉永”饭店就是用这样一种经济手段，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职工视店如家、忠心耿耿为店的事业效力，大家都说，肉烂了在锅里，肉肥汤也肥，只要饭店赚钱，大家都有好处。

### 五、“恒玉永”饭店传经献艺以帮助同行：

四十年代中期，“恒玉永”饭店在陕坝地区已压倒同行，独占鳌头，想当资本家垂手可得。但张傻子并不这样，而是关注饭店事业的改进与发展，并协助同行共同提高，兹简叙于后——。

(一)座落在中正路北老周的“集贤林”饭馆，因设备简陋，资金短缺，服务质量差，营业冷落，面临倒闭。张傻子经理知情后见义勇为，主动上门找到老周出谋献计，并由“恒玉永”饭店担保，向银行贷款三千元，购置新式餐具，还派堂倌常喜毛到该馆传授语言会话技巧，直到“集贤林”饭馆由亏转盈，方才撤兵。老周感动得老泪纵横，竟连赌博的老毛病也彻底改掉了。

(二)“恒玉永”饭店，每年正月初六，借春节联欢为名，邀请同行的有关人员来店座谈，酒菜先行，顺便交谈业务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三)“恒玉永”饭店每隔二三年一定选派厨师堂倌数人，到绥包各大饭店参观，观察各店的装璜及服务动态，并亲自品尝各店的饭菜，详细记载，返店后禀报，以改进本店经营状况。

(四)1943年“恒玉永”饭店与临河李三的“振西”饭店，结成兄弟饭店，开展友谊竞赛。门前张灯结彩，参观群众川流不息，热闹非常。县长王映荣路此，得悉后颇为高兴，偕众参观后，乘兴书写赞词贴于店墙：你们两店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开创绥西饭店协作的新风，充实了饭店经营新的内容，希你们再接再厉。据说“振西”饭店经此协作，也改进了经

营管理，致使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俨然也成为临河唯一的大饭店了。

以上所作，并不是张傻子有先知先觉之明，能预测到绥远和平解放，而是他对发展饭店事业有强烈的信心，愿终身为饭店事业服务，做出一定贡献留传后世。

## 六、“恒玉永”饭店的改革：

1949年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这是一件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大喜事，但在新旧事物交替中，饭店业却出现了畸形的萧条。过去来店的常客，他们心有余悸不敢登门，协商生意的人也不愿来此聚会。婚丧嫁娶，都依照新风力求从简，不到饭店举行，致使饭店营业冷落，面临倒闭。资方欲解雇工人，又拿不出规定的解雇费，即使工人离店他去，也无法找到职业，处此情况，张傻子经理与工人协商，将“恒玉永”饭店改为群众食堂，人人定股分红，取消固定工资，银行存款仍以“恒玉永”饭店名义购买爱国公债伍千元，占同行业总数的80%。余款五千元，作为群众食堂的周转金，至此，经营了二十六年之长、曾闻名绥西、红极一时的“恒玉永”饭店宣告结束。于1950年二月份正式成立了“群众食堂”。年终结算分红，超过赚固定工资时期的

30%，人人都内心喜悦，形之于色。

1951年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生活大大提高，进城时都想到饭店作客。对此，张傻子与职工研究，别出心裁地专为农民增添了“精烩菜”。所谓精烩菜，就是在宴席终时，常见的大烩菜，诸如猪肉粉条山药豆腐白菜之类的混合物，又新加入扒肉条、清蒸羊、炸丸子、酥鸡等于其中。真是菜肉多样，吃起来香美可口，待农民进店吃饭时，除自行挑选主食外，每人供应一大盘精烩菜，这样既快速方便又符合农民习俗且经济实惠，颇得农民的喜爱。“群众食堂”经营此项业务，就获得了不少的合法利润，年终分红，与“恒玉永”饭店时期固定工资相比提高了一倍。职工尝到独立自主经营的甜头，人人笑逐颜开。

但张傻子个人却忧心忡忡，对已往剥削工人而感内疚，总觉得对职工赔偿道歉，方能心安，但全给钱又拿不出来，经过左思右想，追忆往事，回想民国十三年自己在五原李永顺开的“恒玉永”饭店作厨师时，赚下工资，该店无力偿付，最后以家俱餐具赔偿，他灵机一动：何不也沿用此例，了结一桩心愿。于是和职工开诚协商，愿以家俱餐具折价赔偿解雇费用，职工已尝到独立自主经营的甜头，也乐于从事，于是

达成了协议。

职工在自愿的结合下，利用现有家俱餐具，分别建立了“三九”、“同鑫”两饭店，离此另立门户，至此“群众食堂”解体，乐得张傻子喜笑颜开：第一，发展饭店事业的理想，终于在自己亲手培育的青年一代肩挑起来了；第二又赔偿了过去剥削职工的孽债。真是一举两得，剩下的家俱餐具张傻子率领自己家庭的成员组建家庭饭馆，自己放下已往当经理的架子，一变而为站灶厨师，并发誓从今尔后，要紧跟共产党走，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1956年公私合营时，张傻子率家庭饭馆成员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陕坝镇中心店领导的“合作食堂”，后被群众选为经理。

注一：张朝宗山东鄄城人，出身贫苦，青年时学厨艺。1924年因灾荒来套，因其朴实憨厚，被戏称为张傻子，广为流传，本文都以张傻子代其真名。

注二：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怕店内保管故意多用料剩下饭大家吃；二是避免向顾客多要料，大家乘机品尝，使顾客造成浪费。

# 解放前临五杭地 区戏园杂忆

王廷英

## 一、梨园弟子的由来

据唐史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洞悉音律，丝竹管弦，无不各尽其妙，有时自制曲调，随意即成，清浊疾徐，回杯转变，自合节奏。玄宗命雷海青率领众乐工及宫女常在梨园演习音乐舞蹈戏曲，他也亲自击鼓，指导八音，以领袖自居。杨贵妃（玉环）吹玉笛以和之助兴，真是君臣嬉戏，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后人称戏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均出于此。

## 二、解放前临五杭地区戏园历史简介：

解放前临河、五原、杭后地处边陲，人口稀少，文化落后，戏园历史较短，兹简述于后：

（一）五原戏园：1921年临河人王慨新（今杭锦后旗五星乡曾任西北军上校副官主任），将



自营的“鸿兴号”杂货店改建戏园（今之五原义和渠大戏园）。土木结构，一台两廊，房身较高，光线充足。外表壮观大方，内部粉饰，白墙红柱相衬，黄漆木凳，排列有序，舞台挂红色幕布，可容五百余人，开创绥西私人建园的先河，也是绥西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戏园。除上演二人台及戏剧外，官方集会也在这里举行，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五原誓师”时，干部动员大会，即在这里举行，留下一代史迹。

（二）临河民乐戏园：1931年由临河康四私人投资所建，坐落在中山路北二街（今之解放路和平北路）。土木结构，一台两廊，房屋低矮，外表尚整齐大方美观，内部装璜，由镇长安杰山发动商民捐献的。用白灰粉饰，池中满放木制黄色三人长凳。舞台悬挂紫色幕布，设备简陋，可容四百余人。从此各种戏剧都在这里演出，成为临河城内唯一的娱乐场所。官方集会也在这里举行，1939年临河动委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1940年五原光复后，为筹集款慰劳伤兵，由县长王一然邀请省动委会驻陕坝流动话剧团来此演出，由民教馆主办，发出红票筹集慰劳款三千余元。

每逢戏园上演时，人流嘈杂，熙熙攘攘，热闹

非常。夜静戏园内锣鼓喧天，演出兴高彩烈。园外摊贩竞争，叫卖声不止，更增加了热闹色彩。加之“老陶”的熏肉铺，正处戏园的南街口，熏肉时香味四溢，随风扑鼻，使人垂涎欲滴，闲游之人都乐于来此聚集，成为戏园招揽观众的义务宣传员。

（三）陕坝永兴舞台：1933年由杨作舟私人投资，在忠孝路兴建舞台（今杭锦后旗医药公司批发部）。土木结构，一台两廊，虽系平房，但窗户较大，阳光充足，外表也美观大方。内部装璜，白灰粉饰墙壁，墙下部一米涂浅绿色陪衬，倒也别致。四人坐黄漆木凳，排列整齐，舞台悬挂紫色幕布，可容四百余人，但在上演时，因临时加座，常出现拥挤现象，特别是新角或名角初到时，更为严重。官方集会也时在这里举行。

（四）陕坝的精神堡垒礼堂：1939年傅作义将军率军政人员进驻陕坝后，集会或演出，原永兴舞台已不都满足实际需要，因而在陕坝西北城南（今杭后畜产公司收购站）筑有三层精神堡垒土台一座，后面是八字形双开土木结构的一座礼堂，能容近千人，成为临时集会及演出的场所。军政人员集会时，由于已具备遵纪守法的素养，秩序井然。若演出戏剧时或群众参加的大会，因无座，站立，相互拥挤，脚步移动声、吵杂声，不绝于

耳，使人烦恼。若在冬季站立时间较长，冷冻难忍，而在夏季空气沉闷窒息，站立时间较长常感头昏目眩，后因堂址偏僻，建筑简陋且变形，乃废止。

（五）陕坝中山堂：1942年陕坝镇正式改市，定为绥远省临时省会，任常佩三为市长。为加速中山堂的建成，以市政管理处为首，会同副长官部、省政府、陕坝商会等有关部门，组成了中山堂营建委员会，负责选择地址、设计、备料、施工。

中山堂座落在中山路中段的闹市区，初由副长官部中校技士高季彭设计施工，后由公路处技工李长春负责检修完工。李长春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他聪明智慧，经验丰富，经过精心设计，数次修改，并吸取了监工耿维中等人的意见，方确定图案，继续施工，以人字形木屋架，高度十米，共计面积一千平方米，两层薄木结构，可容纳千人。在战时建材奇缺的情况下，能完成如此建筑，真是巧夺天工，其外表堪称雄伟壮观，新颖大方。

堂内粉饰装潢美观，黄漆四人排座木椅，摆满池座两廊及楼上。舞台挂大幕、侧幕、前帘、横幅等。

中山堂的落成，开创了绥西地区官办戏园的

先河，至此官方集会或上演各种戏剧歌舞、二人台，都在这里。军政民有了正当的娱乐场所，扭转了军政人员已往聚众酗酒赌博消遣的恶习，劳动人民终日奔波忙碌，也能来此调济生活，解除疲劳。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来绥检阅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在这里集会。1945年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兼蒋介石统率部参谋长美国的魏德迈将军，由重庆飞陕北视察前线部队，在这里作了总结报告。同年八月，傅作义将军就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大典，也在这里举行，留下了一代史迹。

### 三、戏园相沿的成规：

唐时梨园本为君臣娱乐的场所，随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演变，演员成份复杂，九流三教，混杂其中，加之他（她）们有的行为不检，有的生活腐化堕落，有的染有赌博吸毒嗜好等，为社会人士瞧不起，总认为唱戏是一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养小不养老的下流职业。年轻时吃喝玩乐，终日嬉戏；年老时，沿街乞食，无人问津。他（她）们常被把头流氓敲榨勒索，也无法申冤。有的戏园被砸，戏不能正常演出，致忍饥挨饿。而他（她）们长期在权势的夹缝中忍辱求

生，也学会了一套八面奉迎，甘于忍耐，善于适应，勇于开拓的巧妙手段，这就形成了戏园的成规，后继的人为了免惹是非，都相沿照办，兹述于后：

(一) 海报、戏报和彩色剧照：

戏报是戏园张贴的，当天上演的剧目，一般都是挂在热闹的街市路口，多用木牌将演员姓名、剧目名称临时用毛笔填写，也有的用毛笔写在红纸上，张贴路口显眼的墙壁上，都是为了作宣传。

海报是戏园请来名角上演新的剧目而作扩大宣传才使用的。海报的式样，往往因演员的名望而有别：如系久已驰名的角色，则用若干整张红纸，每张红纸用金粉书写一个字，上面冠以名驰×××（指她在地区的声望）著名演员×××（指她的姓名）极善扮演×××（指她的角色如老生或花旦），下书不日登台演出拿手好戏×××（指她上演的剧目），希届时光临，勿失良机。而不够驰名的演员，就用一张红纸填写，格式内容同上。

1944年陕坝中山堂戏园，为了获得宣传效果，破例将唐声剧社演出“凤仪亭”一剧、舒明贵饰吕布、王元恺饰貂蝉的彩色剧照放大，挂在戏园门口醒目的墙上，招来了络绎不绝的观众看

新鲜，特别是青年男女，争先恐后地挤在最前面，眼巴巴地引颈看望，因而凡有王元恺登场的剧目多是满堂红，座无虚席。

### (二) 拜客：

戏园请来新角或名角上演时，必须拜客。由班主领着请来的演员，用拜匣装着写好的拜贴，上写“×××先生届时敬请光临”字样，下书“班主×××，演员×××敬拜”等字样。步行或乘车分赴军政机关、税局、报社、商会、电厂、地方绅士等处，逐家拜访，口头上还得说些诸如敬请光临照顾或指导的客气话，然后由班主呈上拜贴。拜客事先须想得周到，列出名单，谨慎从事，稍一不慎，若将应拜的对象遗漏，就会招来麻烦，不是寻找借口，在戏园捣乱，就是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停演。若拜客恰如其分，还兼有联络关系进行宣传招徕观众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坤角女演员，拜客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 (三) 门票和红票

戏园在入口处旁边，置一张桌子，出售当日的戏票。这种戏票要先向地方税局交纳20%的娱乐税，加盖戳记后，方准出售。出售时多为五排以后的对号票，追其原因是税局经办人员揩油，一部分赠亲送友；守门员与看座员代地方豪绅巨富抢购一部分，藉以拉关系，捞取外块。

所谓红票是掌握在戏园主任或班主手里的一种红色戏票，专门为拉关系、无价奉送有关人员的，与现在的招待券相似。

也还有一种红票，面额为五元、十元、二十元，是专门为筹集救济或慰劳而发的义捐票。1940年临河民教馆为筹集慰劳款，由康四的民乐戏园，发放过一次该红票，筹集慰劳款三千余元。

#### （四）守门员：

守门员名为勤杂人员，但此角色，相当重要，必须是工作认真、态度和蔼、说话伶俐并能眼观四处耳聆八方；会使用几副面具，随机应变与人周旋；方能胜任。

此种人只要看一眼即能识别：哪些人是花钱看戏的阔老；哪些人是有权势的或与权势者有关的人；哪些是同事的亲朋或班主的相知；哪些人是看“蹭”戏的，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并能“区别”对待：该奉承的就哈腰打躬，满脸陪笑，请其入园，对号入座。对看“蹭”戏的人，则会使出一套“哄、吓、诈”的办法，使他们无言以对，只好乖乖地买票入场。陕坝永兴舞台守门员周合义，他眼毒心计极善使用此招，因而他守门多年，每天与地痞、无赖、流氓相周旋，从未遭到戏园被砸、个人被毒打的横祸，始终平安无事。

### （五）看座员：

看座人员必须行动敏捷，嘴勤脚快，眼观四路，善于识别观众的身份并能分别对待，使观众顺利对号入座，即使特务流氓无票入场，也得强装笑脸，另加木凳，使其落座，以保证园内秩序肃静，按时开演。开演后仍有个别入场观众，守门员与看座员及时联系，并携带他（她）们放轻步履对号入座，以不影响观众看戏的视线。

有时也有人委托守门员或看座员，代买几张好票，为亲朋能聚集一起谈话方便或借看戏之机，恰谈生意；或向有权势的人托情求情，托者常大把给钱，以示大方和感谢。

### （六）勤杂人员：

观众进园落座后，卖茶的人主动走到观众面前，以手示意是否用茶。挎篮子的小贩，沿座走动，用眼神耳语打招呼。有钱的观众，在座位前放一小桌，上摆茶具、纸烟、水果、花生、瓜子等碟子，以示阔气大方。拧手巾把的人，将成把的清洁毛巾，用开水冲洗，洒上花露香水，挽成十条一捆的把子，由两个相距十来米长的人，在空中传递，不撒不散，收者，打开把儿后，再递于观众擦脸使用。毛巾把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但遇头面人物或有钱的人，常是大把给钱，以示阔气。



### （七）“加官”：

当地的军政长官或社会上知名度极高的头面人物来园看戏时，守门员跑步通知舞台执勤，并高喊给×××先生加座，即使演出时间，也得暂停片刻，例行这套成规。

所谓加官，就是由一名演员，化装成天官模样：他头戴乌纱、身穿锦袍、腰系玉带、脚登朝靴、手拿象笏，象笏上书写“天官赐福，步步高升”字样，在空中表演一下，显示入场者的尊贵而已，瞬时园内观众肃静，鸦雀而无声。

### （八）节礼和清唱：

熟悉旧社会官场的人都晓得，钱这个东西无须去要，要的是地位，坐在某种位置上，钱自会送上门来，象聚宝盆一样坐待进帐，风雨无阻。戏园每年端午、中秋、元旦三大节日，都得给当地军政长官及报社、税局、电厂、军警联合稽查处等，分别赠送一份厚礼，以示敬重，与上述单位有关人员，若遇婚嫁喜庆，戏班都得挑选精干演员，由班主率领到现场祝贺并清唱以示助兴，博得主人的高兴，这种人际关系，是万万少不得的。

### （九）迎送“大令”：

在园门内放一张桌子面对舞台和几把椅子，每开戏前几名军警人员，手捧“大令”入园时，

守门员示意舞台执勤，高喊接大令，舞台上就用锁呐堂鼓等乐器，吹奏迎“大令”曲牌，之后，将“大令”放置桌上，方能开戏。散戏时，舞台吹奏送“大令”曲牌，军警人员捧“大令”出园后，观众方能出场。这里所说的“大令”，是用木料制成的，状似穿衣镜，镜的左右画青龙两条，上端书写一“令”字。

陕坝中山堂落成后，上演时由傅作义的侦察大队维持秩序，迎送“大令”的成规自此才销声匿迹了。

#### 附言：

本文整理时，访问了前临河戏园主康四的侄子康书堂；陕坝“永兴”舞台杨作舟的女儿及其女婿贾增福以及戏园的知情者六指红、云儿旦、李进等，在此一并致以谢意。但时隔半个世纪，唯恐有误，尚希知情者补正。

# 王同春先生史料 的几点考证与拾遗

王钰 张子文 王娅丽

王同春先生是一位清末明初因在河套地区兴修水利贡献与成就卓著而在当时名闻全国的人物。关于他的事迹，自民国初（1913）以来在《南园丛稿》《禹贡》半月刊、《河套水利报告》、《黄河志·第三篇水利工程》、《开发后套的商榷》等专著、专刊中，以及解放前后的一些其它刊物报纸中多有介绍。近年所编《中华民国名人人物辞典》中亦有介绍他的专条。他的治水功劳今天正在得到重新评价。

在研究河套水利史的过程中，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关于王同春先生在河套治水史实上的一些问题有诸文歧异之处，为了准确反映象王同春先生这样的历史名人的有关史实，笔者做了些考证、拾遗工作。现仅就其家世方面的几点情况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先进。

## 一、原籍贯：

关于原籍贯，现有三说：一曰行唐，一曰邢台，一曰顺德东石门村。

张遐民《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张乃钧供稿、田郊整理《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持是说，都写道王同春是“河北省行唐县人”。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民国23年12月28日《大公报》），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介绍王同春的文章》（《禹贡》半月刊，1936年4卷7期），王龙耿《清末明初河套地区的水利家王同春》等文都认为王同春“原籍河北邢台”。苏希贤、武英士《王同春》则进一步写道：“原籍河北省邢台县城东二十里的石门村人。”

笔者在关于王同春先生有关史实的调查中曾访问过王先生的一些亲属。关于原籍事，据王先生外孙女张树梅等同志谈：老辈人说原籍是顺德石门村人。现属何地不太清楚了。

三说孰是？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初步考证。

行唐县位于河北省西部，潞龙河上游，自汉置南行唐县，北魏改行唐县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以顺德为地名者有一县、一府（路）。

县即广东省之顺德县。自明代置县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府（路）为顺德府或顺德路。蒙古中统三年

(1262年)把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所置、治所在龙冈的邢州升为顺德府，至元初改为顺德路，到明代时又改为顺德府，于1912年被废。顺德府辖境在今河北巨鹿，广宗以西，沙河以北，泚河以南。治所龙冈，在秦为信都县，汉为襄国县，隋改为龙冈县，北宋末年改为邢台县。1953年由邢台镇改设市。唐、宋时邢州烧造白瓷等瓷器，以“邢窑”而负盛名于天下。

因清末时河北、山西、河南人赴河套地区不少，其亲属自称河北人，加之广东距离河套遥远，故广东顺德说可予排除。

因张树梅等王先生亲属所说得之于“老辈人”，1912年被废的治所在邢台的顺德府所辖数县中没有行唐县，行唐县说可认为是孤证；邢台市东二十里确有石门村；故可确证“顺德”指的即是其治所邢台，而不是顺德府内的其它县。又因1912年顺德府才被废，特别因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已是王同春先生身后之事，故我们可以确认王同春先生的原籍为现在的河北省邢台市人，并应写为：“直隶顺德（现河北邢台）石门村人”。

## 二、出生年月：

现有二说：一曰清咸丰一年（1851年），一曰清咸丰二年（1852年）。

张遐民、苏希贤、武英士等不少文章多持咸丰一年说。

王龙耿《清末民初河套地区的水利家王同春》等文持咸丰二年说。

王同春先生生日是农历三月十日，逝于民国十四年（1925）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四岁，这一点从各方面看是确实的。因中国旧时代计算年龄多为虚岁，加之有农历和公历年、月、日的交错，王先生逝世那年（1925年）虽是半年多但已认一岁，出生那年亦认一岁，以及现在农历和公历的年龄换算法，故以1925年往前推算，当出生于1852年，即咸丰二年。因不知王先生的属相，故此说仍待考。

三、四大股渠的四大股为谁及开挖时间：

河套著名干渠通济渠因其由四家合股开凿，故又名“四大股渠”。但此四家为谁？何时开挖？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说：“通济渠原名老郭河，系同治初年四川老郭名大义者所开。至光绪二十年，经其子郭敏修承父志纠同史老虎、万太公、李达元等完成之，故又名四大股渠。”

有的说：“万德元所开挖的这条短鞭子壕……开工于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此项工程由四川广元商人郭大义（字殖立）为主管，委

王同春为施工渠头，经他精心策划，按期开成二十余里长的渠道……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短鞭子渠河口淤塞，进水受阻，灌溉失利。万德元无力自浚，另邀万秦公商号和郭大义（人称郭商人）、王同春合成四股，出钱出力重新浚修……，修成一条总长三十余里的新渠。因是四家合股协力开挖，故名为“四大股渠”。

有人说：“同治六年，有四川人郭大义随军莅套，退伍务农，联合史二及李、郑二姓，组织四大股，推郭为经理，思其事。复将短鞭子壕整修，并接挖干渠至板头圪堵，计长三十余里，艰苦经营历十数年，始告完成，故人称为老郭渠。郭歿后，其子继续经营。光绪十年，干渠向东修挖……，计长四十五里，费时十二年始行挖通，是为北稍。二十三年又接挖干渠。……至二十七年，修挖告竣，长四十里，是为南稍。至此……全渠始告成功，计长一百一十里。至三十一年，渠地归公，淤澄不堪。

从以上文字可见，四大股中其他三股究竟为谁，且先不论。王同春于1873年为其中一股之说似为不妥。因王此时年仅21岁，刚在治水中崭露头角似无如此力量充认一般。张遐民等人文章中此时“王同春担任渠头”之说似属可信。至于其开竣历史及其他三股为谁，当另为专文，这里不再赘述。

#### 四、随何人赴河套？投奔何人？

关于王同春幼年赴河套之事亦有多说：有的说：“八岁时，曾随族叔去宁夏谋生，十二岁又去河套磴口投奔族叔，他的族叔是专做马鞍、套绳的手艺人，叫王同春随其学艺”。

有的说：“王同春父名杰，居长……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王同春时年十二岁……随其父离乡背井，……投奔族叔王成家中……学做鞍鞵车马绳线。因王成无后，论其王家之亲疏关系，收王同春承嗣子。”

有的说：“王七岁入私塾，仅读半载，因贫辍学，随族叔远适宁夏之磴口，依其叔祖王成维生。居磴口一年，因年幼无力工作，仍返故里。十二岁时，再随乡人前往河套，投奔其族叔。其族叔以制鞍鞵为业”。

仅以上三段引文则可见所随赴河套人有族叔，其父，乡人；投奔者为以黑皮匠为业的族叔，族叔王成或叔祖王成。孰是？因手头资料缺乏不敢妄断，仅提出此疑就教于识者。

#### 五、眇一目之原因：

关于王同春眇一目原因亦有几说：

“五岁时因患痘疹眇一目”。

“被谢协成诱伤一目”。

“五岁时害痘伤了左目，成年后眼睑下垂，不



常睁开”。

据张树梅等同志谈王同春眼疾实系痘疹所致，而并非仇伤。王之仇家众所周知者为陈锦秀（时人称为“瞎陈四”），未闻有谢协成其人。亦未有陈锦秀伤王同春目事，只有王先害瞎陈双眼，后置陈于死地之传闻，并因此王、陈两家打官司多年之事。陈锦秀有公中名“协成”者，且开过协成渠，谢协成恐为“瞎陈四”之误。至于王同春一目全眇或是伤而未眇眼睑下垂，则不得而知矣。

#### 六、王同春子女情况

关于王同春子女情况，《王同春》文言之较详，惜前后文字似相矛盾，难明就里，尚须有机会向作者请教。

在该文“一、家世”部分有“生子五人生女三人。长子鸿……，次子璟……，三子英，字杰臣……，四子钰，字昆山……，五子喆，字乐愚。大女嫁顺德杨家，是大族；二女云卿，乳名拉玉，人称“二老财”适张家，是山西地商人张振达的儿妻；三女适包头李家”。但在后文述及王同春神主的落款署名时又有：“孝男琢、玉、璟、英、喆、敬立”的文字。惜因此神主早已荡然，故孰是孰非及作者是见之原神主、还是得之口碑，而有如此矛盾之说法，则不得而知。

另据张树梅同志言：王同春有六子三女：长

子鸿、次子璟、三子英、四子钰、五子喆、六子琢。大女嫁顺德杨家，二女名云卿，人称“二老财”，三女适包头李家。

关于王同春先生孙辈情况，据笔者所知在此补遗。

王先生尚有孙二人：继祖、绵祖；孙女五人：健生、应生、荣良、文生、振良。其长孙继祖曾留学美国，现任教于南开大学金融系。继祖有子女各一：子名洋、女名岩，现均在美国求学。次孙绵祖在北京某文化部门工作。长孙女健生在教会工作，次孙女应生在北京某中学任教。其余各位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遗泽绵绵，可慰先贤。

在河套水利发展史上，王同春先生占有重要的一席。现在关于建立河套水利史博物馆，在五原建立王同春纪念室，为王同春先生塑像、立传之议时有耳闻。重新评价王同春先生功过是非的文章亦在不少。为准确史实，笔者仅以上几点浅见商榷于诸位先进，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相文：《南园丛稿》

(2) 《河套水利报告》

(3) 张含英：《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

程》，国立编译馆，1936年，上海。

(4) 张遐民：《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初版，台北。

(5) 张乃钧供稿、田郊整理：“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86年12月，包头。

(6)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1924年12月28日《大公报》。

(7) 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禹贡》半月刊，1936年6卷5期。

(8) 王龙耿：“清末明初河套地区的水利家王同春”，《包头文史资料》第八辑，1986年12月，包头。

(9) 苏希贤、武英士：“王同春”，《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五辑，1985年11月，临河。

(10) 王文景：“后套水利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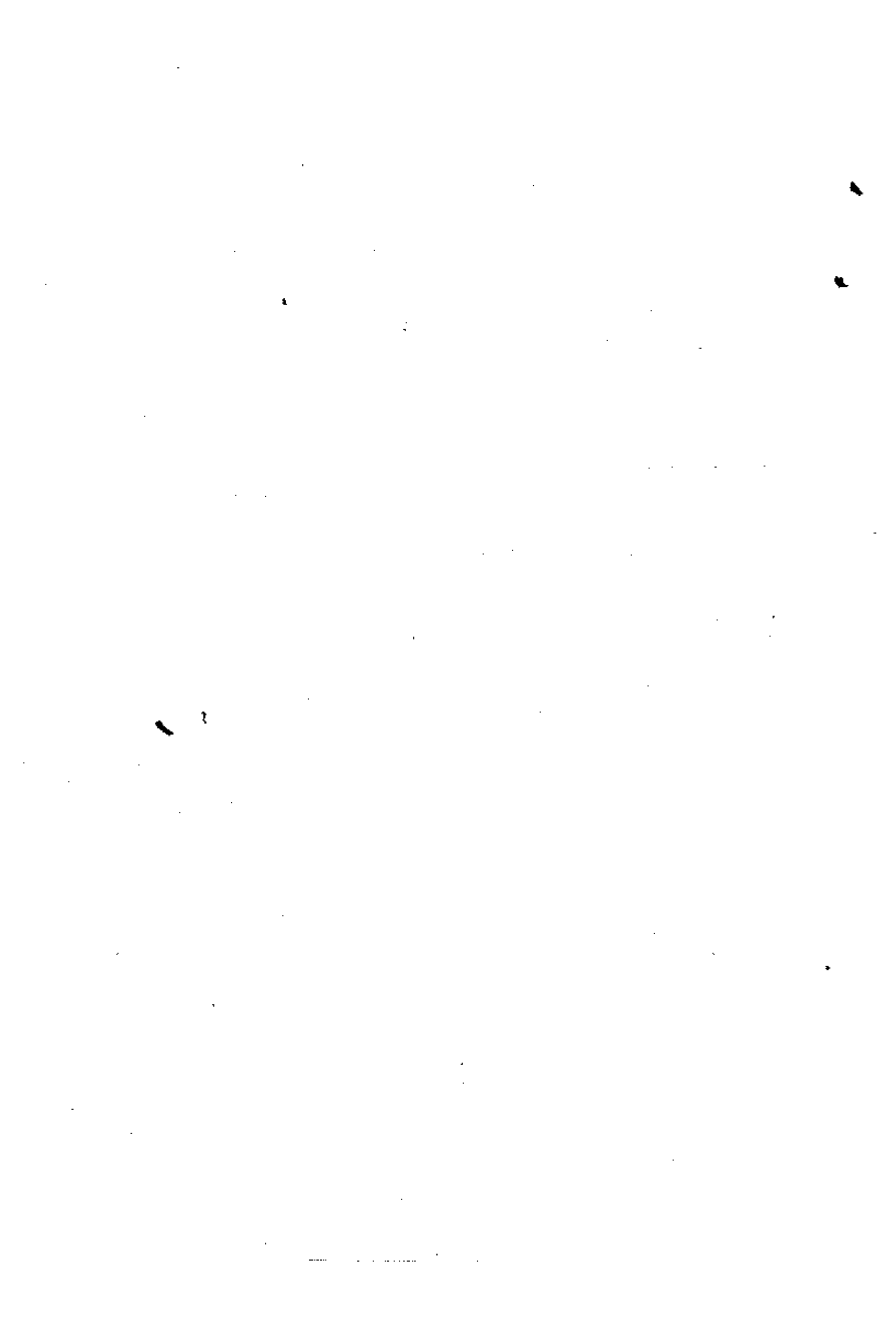
(11) 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禹贡》半月刊，1936年6卷5期。

(12) 王喆：“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禹贡》半月刊，1937年7卷8、9合期。

(13) 王喆：“王同春轶记”，《禹贡》半月刊4卷7期。

(14) 巫宝山：“对王同春事迹补充”。

(15) 曲直生：“王同春事迹考证”。



# 《临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 五辑篇目分类索引

(后面括号里前一数字是辑数,后一数字为页码)

### 政 治

傅作义在河套实施新县制前后之记述  
.....刘培荣(1.39.)

山东移民村之简忆  
.....田宝玉口述、刘培荣整理(1.29.)

我护送洗衣筹同志回延安的经过  
.....边金泉口述、刘培荣整理(2.7.)

回忆“九·一九”起义前后我在河套的见闻  
.....刘培荣(2.11.)

国民党在河套的保甲制.....张兆科、李雅轩供稿  
王明整理(2.38.)

回忆临狼两县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片断  
.....苏维岳、武全体(3.109)

三十年代河套穷人会始末  
.....王廷英(4.1.)

解放前河套各县参议会的成立与活动  
.....刘培荣(4.14.)

- 解放前的临河县参议会……………张联武(4.20.)
- 临河察警局的由来……………赵欣业辑(4.28.)
- 百川堡“抗战建国讨论会”简述  
……………刘培荣(4.31.)
- 回忆勤俭村土改试点工作  
……………史明德(5.1.)
- 我参加治安村土地改革  
……………杨连生供稿 刘培荣整理(5.8.)
- 份子地的变迁……………赵福桐 李长胜(5.18.)
- 解放前临河的设治及其变革史略  
……………刘培荣(5.25.)
- 我对八岱绥干团的片断忆述  
……………刘培荣(5.92.)

## 经 济

-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衰  
……………政协文史室采访整理(1.1.)
- 百川堡屯垦的始末……………刘培荣(1.19.)
- 河套水利沿革  
……………王文景遗稿 史明德整理(1.84.)
- 对份子地开发史实的忆述  
……………石满祥口述 刘培荣整理(2.60.)
- 解放前河套地区税征工作见闻  
……………王廷英(2.70.)

- 解放前临河商会始末……………王廷英 ( 3.63. )
- “世成西”与绥远农业改进所简忆  
……………周汝智 张联武 ( 3.96. )
- 解放前临河永和乡农村经济一瞥  
……………刘熊飞 ( 4.58. )
- 忆“世成西”糖厂片断……………周汝智 ( 4.68. )
- 八战区在“世成西”的军鞋厂  
……………张联武 ( 4.74. )
- 临河果树发展情况之忆述  
……………王大智 ( 5.45. )

## 军 事

- 冯玉祥五原誓师……………武耀国 ( 1.58. )
- 关于孙殿英过境后套打宁夏之前后  
……………刘培荣 ( 1.80. )
- 我带白马连进套剿匪之经过  
……………李才口述 刘培荣整理 ( 2.38. )
- 国民党在河套抓壮丁纪实  
……李雅轩 刘熊飞供稿 王明整理 ( 2.48. )
- 日寇侵入河套暴行一瞥……郝维垣 王廷英供稿  
赵欣业整理 ( 5.55. )
- 忆河套青年军的征集经过  
……………刘培荣 ( 3.58. )
- 庞茂卿叛变一瞥……………赵福桐 ( 5.89. )

回忆日寇侵入临河城的警察工作

……王承荣供稿 赵欣业整理 (4.79.)

## 文 化

二人台在河套的形成与发展

……刘培荣 (2.83.)

忆侯野烽同志在临河民教馆的工作

……高炳炎 (2.105.)

我从事二人台艺术的片断回忆

……倪丑旦供稿 赵欣业整理 (3.7.)

解放前后临河文化发展概况

……文化局史志组 (4.101.)

## 教 育

临河县一完小史略……王有福 郭兴和供稿

杨海涛整理 (3.12.)

解放前临河二完小概况

……周汝智 张联武 (3.28.)

## 医疗卫生

回忆解放前临河县的卫生事业

……刘玉成 (3.39.)

对临河地区三种疾病防治工作的回顾

……杨凯 (5.59.)



## 民族宗教

班禅召“法佑寺”之简介

……巴拉僧供稿 梁杰整理 ( 1.34. )

解放前后河套天主教活动点滴

……邹国华 ( 1.60. )

临河伊斯兰教发展史话

……杨连生 张镇九 武全体 ( 4.84. )

临河基督教史略……郭兴和 ( 5.74. )

## 社 会

忆述河套地区“哥老会”与“独立队”之危害

……刘培荣 ( 1.66. )

“哥老会”及其暗语……王治中 王天才

张彦彪口述 樊登高整理 ( 1.75. )

昔日临河地区鼠疫流行之见闻……刘来云

刘二口述 王廷英整理 ( 2.111. )

回忆温家屹旦鼠疫之惨状……王金科等口述

刘培荣整理 ( 2.117. )

回溯黄河水患……史明德 刘培荣 ( 3.76. )

黄河水患亲历记……郝维垣 苏维岳供稿

赵欣业整理 ( 3.83. )

临河戒烟所……王廷英 ( 3.88. )

水淹临河城片断……王银富 史明德 ( 4.41. )

- 河套地区种烟和禁烟的前后……………王和平  
     苏维岳供稿 赵欣业整理 ( 4.49. )
- 旧社会发生在临河的一出迷信闹剧  
     ……………刘玉成 ( 4.107. )
- 旧社会妓院见闻……………王廷英 ( 4.111. )
- 河套地区结婚彩礼的演变  
     ……………王廷英 ( 5.101. )
- 临河陕坝“牛桥”见闻  
     ……………高德福 王廷英 ( 5.106. )

## 人 物

- 回忆同学郭北辰烈士……………成继功 ( 2.1. )
- 高大羽三次入狱……………武世英 ( 3.1. )

## 其 它

- 牛头告状的始末……………白玉林 ( 2.79. )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有感  
     ……………刘培荣 ( 3.108. )
- 临河城史话……………赵欣业辑 ( 5.37. )
- 临河文史资料撰写参考提纲  
     ……………文史办 ( 2.124. )
- 《文史资料撰写参考提纲》  
     ……………文史委 ( 5.113. )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临河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23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